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多向交流下的區域特性：

論漢中銅器區域特性的產生及發展變化

Regional Bronze Industries and Interrgional Interacti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 in the Hanzhong Basin

鐘雅薰

Ya-Syun Jhong

指導教授：陳芳妹 博士

Advisor: Fang-Mei Chen, Ph.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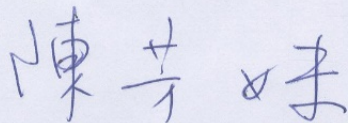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June 2016

本論文係鐘雅薰君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期間完成之碩士論文，經論文考試委員審查及考試合格通過，特此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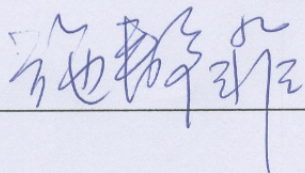
This thesis is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口試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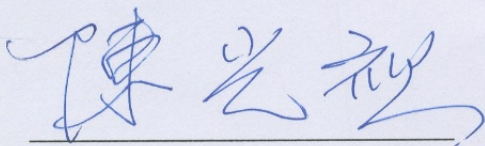


(指導教授)

陳芳妹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兼任教授



施靜菲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



陳光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2 日
June 22, 2016

誌謝

如果說論文大綱是劇本，手中剛出爐的論文應是出自不聽話導演的作品。雖然內容與當初計畫相差頗大，但沒按稿演出的部分卻是最有自己想法的地方。這些新想法的產生是在寫論文這半年間，經歷不同的人事物不斷累積而成，我由衷感謝這期間帶給我啟發的人、事、物。

感謝指導老師陳芳妹老師允許我這個莽撞的學生肆意地發表自己的不成熟想法，但也總是在緊要關頭拉住我這匹野馬。一起修青銅器的學姊和伙伴，玲瑋、謝璿、琨林，在專業的領域中給予中肯的意見，是我最好的 back-up。感謝輝煌、雅婷、恩婷、欣晨與雪溱，即使是不同領域，在狹窄的藝術史領域裡，都是我求學一路的好夥伴。最愛許雅惠老師，是老師帶我進入中國青銅器之門。緬懷陳伯楨師，他的 3 門課奠基我對中國考古學認識。

利用所上的建輝獎學金前往漢中，親自過手這些青銅器和陶器是最珍貴的體驗。也感謝當時田野調查時，陝西西北大學趙叢蒼老師不嫌勞煩，親自帶我去看遺址與器物。除了親自看了許多銅器的細節，實際到當地感受自然地理也是將自己融入歷史情境的好方法。實際走過穿越秦嶺的高速公路，感受到在如此險峻地勢造路之艱，無怪乎漢中與渭河盆地雖僅隔秦陵，青銅文化卻差異很大。兩次到北京時，感謝北京師範大學的彥英熱情款待，特別婦好墓展預約額滿時，替我拿到招待票。感謝北京大學外交系佐藤大，社會科學的腦袋跟文科人不同，總是在我漫天胡說時，拉了我一把。

論文提出的看法未來有可能過時或證明有誤，但對曾經帶給我靈感的人事物，我的感謝永不減。

中文摘要



中國陝西省漢中城固、洋縣兩縣，從 1960 年代陸續公布起，迄今發現的商代銅器多達 600 多件。儘管多數的銅器是未經科學發掘的偶然發現，卻是理解漢中盆地商時歷史最重要的途徑。甚至在漢中盆地第一個商代遺址的正式報告於 2002 年出版之前，由於缺乏陶器建構當地的商代考古文化，銅器可說是唯一的途徑。

以漢中銅器為材料，本文主要處理的主題是銅器的分期和來源兩個問題。過往研究沒有注意到漢中銅器的組合隨時間變化的問題。本文將漢中銅器組合形式可區分三個階段，並採用儀式即表演(ritual as performance)角度來分析組合背後所代表的儀式特色。藉此解釋組合轉變背後所反映的儀式活動參與者或地點變化，因而對漢中銅器性質能有進一步的解釋。

本文也引用近年發表的銅器的成分數據與製造技術分析，從銅器鑄造工藝的角度來看漢中銅器與商時期其他區域的相似點及特點。除了以往研究強調的商中心影響，本文認為漢中盆地用銅文化受到渭河盆地與長江中游更強的影響。不同區域對漢中銅器影響的差異，反映漢中在多向交流中的自主性選擇。

漢中銅器用銅文化的討論反映，過去研究強調的「中心—地方」交流或許應該修正成更複雜的互動網絡。透過考察漢中用銅文化，得以一窺商代黃河與長江兩大青銅文化的互動。

關鍵字：漢中銅器、城洋銅器、青銅鑄造技術、商代區域青銅文化、區域特性、多向交流

英文摘要



More than six hundred bronzes which can safely be dated to the Shang period have been reported found in Yang Xian and Chenggu, Shaanxi, China since 1960s.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se bronzes were randomly found, they represent the key evidenc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Hanzhong Basin in the Shang period. In fact, they were the only evidence before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site of the Shang period was published in 2002.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f the Hanzhong bronzes, the sequence of the bronzes and the sources of the bronzes. The bronz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eriods to illustrate changes of bronze assemblage. The thesis adopts the ritual approach, viewing ritual as performance, to analyze the ritual practices of these bronzes. The changes of assemblage reflect the changes of participants, or the difference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participant ritual activities

The thesis also uses newly-published component analysis data and casting techniques analysis report to discuss local features of composition and casting techniques. Besides influenced by Shang central areas, the analysis suggests bronze-using culture in the Hanzhong Basin was also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wo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s from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region and the Weihe River Bas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bronze-using culture in the Hanzhong Basin reflects that a more complicate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should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unidirectional interpretive framework.

Keywords: Hanzhong bronzes, Cheng Yang bronzes, bronze casting technique, bronze-using culture in the Shang perio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 錄.....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漢中盆地出土商代銅器的重要性.....	1
第二節：研究範圍的界定.....	3
第三節：研究史.....	4
第四節：商代年代架構.....	12
第二章 漢中銅器群的分期與特色.....	16
第一節：早期.....	17
第二節：中期.....	28
第三節：晚期.....	38
第四節：漢中銅器群的性質.....	42
第三章 漢中銅器製造的產生.....	46
第一節：二里崗上層晚期—紅銅器物的出現.....	46
第二節：從當地生產器物看漢中盆地初期銅器與其他地區的關係.....	51
第三節：容器反映外來的影響.....	62
第四節：小結.....	70
第四章 當地自主性的產生.....	72
第一節：青銅容器製造展開的可能.....	72
第二節：青銅產品消費地的特質.....	82
第三節：相互交流的興起.....	85
第四節：比較.....	90
第五章 結論.....	92
附錄.....	98
圖.....	103
參考書目.....	13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漢中盆地出土商代銅器的重要性

商代是中國青銅時代地方特色興起的第一波高峰。約在西元前十七世紀，黃河中游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第三期出現以塊範法(piece-mold technique)鑄造青銅容器以來，這種以塊範鑄造工藝為基礎的青銅鑄品，在二里崗時期和殷墟時期分佈益發廣闊，形成「塊範法的青銅世界」。¹其範圍北達遼寧，東到山東，西南抵四川，西北及於鄂爾多斯高原。在分佈範圍擴大的同時，青銅器風格也從一致性高，發展至風格特徵的差異明確到足以辨別青銅器背後所反映的文化、宗教或政治差異。

以往對於中原以外的青銅系統往往區分成兩種因素，中原傳入和中原影響下的地方特色。但隨著對非中原系統青銅器理解的增加，包含晉陝青銅器、湖南湖北青銅器、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青銅器、江西中部吳城類型青銅器，²要考慮所謂的影響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區域。而簡單歸類於中原影響的器物，也可能是「間接」的中原影響，即模仿到其他區域受到中原影響的青銅器。商中心挾其強勢文化與技術向外擴張是不可否認，但單純的「中心—地方」模式或許應該修正成更複雜的互動網絡。在有些情況下，這些非中原地區的影響，可能比中原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漢中盆地位於秦嶺與大巴山之間(圖 1)，是南北交通重要的通道。其北邊的涇渭盆地是晉陝系銅器的分佈區域，南邊則有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銅器，而沿著漢水而下則抵達長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南方」青銅器和江西中部吳城類型

¹ 「塊範法的青銅世界」的說法採用自陳芳妹，見：陳芳妹，〈「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故宮學術季刊》23 卷，2 期(2009)，頁 28。

² 參考李伯謙對於商晚期的青銅分區系統，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1998)，頁 1-13。

青銅器的分佈區域。漢中銅器也反映其位於交通要道的特性，除了一些帶自身特點的銅器外，許多銅器的風格顯示來自多個地域的影響，有些甚至從鑄造技術的特徵、紋飾的細節到整體的風格，與來自二里崗、殷墟的商人中心，或是長江中游等地的青銅器幾無二致，使我們困惑這些是進口還是當地仿製？

儘管目前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漢中當地已具有製銅工業，近年來公布的成分分析數據顯示，獨見於漢中盆地的彎形器以紅銅為主兼具特殊的砷、鎳砷、銻合金成分，³與絕大多數容器以銅錫或銅錫鉛合金的「青銅」材質不同。陳坤龍據特殊的成分論證漢中盆地存在本土冶鑄的可能。⁴而寶山遺址出土的第一批經科學發掘的銅器⁵則反映，在漢中盆地「青銅」時代興起之前，已存在特殊合金成分的器物。漢中當地的特殊合金成份對比於商代其他區域普遍的青銅，引發以下的疑問：漢中青銅器的出現是受到哪些外來影響？而當地鑄造產業是否回應外在的刺激，還是青銅器都是進口？進一步，漢中用銅文化的成形與背後的社會有何關聯？

客觀來看，基於近年來新材料的發表以及舊材料的整理與出版，相較於以往學界著重於指出漢中銅器的風格特色與影響來源，現階段具備較多的材料分析地方製造的特色，來建立起當地特色器物在不同階段的「變化」。在建立起當地特色器物的發展變化後，可進一步檢視進口的青銅器對於當地的影響，以探索當地鑄造產業是否有回應外在的刺激。漢中銅器以缺乏考古情境的零散發現為主，無法從出土情境分析銅器背後的使用者和所屬社會，過去學者多採器表的形制紋飾分析，本文試圖從器群分析、鑄造特性和使用方式三個面向討論，或許能提供不同的線索來了解漢中盆地商時期歷史的某一側面。

從整個商代區域青銅文化興起脈絡來看，討論漢中青銅器的區域特色以及

³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文物》，7期（2012），頁 85-92；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博士論文，2009），頁 106-9。

⁴ 同上註。

⁵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2003，頁 166、7

與其他區域的關係還有以下的貢獻。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含括商代早期到晚期風格的器物，是觀察商代區域特色形成與發展的一批好材料。而其青銅器群既有一些自身特點但同時又與許多區域的青銅文化有所關聯，繼大洋洲或三星堆，提供另一種商代區域青銅興起模式。此外，漢中盆地位處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交流要道上，北與周人興起的涇渭盆地相鄰，南接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並沿漢水東與長江中游湖北連通。透過考察漢水上游青銅文化，得以一窺商代黃河與長江兩大青銅文化互動。

第二節：研究範圍的界定

在進入學術回顧之前，本文想要先對研究材料做清楚的界定。由地理位置來看，漢中盆地位於長江最長支流漢水的上游。漢水上游介於秦嶺與大巴山之間，是由一系列峽谷相間的串狀小型盆地組成，而漢中盆地為最大的盆地之一（圖 1）。盆地內河階地形發達，大致分為四級階地，遺址多在一、二級沖積平原上。⁶漢中青銅器出土地點也是位在遺址較多的河階上，特別是在河岸不遠處，集中在漢水和其支流渭水、溢水和灋水的兩岸，約東西長 40 公里左右、南北寬 10 公里左右的範圍內。⁷

漢中盆地出土商代青銅器包含兩種性質。第一種是本文討論的主體，指集中出土在漢中盆地西部邊緣的城固和洋縣兩地 600 多件商代銅器，都是未經科學發掘的偶然發現。⁸這些散出器物大部分具有類似的埋藏情況，銅器多是直接埋在土坑中，也不見人骨，故並非隨葬品。埋藏地點也有類似性，最常見的情況是出於高出的土包上，土包大體都在河岸不遠處，當地地名多稱為「塚」，城固蘇村塔塚、小塚和洋縣馬暢安塚皆有銅器群出土。此外，也有部分銅器是在河床和岸邊發現，多是單件，可能是被河水冲刷的二次埋藏，而非原先埋藏地

⁶ 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2006），前言。

⁷ 梁星彭，〈試論陝南城固、洋縣地區商時期文化遺址〉，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科學，2005），頁 344。

⁸ 據趙叢蒼一書的統計。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點。⁹歷來對這批銅器有「城固銅器群」、「城洋銅器群」和「漢中銅器群」三種稱法，本文採用「漢中銅器群」一詞，以凸顯此批銅器所處的地理位置，而不用城洋、城固這二個屬今日行政區域劃分的名詞。不可否認，偌大的漢中盆地，銅器都集中出土在城、洋兩縣，其實這種集中的表現正是漢中銅器群的特點之一。

漢中盆地出土商代銅器的第二種性質為生活居址出土的銅器，目前僅有城固寶山遺址出土一批的銅器，也是漢中盆地第一批科學發掘的銅器。漢中盆地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因此本文主要依靠上述的「漢中銅器群」來論述漢中盆地商代銅器內涵，難免有疏漏之處，待未來新出土材料補充。但是「銅器群」密集的出現也是漢中盆地用銅文化重要特徵之一，足以代表漢中用銅文化一重要側面。

第三節：研究史

以下研究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將討論現有材料的情況與性質，以凸顯既有資料足支撐此議題，之後在第二部份才對過往的二手研究進行討論。

一、材料概述

漢中青銅器的發現早在 1960 年代起便陸續有公佈，¹⁰但專門研究起步甚晚，1980 年代開始才出現較多的討論。主要原因在於漢中青銅器基本上都非經過科學發掘所發現，又加上出版的資料不僅零散而且不全，使得研究難上加難。1980、1988 年兩篇整理報告發表後，城固所發現青銅器的資料才較為全面的公開，而學者也才得以進行青銅器背後的文化內涵研究。¹¹不過，此時洋縣

⁹ 趙叢蒼，《城洋青銅器》，頁 246。

¹⁰ 最早的發表可見：段紹嘉，〈介紹陝西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器〉，《文物》，3 期(1963)，頁 43、44。

¹¹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 期(1980)，頁 211-218；王壽芝，〈陝西省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6 期(1988)，頁 3-9。

方面的資料仍未公開。¹²

遲至 2006 年趙叢蒼主編的《城洋青銅器》(以下簡稱《城洋》)一書出版，才真正較完整揭露迄今城固與洋縣所出的青銅器，書中共收入 710 件在城固、洋縣發現的青銅器，器物年代以商代青銅器為主體，包含部分晚至東周，甚至漢代的器物。編排方式按出土地點、年代分類，並且盡可能紀載相關的訊息，力圖重建遺物的組合和地點。¹³不過城、洋兩地的青銅器都是民眾偶然發現，因此復原當時的出土情況主要是倚靠走訪當事者和文物單位的有關紀錄。儘管地層堆疊或確切的器物放置位置等資訊都不太明確，但該書所披露的「器物組合」訊息，對於探討城洋青銅器的性質與其他區域的關聯卻能帶來突破性的發現。

另一本收入大量一手材料的著作是同年出版由曹瑋所編的三冊圖錄，收入 443 件兩地所出的商代青銅器，當中大部分已收入前書中，但也有少數幾件是趙叢蒼所沒有包括的新資料。¹⁴銅器的整理方式按器類排列，作者以為現存相關資訊是經由訪查當時的發現人所取得，資訊不太明確，甚至有謬誤，故捨棄以出土器群排列的方法，採傳統圖錄的器類排隊作法。目前城固、洋縣的青銅器典藏情況，除了少數在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展出以外，多數的藏品各自分散存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洋縣文物局和城固縣文化館¹⁵的庫房，並未公開。其清晰的圖片有助於器物細節的觀察，在難以取得實物觀察的機會下也是研究的基礎。

趙叢蒼、曹瑋的著作大致囊括歷來的發現，但尚有 25 件先前報導過的發現未被兩人收入。¹⁶另外筆者發現 2014 年城固五郎廟又出土一件尊，但迄今尚未

¹² 首篇洋縣發現的報告：李燁、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6 期(1996)，頁 73-5。

¹³ 1996 年趙叢蒼已基於 1990 碩士論文刪減在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但 2006 年發表專書才完整記錄出土資訊與銅器的線圖、彩圖和資訊。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4 期(1996)，頁 3-26；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¹⁴ 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3 卷(成都：巴蜀書社，2006)。

¹⁵ 城固縣已開始蓋縣博物館，新開設的展示包含城固出土的銅器以及部分寶山遺址的陶器。

¹⁶ 一般會以為趙叢蒼 710 件應包含曹瑋的 443 件，但羅泰詳細比對歷來的簡報、趙叢蒼和曹瑋

見正式發表，僅見新聞報導。¹⁷在此之前，城固五郎廟已出土 5 批銅器，出土銅器並不算意外。此件尊的樣式從新聞描述與照片的輪廓來看，與 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出土的尊類似，又為同類型器物增添一新例證。

以上所闡述的是舊有材料整理所帶來的新訊息，但真正有突破性的是經科學發掘的資料公布。儘管漢中出土大量的青銅器，有明確地層資料的發現卻幾乎沒有。1996 趙叢蒼於研究論文中簡略敘述一些五郎廟、寶山、六陵渡遺址試掘的陶器發現，並據此分為三期，也附上幾件陶器的線描圖和一些陶器紋飾的拓片，進一步提出當地陶器與川西地區陶器相似的看法。¹⁸但具體的地層關係、各期陶器的圖片皆無公佈，研究者難以應用。

直到 2002 年才出版 1988 年發掘的寶山遺址報告，揭露遺址中豐富的商代堆積層，至始漢水流域上游地區的商代考古文化才較為清晰。¹⁹遺址出土鏃、彎形器、銅珠串、針和柄形器²⁰共 9 件青銅器，為漢中首批經科學發掘的出土青銅器。²¹其中以彎形器的發現最重要，它將過去漢中大批採集的青銅器與寶山商時期遺址為代表的遺存聯繫起來。²²而據地層分析與陶器的分期，遺址的年代在二里崗上層晚期至殷墟三期。²³過往對青銅器主要存續年代的看法，與寶山商時代遺址年代基本重疊。但現存研究中進一步思考遺址與青銅器群關係甚少，眾多討論聚焦於陶器所反映的區域聯繫，並進一步將陶器的相似性連結

所記錄的青銅器，發現兩人都有一些遺漏。羅泰的整理是迄今所見最為詳細的整理，他還指出趙、曹與先前簡報之間，出現許多紀錄不符，甚至矛盾之處，詳見羅泰 2010 年文中整理的附表一(Appendix I)：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p.450-494.

¹⁷ 新聞報導中有附圖卻不甚清晰：陳晟編輯，〈城固老人土堆旁撿到商代酒器，上交文物獲 3000 元獎金〉，《華商網》2014 年 11 月 11 日。(瀏覽日期 2016 年 3 月 27 日，網址：<http://news.hsw.cn/system/2014/1111/177618.shtml>)

¹⁸ 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4 期(1996)，頁 22-3。

¹⁹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2002)。

²⁰ 不能肯定此件殘器是否如報告所說是戈類器的內部，此器四壁為寬邊稜，斷面成“H”形。若為戈內，則應是扁形，四周突起顯然無法讓木頭夾住內部，故本文姑且稱之為「柄形器」。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51。

²¹ 這些器並沒有收入趙叢蒼 2006 年的專書中。

²² 朱鳳瀚，〈漢中城固、洋縣出土商代青銅器綜論〉，頁 13；李伯謙，〈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族屬問題的再討論〉，《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 卷，頁 53；趙叢蒼，〈從考古新發現看早期巴文化—附論巴蜀文化討論中的相關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5 卷 4 期(2006.7)，頁 95。

²³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66、7。

至族屬。²⁴此外彎形器以外的小型器物，由於沒有明顯的年代特徵，甚少被討論。但此批器物卻是漢水上游青銅文化興起之初的例證。本文將進一步結合成分與技術分析其所釋放的訊息。

青銅成分、製造工藝方面，原先只有少數器物趁修復之際檢驗成分與考察工藝，包含城固陳邱山父己圓壘²⁵、4件鏹形器。²⁶2009年陳坤龍博士論文對205件器物，取235件樣本進行成分分析，佔漢中出土青銅器總數的30%。²⁷儘管樣品有些抽樣偏差(selection bias)，特別是容器類，主要是採取破損的容器或殘片，而四足鬲、三足壺這類器形特殊而紋飾為典型商樣式的特殊器物就無檢測。此外，論文也目驗大量的銅器並對其鑄造工藝進行分析。2009年陳坤龍博士論文是目前製造、科學分析相關論著中，涵蓋材料最完整的相關著作。但卻尚未見任何研究進一步利用。²⁸文中揭示漢水上游銅器中部份含特殊的砷銅、銻銅、鎳砷銅，其所代表的意涵在本文會進一步討論。

二、 二手研究回顧

1. 地方特色與地方製造的判定爭議

當地特色是什麼？哪些是當地製造？我們需要提出這兩個問題是因為重新理解漢中青銅器的性質是非常必要的。當前的研究顯示，目前學界存在兩種幾乎是對立的看法。若比較1983年李伯謙和2010年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將哪些青銅器視為地方性特色或是當地製造，將會發現巨大的差異。

²⁴梁星彭整理出8種對寶山遺址及漢中銅器所屬的人群族屬之說，詳見：梁星彭，〈試論陝南城固、洋縣地區商時期文化遺址〉，頁345-6。

²⁵方萍、楊軍昌、馬琳燕，〈城固縣青銅壘的修復〉，《文博》，1期(2001)，頁75-8。

²⁶杜安、周雙林，〈幾件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修復〉，《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期(2004)，頁46-51。

²⁷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博士論文，2009)，頁21-2。

²⁸論文發表後，近幾年陳坤龍引用博士論文中部份數據並配合進一步的討論，在期刊上發表幾篇論文。諸如：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文物》，7期(2012)，頁85-92；〈論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紅銅容器〉，《中國國家博物館刊》，4期(2012)，頁132-138；〈城固蘇村出土銅器的技術特徵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3期(2015)，頁122-128。

李伯謙將漢中青銅器分(1)典型的商式銅器、(2)基本上模仿中原同類器物但又有自己的特點，以及(3)不見於商文化，具濃厚地方特色。他認為大部分都是當地製造，第一組是或許有些從二里崗、殷墟等典型商文化中心輸入，但不排除其中也有當地的仿製。²⁹

相對的，羅泰依據兩個標準判斷是否為當地製造：(1)其他地區缺乏類型相近的對應器物；(2)廣布於整個漢中盆地。³⁰在這兩個原則下，僅有4種被他認定是當地製造，即彎形器、飾有三稜和雙頭蛇兩種三角援戈、三稜有胡戈和飾有人面紋的有蓋釜，其餘皆由其他區域輸入，基本上所有的容器皆被排除於當地製品之列。

李伯謙1983年的看法和羅泰2010年的看法可視作光譜上的兩個極端，更多的學者是介於兩者，也就是承認漢中青銅器具有獨特的地方特色，但同時也認為其銅器來源多樣，顯示與其他地區密切的交流。不過，整體而言學界的看法有從李伯謙的看法逐漸傾向於羅泰的看法的趨勢。究其原因，主要是考古材料的累積，加深我們對商代各地青銅文化的理解，所以才能從漢中青銅器群辨識出更多不同的來源。

除了與二里崗、殷墟的聯繫，隨著一些重大的發現，學者從青銅器的風格上至少辨別出與以下這四個用銅區域的關聯：一是四川地區，漢中與四川晚期密切的關係在一開始討論蜀式兵器，即引起注意。³¹1986年廣漢三星堆兩個器物坑³²和2001年金沙遺址的發現，則顯示兩地在更早的時候便有關聯。³³二是位於長江下游地區，1989年江西新贛大洋洲銅器群³⁴的兵器與容器皆與漢中銅

²⁹ 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2期(1983.2)，頁67。

³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曹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436。

³¹ 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2期(1983)，頁66-70。

³² 二陳，〈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5期(1989)，頁1-20+97-103。

；陳德安、陳顯丹，〈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0期(1987)，頁2-15。

³³ 李學勤討論洋縣范霸出土的銅質璋形器，頂部呈V字形並向外敞，認為是仿三星堆器物坑所出土的玉璋。李學勤，〈論洋縣范壩銅牙璋等問題〉，《文博》，2期(1997)，頁13、14。

³⁴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江西新贛大洋洲商墓發掘簡報〉，《文物》，10期(1991)，頁1-24。完整考古報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幹線博物館，《江西新贛大墓》，北京：

器有類似之處。³⁵三是長江中游地區，該地區很早就有出土青銅器，但地方風格的討論卻是 1970 年代發始。³⁶Robert W. Bagley 從器型、紋飾風格論證一件洋縣的動物形尊、城固蘇村的有肩尊具有南方風格，可能是湖南進口的。³⁷四是位於渭河盆地的區域用銅文化，此地被視為先周文化所在地，儘管其風格、用銅方式與二里崗、殷墟這些中心地的差別，並不像長江流域的諸發現與中心地呈現極大的差異，卻仍在器類與紋飾上有著地方的偏好與特點。³⁸李朝遠認為城固出土的盆式簋、高柱斚、簡化獸面紋鼎，與渭水盆地先周文化相似。³⁹

不過，指出漢中銅器與其他區域的銅器相似處比較容易，但對於是進口還是當地製造的判斷卻很有爭議，特別是當地至今尚未發現鑄坊等直接的證據，討論主要依據器物的風格分析。上述李朝遠以盆式簋器薄，品質較關中發現的差，推測為漢中仿製；但羅森認為還是在關中製作，可能是提供給下層菁英的廉價產品。⁴⁰

但是成份分析的數據，卻提供更多的資訊來判斷是否為當地製造。陳坤龍取 235 件樣本進行成分分析，分別來自 205 件器物，佔漢中出土青銅器總數的 30%。⁴¹成分分析顯示容器與兵器多是鉛錫青銅。彎形器與璋形器的成分卻與其他器類差異顯著，發現的彎形器與璋形器整體中，接近 60% 為紅銅，此外也出現砷銅、銻銅和鎳銅特殊合金，卻甚少銅錫鉛的合金成分。地質調查顯示鎳、

文物，1997。

³⁵ Jessica Rawson 注意到漢中與新贛大洋洲出土的青銅器有相似之處，例如：城固出土的人面飾與大洋洲的人像頗相似；兩地各出一個三足壺和三足卣，雖然紋飾都與二里崗時期的風格近似，但三足的形式卻顯示地方的嗜好。Jessica Rawson,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2-3), p. 19.

³⁶ 陳芳妹，〈商代青銅藝術「區域風格」之探索－研究課題與方法之省思〉，《故宮學術季刊》，15 卷 4 期，頁 127-8。

³⁷ Robert W. Bagley, "A Zun from Yang Xia," in 曹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574-6

³⁸ 鄒衡以高褶袋足為周人的特色，追索先周文化的所在地於渭河盆地，並歸結出一些先周文化青銅的特色，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科學，1980），頁 280-4。淺原達郎討論過關中地區青銅容器的地方特點，包含器類上偏好甗和簋等，以及紋飾上的特色，淺原達郎，〈蜀兵探原—二里崗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古史春秋》2 期 1985），頁 36-7。

³⁹ 李朝遠，〈城固洋縣青銅器所含周文化因素之我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頁 78、84、85。

⁴⁰ 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 in 曹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341-61。

⁴¹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博士論文，2009），頁 21-2。

銻、砷等特殊元素，在當地能找到對應的礦產資源。⁴²少見的合金成分似乎呼應風格的特殊性，極有可能為當地冶鑄的體現。

從成分分析的結果來看，漢中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有許多可能是進口品，不過簡單將非特殊合金的容器、兵器全部視為非當地製造也有疑問。我們仍可以在銅器與兵器上看到屬於當地青銅技術的部份，許多容器都經過多次修補。相較於因鑄造缺陷而進行的「補鑄」，為解決因使用而破損的「補修」，與使用者的關係更為接近，更有可能與漢中當地青銅技術有關。陳坤龍的檢驗結果顯示，補修的成份非常的多元，有的成份是與本體相似的銅錫鉛合金，也有少數出現與彎形器和璋形器類似具有砷等微量元素的合金成份(附錄二)。成分分析顯示，不能輕易將無砷、銻等微量元素的銅器歸結為非當地製造。除了補修的痕跡，羅森發現城固龍頭村出土的三足壺的蓋子與器身的紋飾施作非常不同，蓋子應該是當地後來加上。⁴³這些細節讓我們看到，當地銅器鑄造產業應該含括更多的種類與面向。

2. 地方特色出現的時間

地方性青銅器由於其他地方缺乏可對比的樣本，而自身脈絡也不太清楚的情況下，定年困難。曹璋把器物分成三期，將所有的地方特色器物，如彎形器、璋形器等，放置在第三期，約殷墟一期至殷墟四期。趙叢蒼將這些地方特色器物集中在其分期的二、三期，約殷墟一、二期。郭妍利討論漢水上游的兵器，分期為兩期，而他認為在第二期殷墟一、二期才開始出現自身的特色。⁴⁴但這樣的定年方式，似乎沒有考慮到地方特色器物所處的器群。舉例來說，地方特色的有銜斧既有出自容器都屬於二里崗時期的器群，也有出自都屬於典型殷墟風格的器群，但為何容器可分為不同時期，而武器不是參考其所屬的器群年代，而是統一訂為同一個階段呢？而這樣的定年方法是否意味著研究者將二

⁴²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08。

⁴³ 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 曹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13。

⁴⁴ 郭妍利，《城洋青銅兵器研究》，收入趙叢蒼編，《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2006)，頁 260-80。

里崗容器群的年代拉晚到與有銜斧一樣的殷墟一、二期呢？好像也不是，研究者好像不考慮銅容器與地方特色兵器共存的情況，逕自個別分期。

羅泰不同於其他所有的學者，他對器群中個別的武器年代的斷定比其他學者晚很多，並就此推論埋藏的年代都比大多數容器本身年代晚，多數銅器群很可能是基於商周更替之際政治局勢變化才埋葬。⁴⁵但羅泰在判定器物年代時，碰到年代特徵不明顯器物(通常是兵器或工具)往往傾向於判斷為最晚的年代，如形制類似的長援直內戈從商早期至西周初皆有出現，羅泰傾向認定為西周初，但戈所屬器群的其他青銅容器明明皆是商早期。

在器物本身缺失考古地層關係的清況下，器物年代僅能反映埋藏年代的上限，我們無法否認二里崗時期的器物晚至商末周初才埋藏的可能。不過隨著漢中盆地商時期考古文化轉趨清晰，這些器群能早到二里崗或殷墟早期的可能性已較肯定。當初器物出土地層中零碎的陶片，與寶山遺址陶器類似，所以至少能夠肯定商代是可能的；而彎形器在遺址的出土，也反映出有彎形器的器群年代與遺址同時期是有可能的。地方特色的器物產生年代之問題，有賴於結合整個考古文化背景，寶山遺址與漢中銅器群的聯繫使散出的青銅器與考古文化得以結合。

又近年來公布的銅器成分數據顯示地方生產的彎形器與璋形器具有特殊的砷、鎳砷、銻等合金成分，陳坤龍據此論證漢水上游存在本土冶鑄。⁴⁶而寶山遺址出土的例證顯示當地鑄造器物的年代在遺址最初期已出現。⁴⁷當地鑄造的銅器產生之年代早於上述研究者所訂定的年代。顯然對於本地鑄造與地方特色的興起，結合新的材料，應該能有修正並細緻化的可能。

總而言之，基於新資料，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更進一步的討論，一是

⁴⁵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ed. 曹璋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pp 430-4.

⁴⁶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 〈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 《文物》, 7 期 (2012), 頁 85-92; 陳坤龍, 〈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 頁 106-9。

⁴⁷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 《城固寶山: 1988 年發掘報告》, 頁 151。

討論漢水上游地方製造出現的年代及地方製造的特色。二是進一步建立當地製作器物的分期。而在建立起當地特色器物的發展脈絡後，筆者欲重新檢視外來的青銅器對於當地的影響，以探索當地鑄造產業是否有回應外在的刺激。本文希望透過這兩個面向的討論，建構漢水上游青銅文化興起之際的文化面貌，並進一步檢視漢水上游區域特色的興起，對於目前商代區域青銅文化形成的論述能否有補充之處。

第四節：商代年代架構

漢中青銅器和寶山遺址缺乏 C-14 或銘文紀年等絕對年代訊息，而相對年代的建構，青銅器方面，由於具有地方特性的青銅器類年代也不好判斷，主要得依靠比對二里崗、殷墟這些商中心類似的青銅器；陶器方面，可將寶山遺址陶器的演變劃分為三期⁴⁸，但各期的年代主要是倚靠商中心與其他遺址的陶器交叉對比來推斷，因此漢中青銅器的年代分期的架構也以商中心的年代尺標來敘述。

目前商代常見分期有區分為商代早、晚期兩階段和商代早、中、晚三階段兩種看法。本文採商代區分為以河南鄭州二里崗為代表的商代早期(西元前 16th-14th 世紀)和以河南安陽殷墟為代表的商代晚期(西元前 13th-11th 世紀)兩階段的看法，或可稱為二里崗時期與殷墟時期。不過近年來將商代分為早、中、晚三階段的方法逐漸被採用。⁴⁹安陽殷墟西北方的洹北商城遺址⁵⁰和鄭州市西北方的小雙橋遺址⁵¹遺物與地層顯示年代晚於二里崗時期卻又早於殷墟一期。基於這批新材料，學者將原本屬於二里崗上層二期即白家莊期，與殷墟一期偏早階段

⁴⁸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65。

⁴⁹ 唐際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學報》4 期 1999），頁 393-420。

⁵⁰ 遺址內打破殷墟一期灰坑的墓葬，證實早於殷墟一期的地層證據。楊錫璋，〈安陽殷墟三家莊東的發掘〉，《考古》2 期 1983），頁 126-32。

⁵¹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鄭州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南開大學歷史系博物館學專業，〈1995 年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3 期 1996），頁 1-23。

小屯東北地、花園莊這批材料，各自從商早、晚期區分出來成為中商。⁵²中商概念的提出反映考古分期隨新考古發現而逐步細緻的進程，本文予以肯定，但本文仍採用兩大階段的區分，以下將說明採用的考量。

漢水上游區域的考古文化不同商代中心，其進展與分期必然不能完全契合商中心的尺標，因此細緻的分期反倒不如指出重大變化的關鍵分期好。而商代早、晚兩段的區分，不僅是年代差異，更是代表文化核心由鄭州到安陽往北的地域變化。中商典型遺址洹北商城與年代稍晚以小屯為中心的殷墟，兩地隔洹水緊鄰，而小屯也有出土如 M232、333、388⁵³這些偏早也能被歸於中商的墓葬，因此實際洹北商城可以納入廣義的殷墟範圍，而兩地的發展也可銜接不需一分兩段。鄭州二里崗最晚段的發現，如白家莊墓葬⁵⁴、向陽食品窖藏和南順街窖藏⁵⁵，年代雖稍晚但仍是延續早期的發展，因此與其強調與前期的差異從早商區分出來，倒不如強調兩者的延續性。而鄭州小雙橋遺址距離鄭州商城 20 公里，同時一期鄭州商城也尚未完全廢棄，有學者認為也可視為鄭州商城都邑圈內。⁵⁶就商文化本身的發展來看，早晚兩段的區分更能凸顯地域性的轉變。本文的討論關注漢中地區與其他區域之間的互動，商中心的轉移對於區域互動關係變化也是具有重大意義。

第二點就銅器發展來看，早晚兩段的區分也比較能突顯關鍵。羅樾(Max Loehr)主要從青銅器紋飾風格著手，將安陽青銅發展區分成五個階段。⁵⁷後來的考古證明序列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 Style I、II、III 在二里崗時期已出現，而到殷墟中期五種風格都已具備。基於五種風格，商代銅器風格基本上可以區分

⁵² 唐際根，〈中商文化研究〉，頁 393-420。

⁵³ 石璋如，〈第一本·丙編 三·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收入李濟、董作賓編，《小屯：河南安陽殷虛遺址之一》（南京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頁 1-73。

⁵⁴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0 期（1955），頁 24-42。

⁵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京：科學，1997）。

⁵⁶ 許宏，〈都邑變遷與商代考古學的階段劃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慶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華誕學術文集》（北京：文物，2006），頁 479-87。

⁵⁷ Max Loehr,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reiod (1300-1028 B.C.)," *Archiver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 Vol. 7(1953), pp.42-53.

成兩個階段，前一階段 Style I 到 Style III 沒有出現具體的饗饗紋，而是雙眼搭配上重複的卷紋和羽紋暗示生物的造型，主要是出現在二里崗時期，到殷墟早期仍為佔多數；Style IV 和 Style V 出現具體的饗饗母題與雲雷紋底紋區分開來，則成為殷墟典型的風格。

殷墟分期進一步區分為早、中、晚三期，相較於考古學更常採用的四期分法⁵⁸，三期最能反映銅器風格的變化。殷墟早期為二里崗風格到典型殷墟風格的過渡，也有學者將歸於早商⁵⁹；殷墟中期即所謂典型殷墟風格；晚期器類沿襲上期，但部分青銅器的形制，延續到西周早期。⁶⁰

第五節：章節安排

圍繞著漢中銅器地方特色的議題，第一章以銅器群為分析單位討論漢中銅器的分期，釐清整個漢中盆地用銅文化發展的序列，以確認漢中銅器的組合特色、風格表現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和背後所反映的不同工藝來源或區域青銅文化傳統。在考慮組合的變化之下，本文將漢中銅器分成三個階段，其中早期和中期反映當地製銅從出現到興盛的變化，接下來兩章將各別針對這兩個時期討論。第二章將聚焦漢中銅器的早期，即地方特色成形階段，討論當地製銅的發展，包含那些是當地製造的器物和當地製造的特徵，最後討論此時期外來器物的來源，以及外來物與當地製造器物的關係。第三章則討論地方特色發展到興盛的階段，主要分析當地製造的銅器種類與器物組合出現哪些新的發展，並進一步分析新發展背後所反映的意涵，包含是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以及當地如何回應外來的影響。最後結論的部分將檢視前兩章所建構的漢中盆地鑄銅產業發展和與周遭青銅文化之間的關係網，將其放在整個商代區域用銅文化興起的脈

⁵⁸ 四期主要是依據陶器的分期。

⁵⁹ 孫華，〈試論城洋銅器存在的歷史背景〉，《四川文物》，3 期(2011)，頁 34。

⁶⁰ 殷墟主要有三段和四段兩種分法，後者以陶器為依據的判斷依據，相較下三段分法更能突顯青銅器的變化，朱鳳瀚、林巳奈夫都採用此用法。而有關於其所屬的商王，主要依據朱鳳瀚的看法，殷墟發現甲骨文證明史記所載的商王帝系，因此具有重要的意義。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上海：上海古籍，2009)，頁 1008。

絡下，觀察漢中盆地表現出哪些共性和特點，討論漢中盆地地方特色的發展對既有的區域青銅文化興起論述的補充之處。



第二章 漢中銅器群的分期與特色

《城洋》發表之後，資料顯示過去游離的單件器物之中，其實許多本來彼此是出於同一個坑，屬於同一批的銅器，因此有所謂漢中「銅器群」的概念。利用銅器群的概念來訂定整體漢中銅器的範圍，比過去以單一件器物來界定年代範圍更加謹慎。就此，孫華已經對每組器群進行定年和整體器群分期，定年依據主要倚賴器群內器物與中原類似銅器的比照。⁶¹他注意到銅器群的年代有三個節點，而非一次性大量埋入。一是殷墟早中期之際；二是殷墟中期；三是商周之際。而隨時間變動，分佈地點也隱約可見由東北漸移到東南的規律，第一期銅器群集中在城固龍頭、涇水，第二期則集中在城固五郎廟、蘇村，第三期則在洋縣張村。⁶²

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討論一下兩個問題。其一，除了地點隨時間逐漸的變化，筆者注意到孫華所劃分的三階段，銅器群內的器物「組合」特色有所變動。因此基於孫華的器群分期基礎，本文進一步分析不同時期組合形式的變化。分析組合差異的意義在於，組合的差異意味銅器使用習慣的差異，並進一步反映文化的差異。過去已學者依據器群的組合與器類的差異，來論述三星堆、新贛與殷墟三個青銅文化不同的用器習慣。⁶³研究也顯示長江中游地區和關中的先周文化也各自不同的青銅組合偏重。漢中地區存在複雜的組合，可能反映此地呈現複雜的文化因素。

其二，孫華在討論各器群內銅器時，主要以商中心的銅器為對照，卻忽略商中心以外的聯繫。但隨著對非中原系統銅器理解的增加，包含晉陝銅器、湖南湖北銅器、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銅器、江西中部吳城類型銅器，⁶⁴要考慮

⁶¹ 孫華，〈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埋藏問題〉，收入曹璋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170-202。

⁶² 孫華，〈試論城洋銅器存在的歷史背景〉，《四川文物》3 期(2011)，頁 33-45。

⁶³ 陳芳妹，〈「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故宮學術季刊》23 卷，2 期(2009)，頁 21-82。

⁶⁴ 參考李伯謙對於商晚期的青銅分區系統，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

所謂影響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區域，而以往簡單歸類於中原影響的器物，有可能是「間接」的中原影響，即模仿到其他區域受到中原影響的銅器。

本文將器物組合分成四類，(1)成套的容器組合(2)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兵器等小件銅器(3)以鬲、鼎為主的器群(4)無容器組合，另外還有(5)其他類，包含無法歸類的特殊組合和零散出土兩種情況(表 1)。容器以尊、壘、甗為主要的器形，在商中心皆屬於盛酒器，但我們並不清楚在漢中是否有同樣的功能。事實上，1976年蘇村小塚 2 壘出土時倒置，內有尖頂泡，而透頂泡戈、人面及獸面飾散落於兩壘外，⁶⁵就埋藏情況來看，似乎不太像作為盛酒器。同時，下一節的分析也反映尊、壘、甗 3 種不同器形的容器功能的差異並不大，似乎可以視作同一類。

(表 1) 組合類型與數量

組合形式	數量	組合形式	數量
(1) 成套的容器組合	3	(4)無容器組合	1
(2)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兵器等小件銅器	4	(5)其他(特殊/散出)	1
(3)以鬲、鼎為主的器群	2		

對於器群年代的判定，主要依靠與商代其他地區相似的容器對比。相較於以往研究的年代，筆者也關注與非中心地區的聯繫。

第一節：早期

分析早期器群的年代可以幫助界定漢中銅器的年代上限，同時分析其來源有助於理解漢中青銅文化形成之因。漢中銅器早期階段可區分為兩組區別鮮明的類別：一組是以尊、壘、甗容器為主的器群；另一組是以鼎、鬲為主的器群。兩組不只組合不同，銅器的鑄造品質和成分都有明顯的對比。

一、 成套的盛裝器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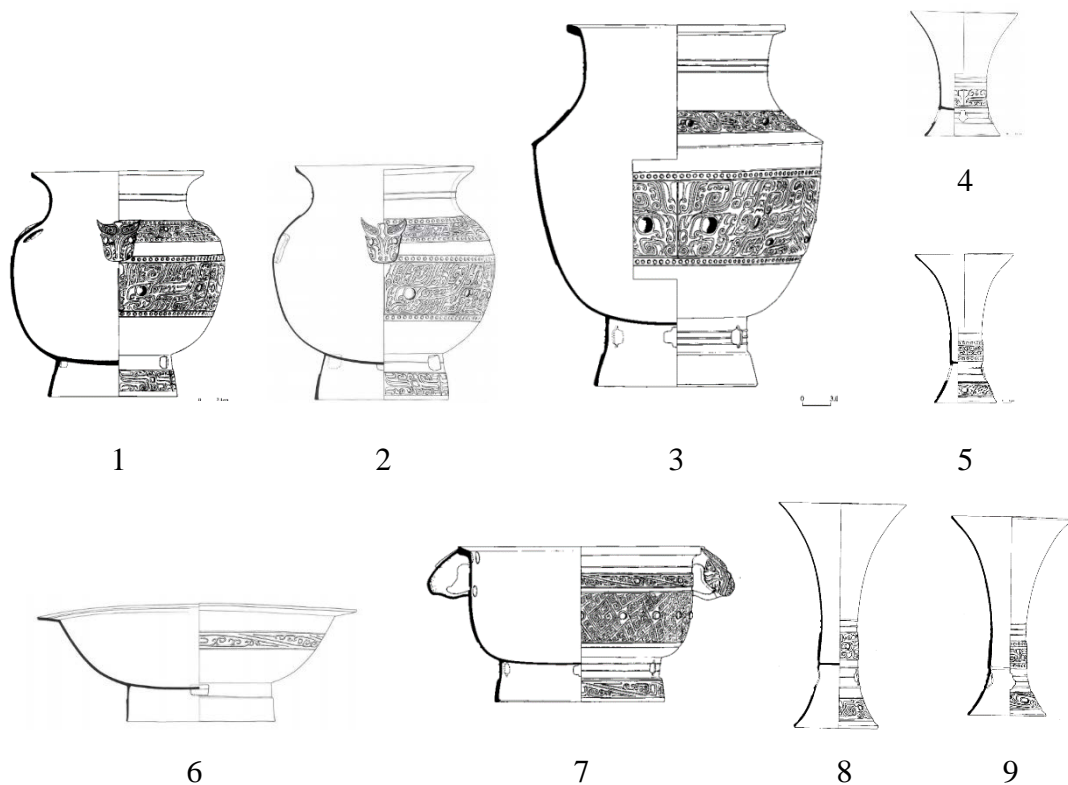
頁 1-13。

⁶⁵ 趙叢蒼，《城洋青銅器》，頁 78-9。

1980、1981 年城固龍頭鎮龍頭村

龍頭鎮內一座大土包，在 1980 年和 1981 年進行取土工作時，發現 2 批銅器，1980 年底共出土 65 件銅器(圖表 1)，1981 年初共出土 26 件(圖表 2)。由於發現時間相差不到一個月，兩地點的距離也僅 1 公尺，不排除是同一批器物群，從銅容器的風格判斷也大致是同一階段，器類的性質也雷同，因此一併討論。⁶⁶兩次的發現都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容器，多數與商早期鄭州或盤龍城的發現類似，少數器類形制有些變異，但仍不出同一傳統；第二類多數不見於商文化區域，有兵器、工具和用途不清的彎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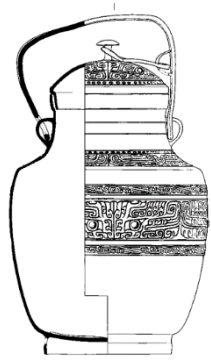
(圖表 1) 1980 年龍頭鎮器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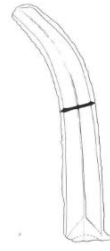
⁶⁶ 羅泰也將兩組器群一併視之。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ed. 曹璋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pp. 3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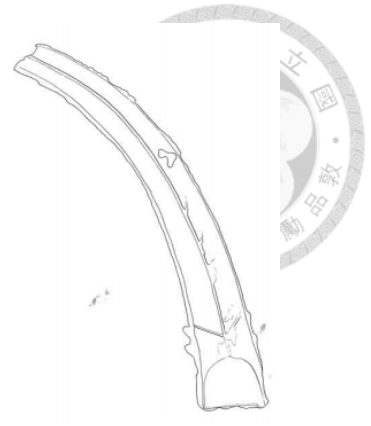
10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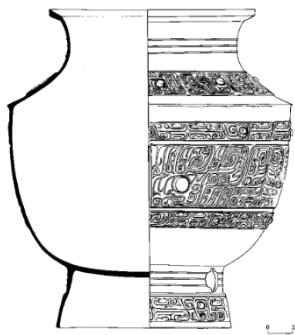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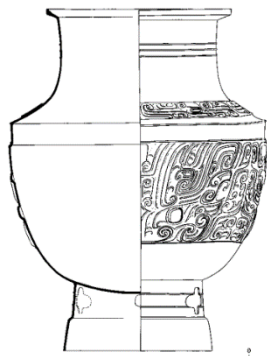
13



(圖表 2) 1981 年龍頭鎮器群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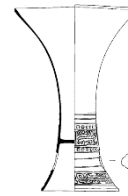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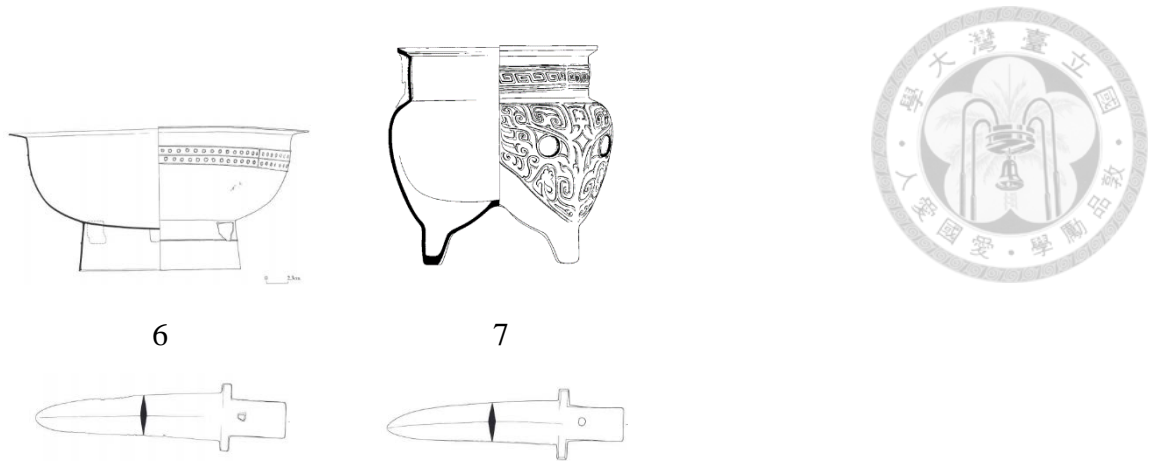
3



4



5



(1)年代

多數容器為典型的二里崗風格。器群中看起來年代最早的一件粗體觚(圖表 1-4)，不早於二里崗上層二段。部分器物可能晚至殷墟一期，1981 年器群的單柱爵(圖表 2-4)底部已成圓狀，柱帽也飾有渦紋，但三足仍短細外撇，具有二里崗向典型殷墟風格過渡的色彩，與小屯 M333 爵⁶⁷類似，後者年代殷墟一期；1980 年器群的細體觚，腰部尚未鼓出但頸部的彎曲率較大，較二里崗最晚段的白家莊 M3 觚⁶⁸晚。⁶⁹

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些器物的形制獨特，迄今不見於其他地區，因此缺乏對比的器物。若僅從某一紋飾或器形某一特徵的異同與中心地器物比較是有風險的，因此下面的討論嘗試從特殊形制背後的製造工藝思考其反映的年代。

整體來看，鑄造工藝顯示特殊的形制是基於二里崗典型風格所產生的變化，而這樣的變異可能反映器物的年代稍晚於二里崗時期。

1980 年出土的提梁卣(圖表 1-11) 除去蓋與提梁的器身就像壘，不同於早商典型的提梁卣器身呈長直頸、圓鼓腹(圖 2)，應稱為提梁「壘」。壘的器形與鄭州向陽食品廠窖藏的壘⁷⁰(圖 3)近似，多數學者推定年代為二里崗上層二期。但

⁶⁷ 石璋如，〈第一本·丙編 殷墟墓葬之五·丙區墓葬·下〉，收入李濟、董作賓編，《小屯：河南安陽殷虛遺址之一》(南京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圖版 130。

⁶⁸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0 期(1955)，頁 24-42。

⁶⁹ 爵的器型演變之研究詳見：陳芳妹，〈從考古資料論青銅爵風格發展的主要趨勢—並論殷墟風格的歷史地位〉，《故宮學術季刊》4 期 4 (1987)，頁 60-3。

⁷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1997)，頁 91，圖 66。

值得注意的是提梁成平板狀，且其與器蓋的銜接方式是在提梁上接鑄半環狀耳套，再以「0-0」狀橫梁與蓋耳相接，這種連接方式商晚期才出現，如殷墟二期早段小屯 M331 的方卣。且提梁上的斜角勾連雷紋也是殷墟早期才出現。二里崗時期所見的提梁多為繩索狀，且提梁沒有半環狀耳套，直接以「∞」狀橫梁連接器蓋，鑄接的次數較前者少。雖不排除後來才加上提梁，但整個器成形的年代不早於商晚期。

第二件特殊器形的是三足壺(圖表 1-10)，儘管器形有點類似卣，但是耳部為貫耳，使用方式需另外繫繩，與卣應為不同的器類。由於器形與鄭州向陽食品廠窖藏的卣類似，多數學者也推測與窖藏同為二里崗上層晚期。但考慮到壺的分範方式為三分型範加上一塊三角形底範，⁷¹這樣的分範法不見於商早期。若參考鼎分範方式的演進，應是在二里崗期之後至殷墟二期之間發展而成。⁷²因此三足壺的年代可能稍晚於二里崗時期。此外，三足壺的蓋子與器身的紋飾施作非常不同，蓋子應該是後來加上。⁷³

第三件四足鬲(圖表 2-7)，四足鬲迄今僅此一件。儘管滿裝的紋飾帶有商早期缺乏主地紋區分的紋飾特徵(羅樾 Style III)，但仍不同於二里崗時期的束頸鬲裝飾，後者往往僅在頸部有一道紋飾，而腹部簡單飾兩道 V 字形弦紋(圖 5)。此器的束頸兩側有接鑄痕跡，疑原先有附耳或鑿，不同於典型鬲多帶立耳。

整體來看，兩批器群容器基本上都是典型的二里崗風格，部分產生一些變異，甚至上述三件特殊器迄今尚未有其他類似的發現，不過從工藝的角度來看，特殊形制背後的技術是在二里崗時期之後形成，所以可能反映部分器物的年代稍晚於二里崗時期，但仍與二里崗的傳統密切相關。因此兩批器群的年代應稍晚於二里崗時期，但在典型殷墟風格形成之前的過渡期，約是殷墟一期。

⁷¹ 據陳坤龍目驗的紀錄，底部范線痕跡顯示三足之間應有一塊三角形底範，詳見：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64。

⁷² 張昌平、流煜、岳占偉、何毓靈，〈二里崗文化至殷墟文化時期銅器範型技術的發展〉，《考古》，8 期(2010)，頁 82。

⁷³ 羅森首先注意到此點。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 in 曹偉 ed., 漢中出土商代銅器, vol. 4, pp. 352.

非容器類可提供年代訊息者，有戈與矛。柳葉形矛帶雙耳是矛最早的形式之一，早商時期僅有盤龍城出土，但類似的形制延續到西周初(圖 6)，龍頭鎮的樣本較接近早期，葉部中脊仍為實心，接近盤龍城矛(圖 7)，但脊更突出可能稍晚。而長援直內戈是最歷久不衰的樣式，要將龍頭戈的年代縮限在狹小的範圍較困難。戈的鋒部尚未呈現鋒利的三角形狀，內部居中，是商早期最主要的直內戈樣式，龍頭戈年代可早至早商，與容器的年代也不矛盾。

(2) 器群特色

從成份和鑄造來看，龍頭器群呈現兩組明顯對比的器物。容器類為銅錫鉛三元合金，⁷⁴且製作精良，銅質厚重，如提梁卣高 32.6 公分，重達 3.8 公斤，遠重於盤龍城另一件類似的提梁卣，後者 31 公分高，重 1.6 公斤。⁷⁵另一方面，彎形器與鋏口斧的成份是紅銅，也出現特殊的砷銅，⁷⁶且彎形器多見鑄造缺陷的漏銅現象。兩者之間的合金成分與品質的差異，似乎反映不同的來源。既然彎形器更可能是當地特色的代表，那麼容器群應該是進口。值得注意的是，斧雖也同為紅銅的小件器物，但銅質厚重，較彎形器品質好，或許武器為當地較重視的器類。

儘管容器類風格與技術完全源自二里崗的傳統，但在組合方面卻呈現不同於商中心的特色。龍頭器群幾乎涵括所有二里崗具備的酒器類型，但其偏重有所不同。商人以觚、爵、斝為核心的組合傳統，自商早期逐步形成，但在龍頭器群不見斝。而 5 觚 1 爵雖然數量頗多，但卻是城洋地區唯一的發現，顯示這並非當地重視的器類，龍頭鎮器群反而是特例。相較之下，大型盛酒器種類齊全，甚至部分器形有所創新，數量多。大型容器在早商文化往往一個大墓僅出土一、兩件，盤龍城李家嘴 M2 是目前發現的早商文化墓葬中規格最高的一

⁷⁴ 容器取 3 觚和提梁卣檢測。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24。

⁷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上》(北京：文物，2001，頁 198)。

⁷⁶

座，墓中大型盛酒器也僅有尊 1 件；李家嘴 M1 也是大墓，盛酒器有 1 尊 1 卣。⁷⁷

尊、壘、甗三種大型容器在龍頭器群裡區別似乎不大，若以同類視之，形成大小有序、紋飾略有差異的 5 件列器(圖表 3)。⁷⁸類似的組合也見於年代更晚的西周初四川竹瓦街 1 號窖藏 5 件列壘，但是竹瓦街的列壘大小、紋飾形成的序列更為明確，5 件壘分成大、中、小三組，除大壘單 1 件，各自 2 件的中、小組壘紋飾、形制大體相同。⁷⁹

尊、壘、甗的區分是宋代金石學家制定的區別方式，並沒有自銘為尊或甗的證據，而目前發現有自銘為壘的器物具有環耳，⁸⁰使用方式或與缺乏環耳的壘不同，且在商早期尚未見此種器形，應與此處討論的壘加以區別。尊和壘共同的特徵為折肩，最大徑往往在折肩處，只是前者是敞口，後者為束口，而甗則肩部圓轉，最大徑在腹部。⁸¹林已奈夫討論地方型銅器時，將尊、壘以折肩為特徵視為同類，與圓肩的甗區分開來，缺乏敞口的壘其實是尊的一種型態，稱為「截頭尊」。⁸²從龍頭的例子來看區分頗有道理。另外兩件甗(圖表 3 之右 1 與左 1)，學者都稱作尊，雖然其整體的器形更像尊，但趨於圓轉的肩部已是甗的特徵。甗大致出現在殷墟一期左右或稍早，如小屯 M232(圖 8)，龍頭鎮的例子反映甗有可能是由尊演變過來，在早期實際上兩者並沒有區分。

(圖表 3)龍頭鎮器群的列器和竹瓦街 H1 的列壘

⁷⁷ 鄭州發現的墓葬都是中小型墓葬，而大型墓葬的例子主要出自盤龍城，儘管位置離中心地很遠，但銅器與陶器仍具濃厚商文化色彩，因此大體上能視作商文化的反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上》，頁 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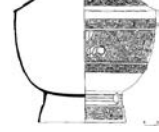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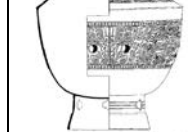


⁷⁸ 羅泰首先觀察到此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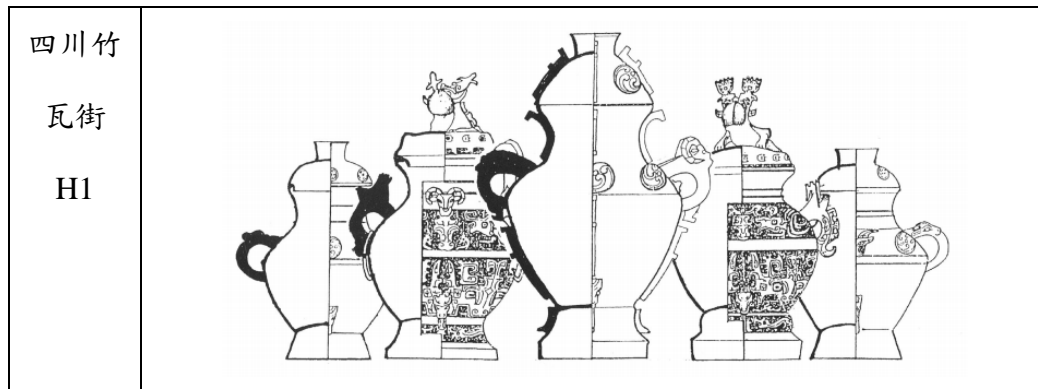
⁷⁹ 孫華，〈彭縣竹瓦街銅器再分析—埋藏性質、年代、原因及其文化背景〉，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2)，頁 133，圖 4。

⁸⁰ 自銘的例子如莊白 H1 的陵方壘，自銘「陵作父／日乙寶／壘」，詳見：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3 期(1978)，圖 3。

⁸¹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上海：上海古籍，2009)，頁 209；林已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84)，頁 67-8+75。

⁸² 林已奈夫，〈殷西周時代の地方型青銅器〉，收入樋口隆康編，《考古学メモワール 1980》(東京：學生社，1981)，頁 3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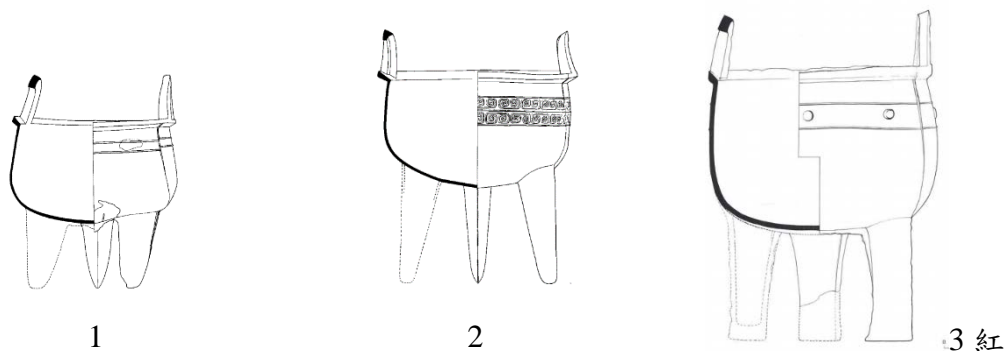
龍頭鎮					
高	23.8	34.1	37.8	37.1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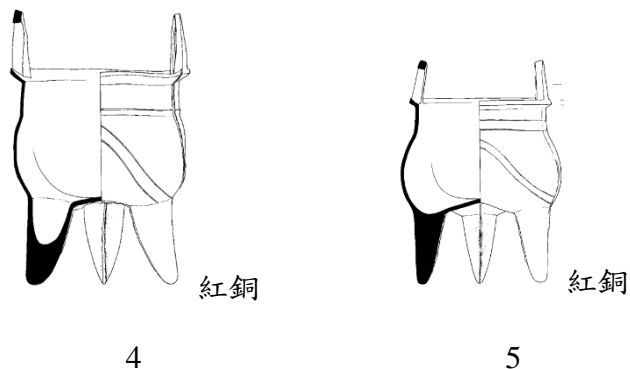
一、鼎、鬲為主的組合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城洋銅器以尊、壘和甗這類容器為重，但鼎和鬲器群以 23 件的數量緊追於 35 件的第一名容器類之後，並遠多於其他容器類數量的現象卻常被忽略。⁸³不過不同於容器不只量多器群也多，鼎和鬲為主的器群僅二組，且集中於早期。其餘零散出土的鼎，年代商晚期，性質不同於早期的鼎鬲組群。

(圖表 4) 1975 城固五郎廟鎮滑水村 b 點(圖省略 16 鏹形器，皆是二十幾公分)



⁸³ 孫華有討論到滑水器群，但其討論並無涉及器群的組合議題。孫華，〈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埋藏問題〉，頁 182-3。



1. 1975 年城固五郎廟鎮滑水村 b 點

(1) 年代

1975 年滑水河岸附近出土 21 件銅器，鼎 3、鬲 2、斝形器 16 件。⁸⁴除了 1 件柱足圓鼎，其餘 2 鬲 2 鼎都是錐狀足，採三分範，是商早期的鼎、鬲形制。2 件鬲(圖表 4-4、5)腹部飾 V 字形紋、鼎腹的弦紋也是商早期紋飾特點，其中 1 鼎上腹飾帶狀雲雷紋(圖表 4-2)，也見於商早期最晚段的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的扁足鼎上。但鼎與鬲耳與足配置關係為五點配置，且錐足跟較圓鈍，甚至其中 1 件鬲已是實足，年代應晚至殷墟一期。1 件圓鼎的足已成柱狀空足，腹較淺，且分範方式已出現三角形底範，年代可能較晚，接近殷墟二期郭家莊 M26 空柱足圓鼎。⁸⁵非容器部分僅出土斝形器，形制基本相同，皆二十多公分。

2004 年城固柳家寨河床發現一件錐足鼎，成分也為紅銅(銅 99.6%)。⁸⁶柳家寨與滑水村隔滑水相望，此件發現與河床的鼎可能本屬於滑水村器群，後被河水沖散。

整體來看，5 件三足器(含柳家寨鼎)有早期特徵的空錐足也有晚期特徵的實足，這種混雜現象在安陽殷墟一期的墓葬銅器組合有類似的情況，為過渡階段

⁸⁴ 一說出於 1973 年或 1975 年城固五郎廟。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 期(1980)，頁 216

⁸⁵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郭家莊東南 26 號墓〉，《考古》10 期 1998)，頁 38、39。

⁸⁶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論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紅銅容器〉，《中國國家博物館刊》，4 期(2012)，頁 134。

的特徵。因此推測 1975 年城固五郎廟鎮涇水村銅器群年代也大致在殷墟一期，呈現過渡階段的特徵。

(2) 器群特色

製造品質來看，鼎、鬲的器表則多見氣孔，其中一鼎(圖表 4-1)更有多處修補的現象，彎形器也多有漏銅的現象(圖 10)。成份上，容器與彎形器成份特徵也類似，5 件容器中，檢測過涇水 2 件鬲和 1 件柱足鼎以及柳家寨鼎皆為紅銅。彎形器也以紅銅為主，少數合金為砷銅和銻銅。

從風格來看，鼎、鬲的器形、紋飾與商中心的例子近似。不過，紅銅容器在商早期已罕見於中心地，鄭州、盤龍城發現的商早期銅器已確立以銅錫鉛三元合金為主的成份配方。⁸⁷同一時期，在周邊地區反而較多的紅銅容器出土，其中江西新贛、吳城與陝西關中有較多的出土。⁸⁸漢中鼎、鬲的例子反映在商中心周邊區域之間具有某種共性，這種共性在以下的器群也可看到。

2. 2002 年洋縣北環路

出土 1 鼎 1 戈。鼎的耳與足配置成四點，一耳置於一足之上，另一耳置於兩足之間，是屬於商代早期鼎的配置。上腹部飾細線淺浮雕的獸面紋，但紋飾線條不穩，每個紋飾單元有大有小、間隔不一(圖 11)，施作與 2004 年龍頭鎮一件類似的鼎，流暢、配置精確的紋飾呈現明顯的對比(圖 12)。與洋縣北環路鼎類似的例子在殷墟三家莊⁸⁹、江西新贛中稜水庫⁹⁰、江蘇連雲港⁹¹、陝西朱馬嘴、陝西銅川三里⁹²皆有發現，分佈地域甚廣。這些大鼎都呈現商早期的特徵，空柱足，腹部飾帶狀獸面，鼎身與足部都帶有鏤空的扉稜。

⁸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附錄二 盤龍城銅器成分分析〉，《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頁 539-544。

⁸⁸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論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紅銅容器〉，頁 132-138。文中整理商代出土紅銅器的地區。

⁸⁹ 孟憲武，〈安陽三家莊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考古》12 (1985)，頁 1139-40。

⁹⁰ 彭適凡、李玉林，〈江西新贛縣的西周墓葬〉，《文物》6 期 1983)，頁 93。

⁹¹ 尤振堯、陳克猷，〈江蘇新海連市大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勘察記〉，《考古》6 期 1961)，頁 321-3。

⁹² 盧建國，〈陝西銅川發現商周青銅器〉，《考古》1 期 1982)，頁 107+102+116。

殷墟三家莊為一處窖藏，除了出土此件空柱足鼎，還出土 3 件錐足鼎等，整批器物呈現商早期的風格，且多帶有修補的痕跡，反映殷墟早期與二里崗風格之間的聯繫，甚至這批銅器可能是由殷墟之前的王都帶來？另兩個出土集中地分別為長江下游與渭水盆地，其中江西新贛中稜水庫的銅鼎成分也為紅銅。⁹³很可惜其他的器物並沒有成份分析數據，因此無法判斷殷墟三家莊的鼎是否與周邊地區的鼎存在成份的差異。但上帶扉稜空柱足鼎的分佈區域，也同於渭水器群所反映的紅銅器地域，顯示漢中與長江下游的江西和渭河流域的關中三地之間具有共性。

二、小結：早期銅器群的特徵

城固龍頭與渭水兩個器群年代可以代表城洋銅器的年代上限，從器群內典型商器物判斷，年代皆在二里崗時期之後。以往學者多認為城洋銅器年代始自二里崗上層晚期，但若考慮整體器物群，年代上限較可能在二里崗期結束之後，但容器風格仍與商早期接近，不會晚於殷墟一期。

整體來看，相較於更晚時期的器群，早期的兩個器群出土的容器數量最多，種類也相對豐富。事實上，不管是分開或合併計算，1980 和 1981 龍頭鎮器群是歷來所有器群中出土最多容器類的器群。而除了典型的商器，早期已經出現富當地特色的器物，部分器物甚至顯示與商中心之外的地方的聯繫。尤其成份分析顯示，鼎、鬲雖風格儘管與商中心類似，但紅銅的成份卻可能與商周邊區域更有關聯，鼎和鬲並非直接來自商中心的可能性也不該排除。

同時，早期也很少零散的發現，這兩個器群基本上包括大部分早期的銅器。豐富種類卻集中出土的特性可能暗示早期的銅器屬於一次性獲取較大量的銅器，且掌握在特定的群體中。不過，時間相近的兩個器群在容器的組合、成分與品質方面卻有很大的差異，似乎反映不同的來源。龍頭鎮器群或存在一定變異，但明顯與二里崗文化關係密切，有可能承襲自另一個與二里崗文化有直

⁹³ 李朝遠，〈江西新贛中稜水庫的再認識〉，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2），頁 223。

接接觸的文化。潯水村器群，不管是紅銅成份或重鼎、鬲的習慣卻罕見於二里崗文化。潯水村的器物與彎形器的成分與品質更為接近，其來源可能與本土的青銅文化更為密切。在下一章會進一步分析兩個器群可能的來源，以解開當地青銅文化興起之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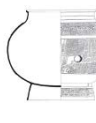



第二節：中期

中期是包含最多銅器的時期，除了器群數量多之外，也有相當數量的散出單件器物。不僅是整體的出土數量，器物種類也更為豐富，顯示中期是漢中青銅時代的高峰期。其組合特色與早期比較，缺乏以鼎、鬲為主的器群，不過重視容器仍是顯著的特色。以下將中期分為兩類來討論，第一類是延續早期的組合特徵—以盛裝器為主的「列器」組合。第二類也以盛裝器為主，但往往只有一兩件，並且多數與武器、工具等小型銅器共伴出土。

一、成套的容器組合

1. 1990年洋縣馬暢安塚銅器群⁹⁴

(圖表 5)洋縣馬暢安塚的列器

					
23.6 公分	殘 27.3 公分	31 公分	36.7 公分	23.6 公分	24.1 公分
4.179 公斤	3.465 公斤	13.868 公斤	9.362 公斤	4.497 公斤	4.876 公斤

潯水河西岸的洋縣馬暢一帶共有五六個土包，多有發現銅器，安塚村落便坐落在土包上。器群是 1990 年農民整地時在距地表 30 公分處發現 5 甌 1 壺。容器的年代特徵明顯，甌是殷墟時期才興起的器形，集中在殷墟一、二期，其

⁹⁴ 李燁、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6 期 1996)，頁 75。

分布範圍除了安陽殷墟，也廣泛見於周邊地區。⁹⁵最大的甗(圖表 5 之左 2)，獸面紋為羅槲的 style III 獸面紋，與殷墟一期小屯 M232 近似，稍晚的二期花園莊 M60 也有近似例子。⁹⁶其餘三件甗的獸面紋類似，已屬於主地分明的羅槲 style IV，年代應稍晚於第一件。最後一件甗(圖表 5 左 1)腹部飾雲雷乳丁紋，殷墟二期始流行。

安塚出土的圓壘(圖表 5 之右 3)與城固龍頭的「壘」(圖表 4-2)不同，前者在肩部有兩耳和腹下部一側有一鑿，有無鑿耳反映使用方式的不同，因此如林巴奈夫所言兩者應該區分開來。⁹⁷扶風莊白窖藏出土自銘「壘」的器物帶耳帶鑿，⁹⁸因此安塚出土的這類器物才是真正的壘，滑水的應是尊的一種類型—截頭尊。安塚圓壘無圈足，頸部仍飾弦紋，底部為凹，類似的形制見於殷墟二期，如小屯 M18)近似。整體來看，此批器群年代大約是殷墟二期。

此外，儘管 5 件之間品質略有差異，但整體大致製作精細。飾有 style III 獸面的甗是一件高 31 公分、重達 13.9 公斤的重器，紋飾繁密細緻；另 4 件甗相較之下器壁較薄，且腹部兩紋飾帶之間可見墊片脫落的痕跡(圖 13)。其中，雷紋乳丁甗腹部見補鑄痕跡，不過配合原本的紋飾來補鑄，修補相當精細(圖 13)。5 件甗製作的差異並不足以推論為殷墟製品和當地粗劣仿製之差。甚至，從成分來看，5 件器物具高度一致性，皆為銅錫鉛三元合金，且錫含量普遍較高。⁹⁹富錫的現象出現在殷墟二期的安陽，¹⁰⁰此點更強烈支持這批甗是安陽進口的看法。

據《城洋》，安塚器群出土時的器物擺放有一定的次序，壘置於中間，五件

⁹⁵ 張昌平，〈商代銅甗概論〉，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2)，頁 99-114。

⁹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 60 號墓〉，《考古》，1 期(2006)，頁 7-23。

⁹⁷ 林巴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頁 67-8。

⁹⁸ 自銘「陵作父／日乙寶／壘」，詳見：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銅器窖藏發掘簡報〉，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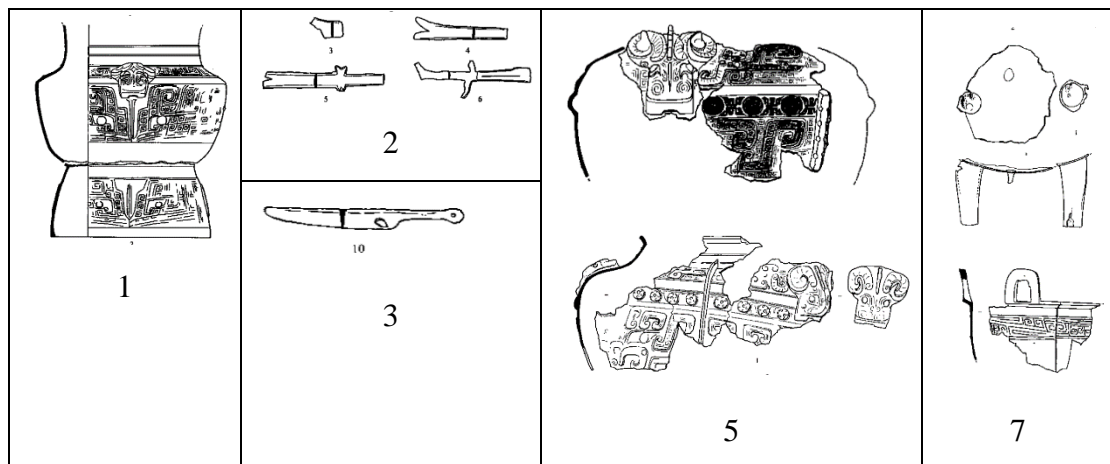
⁹⁹ 皆高於 10%，最高者甚至超過 20%。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54-5。

¹⁰⁰

甗位於左右，¹⁰¹宛如祭壇上的列器，可能與祭祀等禮儀活動有關？相較於對早期龍頭器群「列尊」的推測，安塚的出土資訊證實列器組合的存在。安塚的器物從風格和成分雙方面來看，應該是外來，可能直接來自安陽。此器群與早期的龍頭器群性質類似，兩者精良的品質和三元合金的特性，反映是進口的產品。這些進口的容器在漢水上游青銅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2. 1964 城固五郎廟 b 地點器群

(圖表 6) 1964 城固五郎廟 b 地點器群(部分)



1964 年城固五郎廟出土另一批器群，由於坍塌將器物壓成碎片，因此器群明確的面貌、確切的出土數量並不清楚，分析組合特性有一定困難。此器群至少有 24 件銅器，有 1 刀、璋形器數件、尊(截頭尊和敞口尊)數件、鼎數件。尊、鼎數量不少，但鼎大多是小殘塊¹⁰²，較難分析，而尊數量多也有一定的特性，故將器群歸於以盛裝器為主的組別。

器群的年代，其中 1 鼎飾斜角雲雷紋，類似安陽武官村 M1 鼎¹⁰³，殷墟一期。此外，數件截頭尊和敞口尊似乎表現出地方特色。2 件截頭尊殘片(圖表 6-5)與瑞典遠東博物館藏截頭尊幾乎一模一樣(圖 14)，年代殷墟二期。¹⁰⁴遠東博

¹⁰¹ 趙叢蒼，《城洋銅器》，頁 246。

¹⁰² 趙書統計容器 7 件，鼎 9 件，但是鼎的數量可能高估，他將每個小殘片視作一件。

¹⁰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安陽工作隊，〈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3 期(1979)，頁 224。

¹⁰⁴ Mette Siggstedt and Fang-mei Che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 Period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ates: A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 (2009), p.

物館截頭尊據說出土於湖南長沙，¹⁰⁵而上腹部的圓鼓渦紋與井字花紋相間的紋飾帶也證實是長江中游特色的紋飾。¹⁰⁶五郎廟 2 件截頭尊與湖南出土商代銅器關係密切。有鑑於極度相似的樣子，甚至有可能是長江中游進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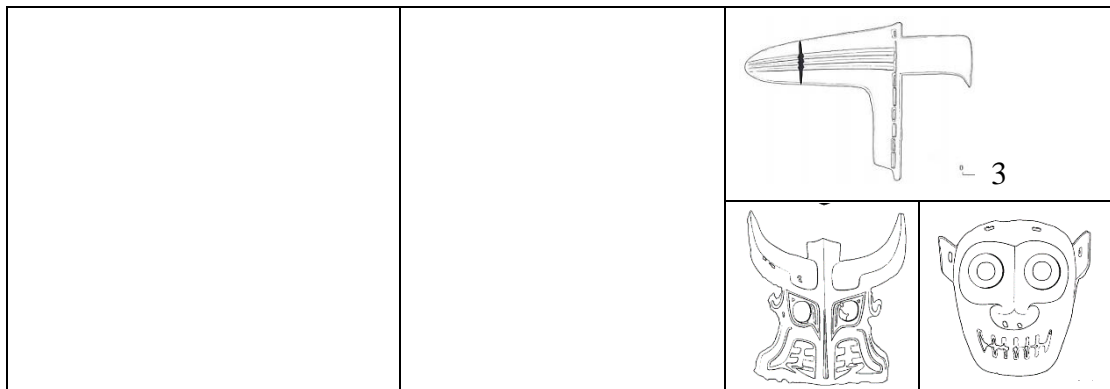
另有 1 件尊殘片頸部以上不存(圖表 7-1)，但這類敞口尊在城洋地區發現數件，五郎廟於 1975 年又出土一件近似的敞口尊。尊的器形令人聯想到二里崗時期的傳統，但獸面紋卻帶有地方特色，可視為另一件出土於 1963 年蘇村塔塚尊獸面紋(圖 16)的簡化版本，代表鼻樑的 T 字形部位仍保留，但原本清楚區分出主地紋的 style IV 獸面取代成粗細一致的雲雷紋(圖 15)。

二、一兩件盛裝器搭配其他小件器物的組合

1. 1976 年城固蘇村小塚

城固蘇村小塚坐落在一土包上，共出土過 3 批銅器。1976 年的器群是農民挖姜窖所發現，銅器是埋藏在直徑約 1.3 公尺的不規則圓坑內，出土時 2 方壘倒置，彼此距離 10 公分，旁邊散置戈、人面飾、獸面飾和透頂銅泡，而壘內有尖頂銅泡，全部共 414 件銅器。¹⁰⁷容器為典型的商器，但武器和小型銅器卻罕見於中心地。

(圖表 7) 1976 年城固蘇村小塚器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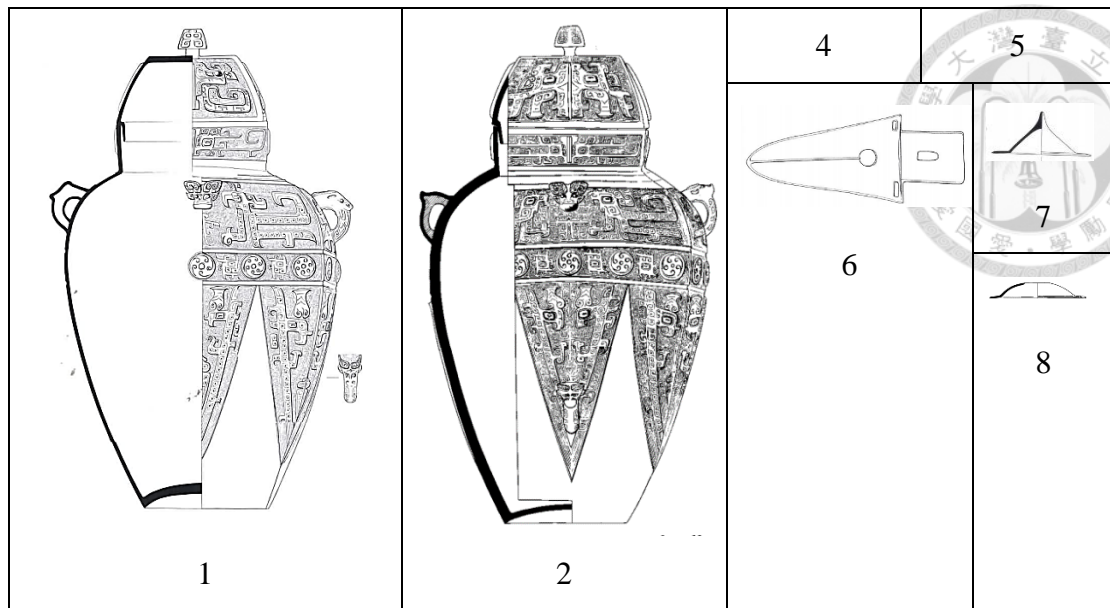


112.(以下簡稱 BMFEA)

¹⁰⁵ Bernhard Karlgren, "Note on Four Bronzes," *BMFEA* 25 (1954), pp. 369-374.

¹⁰⁶ 林巳奈夫，〈殷西周時代の地方型青銅器〉，頁 17-58。

¹⁰⁷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 期(1980)，頁 211-5。



2 件方罍紋大小、紋飾、器形近似，其中一件銘文「亞伐」（圖表 7-1）。方罍的年代特徵明顯，無圈足、底部略凹的型態是早期方罍的特徵，與婦好墓方罍的紋飾和器形都近似，又帶有銘文，可能是殷墟工場所出，年代在殷墟二期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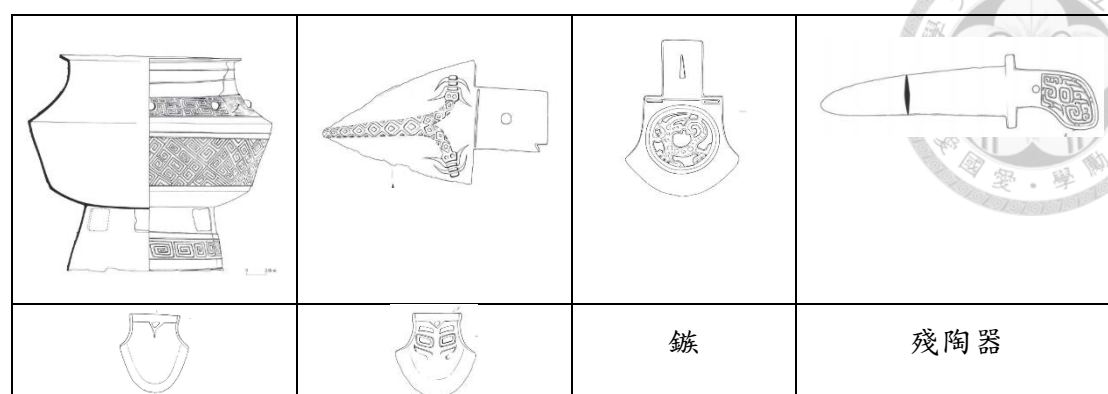
三角援戈 83 件，大體形制相近，皆成等腰三角形，內在正中間，無欄兩側皆有長方形穿(圖表 7-6)。細部有些變化，戈的鋒部有些尖銳、有些圓頓，凸脊有一道也有三道，內部的穿孔有圓形也有近三角形。無欄、援部為等腰三角形的戈制早在盤龍城即有，¹⁰⁸但與小塚類似，援部更寬且內在正中央的形制主要見於殷墟中、晚期(圖 21)。¹⁰⁹小塚器群年代也大概是殷墟二期，可見漢中與安陽兩地在同時期的三角援戈形制差異不大。

2. 1964 年城固五郎廟村器群

¹⁰⁸ 有學者將盤龍城此型的戈視作三角援戈的援型；郭妍利，《商代青銅兵器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4），頁 58。

¹⁰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工作隊，〈1969—1977 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 期(1979)，頁 88。

(圖表 8) 城固五郎廟村 1964a 地點



1964 年發現的器群有 1 截頭尊、2 戈、3 斧鉞、15 鍬。¹¹⁰

此器群的容器與武器多具有區域特色。截頭尊，紋飾雖為羅越 style I 的細線淺浮雕，但腹上滿裝的勾連雲雷紋卻至殷墟一期才出現，而器形還保留頸口飾兩道弦紋的樣式，折肩、腹下急遽內收形成折角，是二里崗窄口尊的進一步發展。相較之下，殷墟從二里崗時期的窄口尊進一步發展出來的是甗，折肩被圓肩取代，盛行於殷墟一、二期，上述洋縣馬暢安塚的甗即為典型的樣式(圖表 5)。

五郎廟的截頭尊明顯無法歸於殷墟銅器系統中。中介的器形出現在長江流域湖北黃州下窯嘴墓(圖 17)，下窯嘴的尊與二里崗原形接近，但其腹部滿裝的獸面紋飾，年代晚於二里崗時期，墓葬中其餘容器皆為典型二里崗下層二期的器物，被視為盤龍城商文化類型的墓葬。¹¹¹下窯嘴的肩上目雷紋與五郎廟的尊一致(圖 18)，但五郎廟尊出現不見於商傳統的高圈足以及大而明顯的方足孔。因此五郎廟截頭尊在承襲二里崗尊的傳統之上，進一步發展成帶有區域特色的器類，與安陽銅甗流行時期並行，年代應不晚於殷墟二期。

武器類較難以精確定年。鍬皆是雙翼、有鋌，不過目前對鍬的器形學研究仍難以提供精確的斷年標準。曲內戈為典型的商樣式，商早期曲內戈僅在盤龍城發現，商晚期之後就罕見。五郎廟曲內戈屬較早的形制，接近盤龍城 M3 曲

¹¹⁰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 期(1980)，頁 215-6

¹¹¹ 吳曉松、董子儒，〈湖北省黃州市下窯嘴商墓發掘簡報〉，《文物》6 期(1993)，頁 56-61。

內戈¹¹²、蒿城台西、武官村 M1，與較晚的殷墟三期郭家莊 M160 無欄，且鋒成尖三角差異較大，年代應該在二里崗晚期到殷墟二期之間。

其餘的 3 件斧鉞和 1 件三角援戈則很有區域特性。三角援戈無欄、無穿孔，援部的雙頭一身龍紋飾不見其他例子。戈的內部位置在中間偏上，且上側刃部微向下弧彎，是較早的形式，類似的例子見於河北台西、三家莊和小屯 M232，皆是殷墟一期偏早的階段。¹¹³

從製造技術來看，截頭尊的紋飾線條不流暢，口沿處有一大片補鑄痕跡，製作不精。武器銅質厚重，較容器製作優良。組合來看，儘管沒有形成列器，但仍以大型盛酒器為主，而不見食器和觚、爵等飲酒器，與其他的器群組合具共通性。容器與武器的風格多罕見於殷墟，但缺乏彎形器或璋形器。

3. 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

1963 年在塔塚村附近的潯水河岸發現一批銅器，出土 1 尊和 15 獸面飾，器物風格都與中原不同。

尊的器形接近殷墟二期的大喇叭敞口、高圈足的尊(圖 19)，但塔塚尊的頸部仍保留商早期裝飾弦紋的方式，而殷墟喇叭尊的頸部則飾有繁複的蕉葉紋，此外高圈足、偌大的足孔、斜肩上裝飾高起的鳥形扉稜與頸腹交接處帶倒鈎稜的獸首也不見於殷墟。塔塚的尊與南方銅器的關係更明顯(圖表 9)，類似的例子發現在安徽六安¹¹⁴、湖北江陵¹¹⁵、四川三星堆 2 號坑¹¹⁶和三峽大寧河區域¹¹⁷，但三者腹部主體紋飾皆是浮雕的五官分散式獸面紋，並且在獸角、鼻、額、耳處有圓豆鼓起，而塔塚尊則是 style IV 雷紋底平面獸。塔塚的與三星堆的獸面(圖 88)最相似，兩者皆自殷墟一期出現的 style III 獸面(圖 89)演變而來，

¹¹²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上》。頁 385。

¹¹³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蒿城台西商代遺址》(北京：文物社，1985)，頁 133。

¹¹⁴ 李勇、顧巖，〈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大型商代銅尊〉，《文物》12 期(2000)，頁 62-8。

¹¹⁵ 王從禮，〈記江陵岑河廟興八姑台出土商代銅尊〉，《文物》8 期(1993)，頁 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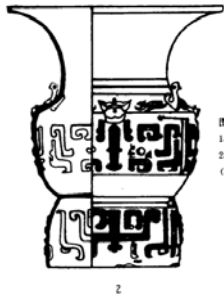


¹¹⁶ 朝日新聞社編，《三星堆：中國 5000 年の謎・驚異の仮面王国》(東京：朝日新聞社，1998)，頁 128。

¹¹⁷ 鄒後曦、王風竹，〈三峽考古佐證長江文明〉，《中國國家地理》26 期 6 (2003)，頁 70。

但進一步出現主、地紋的區別，因此年代至少是殷墟二期，不過與同期安陽獸面紋比較，有一定的變異。

獸面飾 15 件大致一樣，兩角粗大類似牛首。大部分都有漏銅現象，有些具有規整的小圓孔，應是鑄孔，但位置不固定，大多在眼睛上方。有學者稱為面具，但從鑄孔的情況來看有點不像。陝西關中老牛坡 M10、M41¹¹⁸也發現一樣的獸面飾，參考墓葬的年代為殷墟二期，也與容器推論年代一致。

(圖表 9) 敞口尊比較

			
城固蘇村塔塚 高 46 公分；重 10.3 公斤	湖北江陵 高 46.2；16.5 公斤	三星堆 2 號坑 高 56 公分	大寧河李家灣

三、不含青銅容器的組合

1979 年洋縣謝村鎮范壩村器群，不同於其他的器群，不含青銅容器，主要是武器與小型飾件，並伴出石器 15 件。有 4 鉞、8 戈、2 刀、17 鏃、13 彎形器、10 璋形器、2 器柄飾件、1 鳥頭形飾、2 眼形飾、2 魚形飾、1 鈴，共 52 件。

8 件直內戈皆是有欄、窄條形援，與龍頭鎮器群直內戈差異並不大。直內長援戈出現於二里崗時期，一直到西周歷久不衰。范壩戈的鋒尚未呈具折角的尖銳三角形形態，不晚於殷墟二期。其中，1 件內的尾端稍凸出，但尚未有歧齒，鋒部較接近三角形，年代可能稍晚。金沙遺址也出土一件，可見西周初此

¹¹⁸ 劉士莪，《老牛坡：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田野發掘報告》（西安市：陝西人民，2002），頁 251-2。

形式戈在四川仍存在。¹¹⁹2 件戚形鉞形態近似於一件出土於河南靈寶殷墟二期的發現(圖 20)。¹²⁰ 范壩許多的器物，尤其是小型飾件，都與四川盆地的青銅文化密切相關。鳥形飾、眼形飾、魚形飾、鈴都可以在三星堆器物坑和稍晚的金沙遺址找到類似的例子，兩遺址的年代介在殷墟二期至西周初之間。參考武器與飾件，整體體年代應接近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約是殷墟二期。

三星堆器物坑的小形飾件作為神樹的部件，是祭祀用銅器的一部分，不過范壩器群是否具有類似的性質尚無法肯定。范壩出土 10 件璋形器，城固地區發現最多數量的一批。璋形器的 V 歧鋒向外分披且器身有兩齒，應仿自三星堆的牙璋(圖 22)，但較粗糙，不像玉器雕琢齒之間的鋸齒細紋。其實三星堆本身也有發現銅質的璋形器。¹²¹但與范壩的璋形器很不同。三星堆的銅質璋形「箔飾」尺寸較小，僅厚 0.1-0.2 毫米，後端有圓孔可垂掛，推測是青銅樹部件，與玉璋用途、性質很不同(圖 23)。璋形飾、鳥形飾據報導用銅箔鍛打而成，¹²²同樣的特徵延續到金沙遺址，小器物也幾乎是鍛打。¹²³相較之下，范壩的璋形器尺寸稍大，也缺乏孔洞，不太確定是否為飾件，且採用鑄造故器身也稍厚。

儘管三星堆與范壩都出現仿玉璋的銅質器，但兩者呈現的差異反映功能不太一樣。同時，玉璋的功能也可能不同，三星堆 2 號坑出土一件持璋跪坐人像(圖 24)，生動描繪玉璋的使用方式。范壩的璋形器至多 20 公分，大概是成年人手掌長度，跪坐人像胸前的璋高達頭部，尺寸更大，三星堆玉璋最大者達 50 公

¹¹⁹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考古》4 期(2004)，頁 13。

¹²⁰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靈寶出土一批商代銅器〉，《考古》，1 期(1979)，頁 20。

¹²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紀錄》(成都市：天地，2009，第一輯，頁 227)。

¹²² 三星堆璋形器、魚形飾等銅箔片，有學者推測為鍛打成形[陳芳妹，〈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故宮學術季刊》23 期 2 (2009，台北)，頁 30。]，不過目前為止並沒有科學分析的佐證，甚至有學者認為三星堆基本上都是鑄造[蘇榮譽，〈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鑄造工藝的初步考察〉，收入華 孫 and 榮譽 蘇編，《神秘的王國：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成都市：巴蜀書社，2003)，頁 401。]。唯一報告有明說是鍛打的是青銅樹枝的某一個部分[曾中懋，〈三星堆出土銅器的鑄造技術〉，《四川文物》6 期 1994)，頁 315。]。金沙器物的部分，則有科學檢驗的佐證。鑒於三星堆這些銅箔片極薄，且三星堆與金沙兩地器物內涵極為接近，故筆者也認為認同三星堆的薄飾件應是打製成形。

¹²³ 尚璘、楊軍昌、韓汝玢，〈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金屬器的實驗分析與研究〉，《文物》04 (2004)，頁 78-89。

分左右也符合描繪。就這點來看，范壩器群雖然器物很像三星堆，但存在某種變異，不宜倉促認定其性質有如三星堆般的「祭祀坑」。¹²⁴



四、小結：中期器群的特徵

中期是包含最多銅器的時期，除了器群以外，也有相當數量的散出單件器物。重視容器仍是顯著的特色，但相較於早期的器群，中期組合呈現更複雜的情況，其中最常見的組合是一兩件容器與數件武器、工具等小型銅器共伴出土。不過，早期那種容器較多的大器群組合在中期仍存在，且與早期的器群類似，都有彎形器或者新出現的璋形器伴出。甚者，出有璋形器 1979 年洋縣范壩與 1964 年五郎廟 b 地點器群皆是中期器群裡出土的器物數量較多、種類較豐富的器群，類似於出彎形器的早期器群。兩個器群的器類迥異，風格也反映與不同區域的聯繫，暗示握有璋形器、彎形器的人群能夠獲得來自不同地方的銅器。而與容器較少的小器群相比，大器群的容器較可能是外來器物，此特點值得注意。

相較之下小器群的容器來源更為多樣，有典型商器、也有近似於長江中游的例子，甚至有在風格上不見於他地的容器。不過這種容器數量較少的器群卻沒有彎形器的伴出，或許反映其與大型器群在埋藏活動上所差異。同時，小器群中出土有特點的簡化獸面尊、有銜斧和三角援戈，在漢中也常見單件出土的例子。可以說，儘管容器數量沒有大器群多，但出土地點的密度更高，這或許反映容器較少的小器群所代表的埋藏活動，比起大器群所代表的埋藏活動，在當地更為普遍。整體來看，中期整體的出土數量，器物種類較早期更為豐富，顯示中期是漢中青銅時代的高峰期。銅器複雜的風格，也反映此時期與其他地區交流互動更為興盛。中期作為漢中青銅時代最興盛的時期，將會是探索區域特性重要時期。

¹²⁴ 羅泰持此看法。



第三節：晚期

一、一兩件盛裝器搭配其他小件器物的組合

1. 1988 年城固五郎廟(圖 25)

城固縣五郎廟鎮五郎廟村坐落於高出地表 2 至 2 公尺的土丘上，曾多次出土銅器。1988 年的器群僅出 1 甗 1 戈。

甗肩部帶三獸首，在殷墟有獸首的甗出現在殷墟二期，但與之相比，1988 年城固甗的器形稍有殊異，下腹部曲折向內，不同於典型甗無折角、圓潤的造型(圖表 5)。城固蓮花鄉也發現 1 件極像的甗，兩者僅有獸面紋的局部稍異。這種器型的甗多見於博物館藏，出土的例子就是城固兩件，內田純子將之視為山西、陝西一帶的地方型甗。¹²⁵但是兩甗肩上的獸首卻採用不同的鑄造方法：¹²⁶五郎廟甗的獸首與器身也疊壓痕跡，應後鑄接於器體；但蓮花村甗的獸首是與器身渾鑄，內留泥芯，獸首下方也見芯孔。五郎廟甗獸首的後鑄法是殷墟二期盛行的技術，蓮花村甗採盲芯加支釘做法被內田氏視為地方型銅器的技術特點，在維持商早期一體成形的作法下又融入殷墟後鑄法安裝附件模範的概念，因此年代不會早於殷墟二期。¹²⁷儘管 2 件甗外表近似，但採取不同獸首鑄造方法，可能意味兩件器物來源不同。但兩者與殷墟銅器風格非常接近，或許年代不會晚於安陽同類形器物太多，因此還是視作殷墟二期或稍晚。

五郎廟器群也出一件直內戈(圖 25)，援呈銳三角型，鋒兩側有孑刺，不見其他例子。但鋒兩側隱約內凹，帶有一點晚期蜀式戈的味道，接近西周初竹園溝 M7 的形制(圖 26)，不過還是保持較多商代長條援直內戈的面貌，推測為殷墟三期。

¹²⁵ 難波純子(內田純子)，〈地方型甗的發達與三星堆出土的早期銅器〉，收入宋鎮豪、尚先進編，《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2003)，頁 148-57。

¹²⁶ 內田純子僅討論五郎廟的甗，上文討論時作者提到尚未親身目驗過器物，但她推測器物是採用內有盲芯的做法(即蓮花村甗的作法)。陳坤龍目驗過兩件甗，並確認蓮花村甗的獸首下方有個兩個芯孔，與內田推測相符，但五郎廟獸首疊壓鑄器身的紋飾證實其鑄法不同於蓮花村甗，是採取後鑄法。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72。

¹²⁷ 內田純子(難波純子)，〈華中型青銅彝器的發達〉，《南方文化》，3 期(2000)，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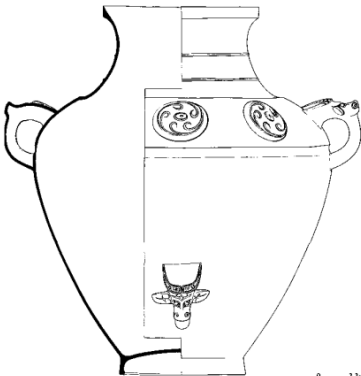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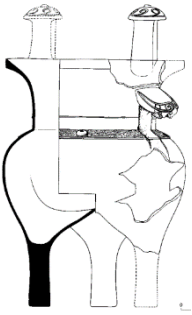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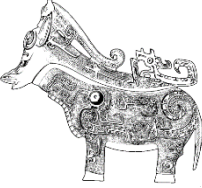
整體來看，甗是基於殷墟甗的變化，年代不早於殷墟中期，而直內戈的定年確定甗的年代可能晚至殷墟晚期，因此整體的年代宜作殷墟晚期。



二、其他器群

1. 1981 年洋縣小江鄉張村

(圖表 10) 1981 洋縣小江鄉張村器群

 高 20 公分左右	 <small>0 3.3m</small>	
		
高 19.5 公分；重 1.17 公斤	高 39.2 公分；重 6.81 公斤	高 31.9 公分；重 3.46 公斤

1981 年修築漢水南岸河堤發現 1 動物形尊、1 罍、1 罈和 1 鼎，¹²⁸整體年代不早於殷墟三期。下接實柱足根的袋足罈盛行於殷墟晚期至西周初，菌狀耳特徵較早，應是殷墟晚期。張村圓罍形制晚於洋縣馬暢安塚圓罍，帶圈足底內凹也是流行於殷墟晚至西周初，近似殷墟三期安陽戚家莊東 M269 罍。¹²⁹鼎已不見實物，僅有線描圖，上腹飾夔紋，下腹三角蟬紋，也常見於商晚期。物形尊在殷墟始見於二期的婦好墓，其實在南方更為盛行，此器與南方的關係貝格利已有精彩論述，年代為商晚期。¹³⁰

¹²⁸ 李輝、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6 期(1996)，頁 73、74。

¹²⁹ 孟憲武，〈殷墟戚家莊東 269 號墓〉，《考古學報》03 (1991)，頁 335。

¹³⁰ Robert W. Bagley, "A Zun from Yang Xia," in 曹偉 ed., 漢中出土商代銅器 (成都：巴蜀書社，2010), pp. 570-600.

成分分析顯示罈和動物形尊一致具有較多的雜質，較顯著為鐵和砷。¹³¹動物形尊從風格來看可能與長江中游有關，但罈卻沒有顯著的區域特色，甚至在漢中或長江中游都不是受青睞的器類，因此不能將特殊成份與南方來源聯繫。

此器群的組合也不同于以往的器群，雖然仍不同於商中心以小形飲酒器為主，但也不是一兩件呈酒器搭配兵器或工具的組合。器群中的罈在漢中很少見，僅出土 2 件。另一件五郎廟的罈年代也是商晚期。¹³²此罈三足部中空，為商早期銅器的特徵，但腹部回首鳥紋卻是西周中期鳥紋，而口沿的兩兩相對的鳥組成蕉葉式的細線紋飾也不常見，西周中期豐尊¹³³有類似的構圖但紋飾為主地區分的 style V(圖 28)。柱上立物不存，但學者參考關中賀家村出土的鳳柱罈(圖 29)，推測五郎廟罈可能類似，五郎廟罈與關中的密切關係，從紋飾來看似乎也符合。¹³⁴中期器類複雜但組合卻有一定共性的情況不同，此組器群更像隨意的組合，故歸於其他一類。¹³⁵

2. 散出器物

散出器物雖無法歸類於器群，但漢中晚期以散出器物為主，本身就是一個特徵。個別器物甚至可晚至西周中年，例如城固縣文化館徵集的盤(圖 30)，帶附耳的特徵不同於商代的盤，近似於牆盤(圖 31)。不過在散出的器物中，主要討論鼎和尊兩類，兩者都是前兩期有發現的器類，考察他們在晚期的情況能與之前對照。

第一類值得注意的鼎。漢中早期出土一大批的鼎，形制與二里崗文化鼎一致，但成分為紅銅。其餘零散出土的鼎，年代都是商晚期的鼎。洋縣張堡鼎，

¹³¹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59、60。



¹³² 有學者認為是西周早。李朝遠，〈城固洋縣銅器所含周文化因素之我見〉，《漢中出土商代銅器》，頁 84。

¹³³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5：西周 1》(北京市：文物，1993)，頁 152，圖 160。

¹³⁴ Robert Bagley 和李朝遠皆提及，Bagley 進一步認為陝西罈可能是受長江流域的影響。

¹³⁵ 也不排除不同器組混在一起，在 1996 年發掘報告紀錄器物分別出自 1964 和 1981，但在趙叢蒼書中為同一組。李輝、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6 期(1996)，頁 73、74。

深圓腹，三細柱足略為上粗下細，腹上飾簡化獸面紋。簡化獸面頗常見於先周的鼎上，眼睛多是簡略的方眼，不同臣字眼中帶圓瞳，直到西周初仍很多(圖 33)。與先周的關係也反映於城固呂村出土的盆式簋，近似陝西扶風美陽簋(圖 34)。¹³⁶不同於商式鼓圓腹矮圈足的簋，先周特色的簋腹較直，下腹急收形成明顯折角，圈足較高且帶臺，圈足也帶有特點的簡化獸面紋。

寶山遺址不遠處曾偶然發現一鼎(圖 35)，出土的地層有較多灰渣和黑皮灰胎的陶片，應是位於當時人們活動的區域。鼎足上部較粗，乍看有點春秋時期的蹄足味道，不過足內側微內凹，立耳很薄，這樣的特徵接近長江中游鼎的特色。湖南高砂脊出土帶地方特色的鼎，足呈形，足內側平坦，若把芯土挖掉柱足會呈現形，在內側呈現凹槽。參考陶器的定年，高砂脊遺址的年代儘管還有商晚或西周早期的爭議，但絕對早於春秋蹄足鼎。¹³⁷眾多特徵顯示寶山鼎與湖南商末周初這批鼎相似。

不同於漢中早期的鼎彼此性質相近，晚期零散出土的鼎展示非常不同來源，其中與關中的關係不僅表現在鼎，盆式簋、上節的鳥紋斝也與周人銅器很有關聯，反映商末周初時期陝南與陝西中部的交流。

尊是漢中青銅文化重要的器類，然而在晚期也不見成組的出土，但是零散出土的尊與前期同類器物有延續關係。洋縣採集到的素面尊右(圖 37)尊 1964 陝西洋縣張村 殘高 20.5 公分、重 1346 克 《漢中出土商代銅器》，1 卷，頁 62。左(圖 38)和 1964 年洋縣張村出土的尊右(圖 37)，兩者的器形基本一致，與殷墟小屯 M18 類似(圖 46)，但圈足帶有先有一段直壁後略敞，是殷墟三期的大口尊樣式，但與殷墟同型器還是有差別。反倒在湖南高砂脊 M1 出土一件類似的例子(圖 45)，年代也訂為殷墟三期。湖南與漢中的尊仍保留二里崗時期在

¹³⁶ 有可能出自岐山王家嘴，該地多次出土周末或西周初的銅器，被視為周人活動區域。曹璋，《周原出土青銅器 1》(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 7。

¹³⁷ 向桃初認為年代只能是西周初或更晚些，但李學勤、施勁松等認為銅器年代可早至殷墟時期。向桃初，〈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掘〉，《考古》04 (2001)，頁 41-44；施勁松，"對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銅器的再認識," *ibid.* 12 (2002)，頁 59-63。

頸與足部飾弦紋，但圈足已無足孔或極小。而張村腹部主體紋飾看似商早期的 style III 沒有主地區分的獸面紋，不過線條更為平板、重複性，像熟知完整獸面紋(style IV 的獸面)的工匠所作的粗造簡化，類似的獸面紋尊在湖南株洲也徵集到一件。¹³⁸漢中兩件尊顯示與湖南密切的關係。

漢中青銅文化晚期以零散出土為主，縱使有器群，其組合也不像前兩期有很明確的特色。1988 年城固五郎廟器群組合仍保持中期常見的一件容器搭配兵器的組合，甗本身約是年代商中期，但武器年代較晚，反映中期組合習慣的延續。漢中晚期零散銅器反映的關聯中，與長江中游方面的聯繫早在中期就存在，但與關中聯繫在前期不明顯，而到晚期較為凸顯。

第四節：漢中銅器群的性質

第一章是以器群為單位分析這批未經科學發掘的城洋銅器，藉此突破以往僅就單件器物的風格分析。透過上述的分析，本文注意到城洋銅器一些特點。

年代方面，首先器群的分析將城洋銅器的年代上限拉晚，本文認為城洋銅器群出現年代不會早至二里崗時期。個別器物雖然可早至二里崗上層，但考慮其共伴的其他器物，整體年代晚於二里崗時期。其次，器群的年代特色是一個器群內很少出現既有年代很早又有年代很晚的器物，而不同器群彼此的年代也不一樣。曾有學者認為漢中地區大量的銅器可能是商末周初之際驟然大量埋入，¹³⁹但如果是這樣，器群應或多或少會出現不同年代器物混雜，如西周末年周原大量出土的青銅窖藏；又或者因為埋藏時間相近，不同器群之間年代差不多。但實際上漢中器群的年代跨幅大，因此本文認為漢中銅器的埋藏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不斷進行，反映當地應有一個用銅文化持續的發展。其地點、組合或時間具有高度的規律性，代表背後的社會形成一套相當規範化、正式的

¹³⁸ 熊建華，《湖南商周青銅器研究》（長沙市：岳麓書社，2013），頁 86。

¹³⁹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 431.

活動，反映「儀式」特性。¹⁴⁰因此，相較於窖藏的說法，或許祭祀埋藏的說法更有可能。¹⁴¹

在早、中、晚期三個階段，銅器組合是有變化的。本文將器群分為四個主要大類，(1)成套的容器為主組合(2)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兵器等小件銅器(3)以鬲、鼎為主的器群(4)無容器組合，另外還有補充兩種類型，包含無法歸類的組合和零散出土一類。

在早期的器群組合以大器群為主，包含(1)以容器為主的器群和(3)以鼎、鬲為主的器群，兩種器群的容器在風格上都與早商銅器相似，但同時也有出土不見於商中心的武器和彎形器，尤其彎形器在兩種器群都具備。相較於之後時期器群的容器組合，早期器群的種類與數量都較多。由於器群內容器的成份和風格都類似，如 1975 城固五郎廟滑水 b 地點以紅銅鼎、鬲為主，可能同一器群的容器都是同一來源。

中期四種類型都具備，呈現組合多樣性，反映中期是興盛期。其中(1)和(4)類與早期的器組性質類似，皆是銅器種類、數量較多的器群，但同時單一器群內的銅器之間卻共性高，反映同一個來源，例如 1979 洋縣謝村范壩器群整體與三星堆銅器有密切關係，而 1964 城固五郎廟 b 地點的整體容器跟長江中游密切相關。同時，這兩類器群也都有彎形器或璋形器伴出。因此，中期的(1)類和(4)類組合可視作延續早期器群的組合特色。

早期與中期的(1)、(3)、(4)類組合的器群，儘管各自組合特色不同，但器群內銅器數量較多且風格一致，又缺乏零散發現反映出土較為集中，可能暗示這些銅器屬於一次性大量獲取，僅掌握在特定的群體中，而都具有彎形器或璋形器的特性或許反映或具有特定的埋藏儀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期產生新的組合：(2)兩件容器搭配兵器等小件銅器。儘

¹⁴⁰ Stanley J. Tambiah, "A Performative Approach to Ritual," in *Readings in Ritual Studies*, ed. Ronald L. Grimes (NJ: Prentice Hall, 1996), pp. 495-510.

¹⁴¹ 孫華、趙叢蒼皆採此說。趙叢蒼，《城洋青銅器》，頁 246；孫華，〈試論城洋銅器存在的歷史背景〉，頁 36。

管(1)和(2)類都以尊、壘或甗為主要的容器，¹⁴²但(2)類一次僅出土一、兩件，且容器種類也不如(1)類多樣。不過，(2)類器群的數量較多，器群內的銅器風格較為多樣，武器、工具和飾件普遍具有特點，過去研究者關注的三角援戈、帶大孔直內鉞皆出自(2)類組合的器群；容器方面，1976 城固蘇村小塚的方壘為典型殷墟風格，1963 城固蘇村塔塚敞口尊在長江中游和三星堆皆找到類似例子，而1964 城固五郎廟截頭尊則罕見於其他區域。同時，這些類似的器物也多另有單件出土的例子，如 2004 年偶出敞口尊與 1963 城固蘇村塔塚的尊類似，而敞口尊也在 1974 城固蘇村塔塚、1975 城固五郎廟各自發現單件的偶然出土，或三角援戈也另有多例的散出例子。(2)類組合的器群分布的密度高，本文將(2)類組合視作漢中銅器群主要的組合形式。(2)類組合的器群，分布較為密集且較多器物曾多次發現，反映其儀式性質相較與其他類的器群，舉行次數更密集，或者有更多的群體能夠參與。

晚期出現一組(2)類的典型組合，可視為中期(2)類的延續，但其餘的發現屬於(5)類，零散出土居多或者隨意組合的器群，反映漢中青銅文化進入轉變的階段，前兩期規律性的埋藏活動似乎已經不再普遍執行。由於漢中還有發現年代更晚的銅器，所以晚期並不意味著當地青銅文化結束，但之後的時期應該與前面三期的性質大不同。

(表 2) 早、中、晚組合特色(組合為當期的典型組合)

	組合	特色
早期	(1)、(3)	每個器群所含的器物數量較多
中期	(1)、(2)、(4)	以(2)為主，而(1)、(4)也與早期類似，都是器物數量較多，可視作早期器群的延續
晚期	(5)、(2)	以(5)為主，(2)可視作中期作風

¹⁴² 先前的學者都注意到漢中重視尊、壘、甗這類容器，但實際上可以進一步區分成(1)和(2)類。

		的延續
--	--	-----



透過上述的分析，早期和中期為漢中銅器群主要的埋藏期間。兩個時期將在接下來的兩個章節分別進行討論。第二章聚焦於早期，藉此探究當地用銅文化興起之初的情況。

第三章 漢中銅器製造的產生



第一節：二里崗上層晚期—紅銅器物的出現

一、考古遺址的線索

在發現寶山遺址之前，漢水上游已有若干「夏商時期」文化遺存的發現，被稱為白馬石類型，但皆沒有發現銅器。¹⁴³據當年趙叢蒼的調查，城洋地區也有與白馬石內類型類似的文化遺存，但與銅器同層位的陶片似乎年代稍晚於白馬石類型，¹⁴⁴可惜考古報告並無說明陶器具體樣貌。寶山遺址的陶器很可能與當年所謂的「稍晚於白馬石類型又與銅器共出」的遺存一致，寶山遺址有發現過去銅器群也有出土的彎形器，且遺址的年代也與散器風格呈現的年代大致相同。白馬石類型尚未使用銅器，據此推測稍晚的寶山遺址出現銅器的年代約是漢中盆地剛開始使用銅器的年代。

寶山遺址出土青銅器共 9 件，有鏃、彎形器、銅珠串、針和器柄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¹⁴⁵寶山遺址的第一期即有青銅器出現，年代依據所出的燒烤坑陶器判斷，約是商中心的二里崗上層晚段或稍晚。¹⁴⁶第一期出土的柄形器成分為紅銅，尚未邁入青銅的階段。

另 3 件彎形器，年代據所屬的燒烤坑陶器判斷，約在殷墟三期，3 件的合金成分都不一樣，分別有錫鉛銅、銻鉛銅和銻銅。¹⁴⁷彎形器出現的時間可能比

¹⁴³ 白馬石遺址、馬家營遺址和阮家壩遺址皆有「夏商時期」的文化堆積層，皆沒有發現銅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陝南考古報告集》（西安市：三秦，1994）。

¹⁴⁴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陝南考古報告集》，頁 345。

¹⁴⁵ 不能肯定此件殘器是否如報告所說是戈類器的內部，此器四壁為寬邊稜，斷面成“H”形。若為戈內，則應是扁形，四周突起顯然無法讓木頭夾住內部。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51。

¹⁴⁶ 陶器的分期是基於遺址自身脈絡所排，但由於缺乏 C14 的絕對年代數據，各期所對應的年代是參考中原相似器類的年代。本文的年代推定依照考古報告推論的年代。

採用發掘報告的定年。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¹⁴⁷ 並非所有的器物都有經過科學檢測。成份分析數據引自：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文物》7 期 2012），頁 85-92。

遺址顯示的更早。出土彎形器的城固龍頭、涇水 3 批銅器群中，容器仍具有二里崗風格，整體年代不晚於殷墟一期。此外，漢中器群出土的彎形器成分也以紅銅為主(圖表 11，佔 50%)，與遺址一期的柄形器成分一致，推測彎形器可能是在漢中盆地銅器製造之初即有。

不過，寶山遺址發現的青銅器都是小型器物，與漢中器群發現的大型青銅製品在製作技術上存在明顯的落差。兩者的落差不排除是因為尚未發現漢中地區更大的聚落遺址，此外也得考慮遺址性質的差異。寶山遺址的青銅器皆出自「燒烤坑」，坑內有大量的卵石，石頭上灼燒痕跡明顯，加上大量灰燼，推測是用於炊煮和取暖的生活遺址，缺乏容器、兵器等重器也是合理。生活居址罕出大件銅容器或兵器，而多見工具或小型武器的現象，是各地遺址普遍現象。

(表 3)寶山遺址出土青銅器整理表

地點	分期	年代	出土青銅器	成份
SH9	一期 II 段	二里崗上層 晚段或稍晚	銅珠 6、柄形器 1	柄形器為紅銅(銅 100%)
SH51	二期 III 段	殷墟一、二 之交至殷墟 二期	鏃 1	
SH20	二期 III 段	殷墟一、二 之交至殷墟 二期	鏃 1	
SH47	二期 III 段	殷墟一、二 之交至殷墟 二期	針 1	
SH26	三期 IV 段	殷墟二、三 期之交到殷	彎形器 1、鏃 1	鏃形器為錫鉛銅(銅 84.3%；錫 2.1%；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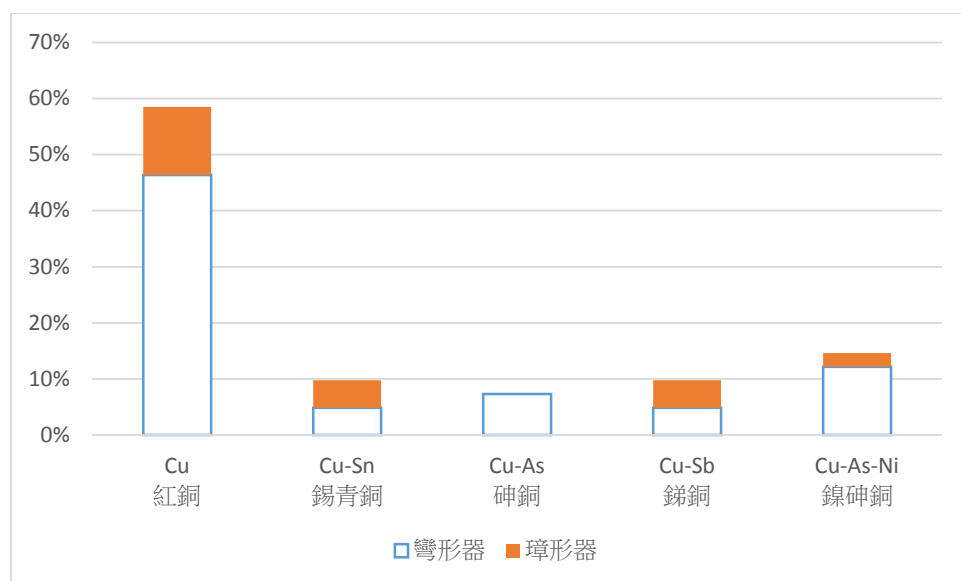
		墟三期		12.5
SH41	三期 IV 段	殷墟二、三期之交到殷墟三期	彎形器 2	SH41:2 為銻鉛銅(銅 92.3%；鉛 2.5%；銻 4.9%) SH41:3 為銻銅(銅 92.7；銻 5.6；鉛 1.5%)

二、成份分析反映的當地鑄造線索

彎形器、璋形器不見於其他區域，是目前公認最能代表當地特色的器物。特殊的合金成份，加強這樣的看法，甚至暗示漢中地區存在本土冶鑄生產的可能性。彎形器與璋形器的合金成份，與商代其他地區和漢中其他器類明顯不同。歷年累計城洋地區出土的彎形器與璋形器各自有 79 和 13 件，其中分別 31 和 10 件取樣進行科學成份析檢測，測驗的比例約佔整體的 45%，而且每一個器群至少有部分彎形器與璋形器經過測試，因此可以反映整體的趨勢。其合金成份的統計顯示，以紅銅為主，接近 60%；其他包含砷、銻和鎳特殊微量金屬成份，其中以砷鎳銅最多，約佔 15% (圖表 11)。¹⁴⁸除了彎形器與璋形器，寶山遺址一期的柄形器成份為純紅銅，反映漢中盆地銅器出現之初，以紅銅，及砷、銻和鎳特殊微量金屬成份已確立。

(圖表 11)彎形器與璋形器的合金成份統計(以元素含量超過 2%當作合金元素的標準)

¹⁴⁸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85。



就採礦、冶煉演進的角度來看，人類最初開採的是靠近地表的如孔雀石或藍銅礦，之後開採淺層但較薄的氧化礦層，而後才再開採更深但銅含量更純的次生富集層。與之相對應，最初銅器是取用自然銅或氧化銅的紅銅器，再來開採的氧化礦層，銅礦石含有較豐富的砷或銻，成品自然為砷銅或銻銅，最後使用氧化層之下的次生富集層，屬於硫化銅，在冶煉之前需要對礦石進行焙燒使得硫流失，為了使銅硬度上升得另尋物質，最終以錫取代砷。紅銅→砷銅→錫銅的演變過程反映採礦來源與冶煉的進展。¹⁴⁹漢中地區採用紅銅兼合金程度不高的砷、銻銅反映當地青銅工業處在相對原始的階段。

世界上許多青銅文化都經歷過紅銅、砷銅、青銅的進展過程。但在中原卻沒有經歷使用砷銅的階段，僅有零星砷銅器物發現，二里頭二期時發現一件砷銅錐(砷：4.47%)。¹⁵⁰在中原周邊區域中，砷銅發現較多的地方集中在中國西北部，有河西走廊的四霸文化(1900-1600BCE)¹⁵¹以及年代較晚的新疆東部(1500-500BCE)的天山北路墓地、五堡墓地等。¹⁵²甚至有學者認為齊家文化(2200-

¹⁴⁹ 李水城、水濤，〈四壩文化銅器研究〉，《文物》03（2000），頁41。

¹⁵⁰ 金正耀，〈二里頭青銅器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夏文明探索〉，《文物》1期(2000)，頁56-65。

¹⁵¹ 李水城、水濤，〈四壩文化銅器研究〉，頁36-44。

¹⁵² 梅建軍、劉國瑞、常喜恩，〈新疆東部地區出土早期銅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02（2002），頁1-10。

1800BCE)也可能存在砷銅，而非直接由紅銅進展到使用青銅的階段。¹⁵³關於漢中銅器的銅料來源，陳坤龍認為是使用漢中或周邊地區的礦產，現代的地質資料漢中盆地也能找到含砷、銻、鎳的礦床。¹⁵⁴雖然現代礦產含有相對應的成份並無法確保古代已經開採使用，且在漢中地區仍缺乏古代採礦、冶煉等相關遺址，但製銅發展之初，使用當地可獲得之礦產可能性頗高。

砷能有效提高銅器的硬度，含量約 2-6%之間具有較好的延展性，適合進行熱加工或冷加工，並且通過鍛造能快速硬化，較紅銅更適於鍛造。但是，漢中青銅器基本上都是鑄造，僅有部分兵器有鑄後熱加工的現象，而以紅銅或特殊砷銅成份為主的彎形器和璋形器反而都是鑄造，也不見熱加工的現象。¹⁵⁵不見打製的現象將使漢中特異於其他使用砷銅的地區。尤其漢中鄰近的區域並不乏使用鍛打工藝的青銅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出土的小型飾件都以鍛打為主。¹⁵⁶漢中與四川盆地的青銅器在風格上有諸多相似之處，許多學者視漢中為四川青銅文化的一部分，但就製造工藝來看，兩者顯然有差異。

三、鍛打的可能？

砷銅的特性特別適合於鍛打，而且漢中的周邊區域存在使用鍛打的青銅文化，合理推測漢中很可能也會存在鍛打銅器的傳統，但尚未發現肯定為打製的銅器。小而薄的彎形器、璋形器從金相的觀察，已確認是鑄造而非鍛打。

目前有少數的例證顯示漢中可能存在鍛打的傳統。羅泰指出寶山遺址出土的 1 件鏃，雙翼，脊薄，鋌也呈薄片狀，明顯是打製鏃的形制(圖 39 之右)。¹⁵⁷由於鏃並沒進行金相分析，無法驗證其說法。不過此說法頗有可能，薄片鋌的確罕見於中原，更常見的是如同圖 40 之中間那件的柱狀鋌，而銅器群出土 32

¹⁵³ 梅建軍，〈中國的早期銅器及其區域特徵〉，收入黃銘崇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2015)，頁 83。

¹⁵⁴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07、8。

¹⁵⁵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附錄 C 金相組織觀察紀錄。

¹⁵⁶ 同註 120。

¹⁵⁷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p. 409.

件鏃也皆是柱狀鏃。具有類似片狀鏃的鏃目前只有在二里頭遺址 4 期發現 3 件身與鏃呈扁狀的鏃(圖 40)。¹⁵⁸二里頭 3 期恰是中原出現銅器之初，當時似乎也有嘗試過打製的技法。¹⁵⁹二里頭薄片狀的鏃是否也是反映打製的傳統？目前尚未能肯定回答，但提供一個可能性。而在漢中盆地目前經科學發掘的銅器只有 9 件，其中 2 件片狀鏃的鏃可能反映打製技術的存在，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待未來更多的材料揭露，使問題能夠漸趨明朗。

第二節：從當地生產器物看漢中盆地初期銅器與其他地區的關係

綜合上述討論，漢水上游青銅文化興起之初，部分銅器以其罕見於商代其他區域的合金成份，能夠較為肯定被視為當地生產的代表。以下要討論的銅器有彎形器、璋形器、有肩鋸斧和矛，各種器類的年代有先後之差。透過分析這些器物，則能夠進一步理解漢中製銅發展之初受到的影響。

一、彎形器

彎形器與璋形器以往常一併討論，但就分佈現象來看仍有些微差異，因此分開討論。彎形器在城洋地區到目前為止於 6 個地點發現，除了寶山遺址燒烤坑 2 個地點之外，其餘皆是出於青銅器數量較多的器群中，並且集中在早期器群中，包含龍頭、涇水共 3 個器群，卻尚未在城洋之外發現類似的器物(表 4)。越南櫚丘文化(Gò Mun)曾發現稱為鏃之器物(圖 41)，外型也呈彎曲是較近似的例子，但鏃則近似於管鏃，與漢中彎形器鏃的方向與器身平行的安裝木秘方式不同。¹⁶⁰從風格來看，或許跟四川盆地青銅文化較有關係。羅泰認為范壩出土的眼形飾(圖 42)，側邊具有齒，與漢中龍頭器群出土的其中一種帶齒彎形

¹⁵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1959 年-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市：中國大百科全書，1999，頁 269、350)。

¹⁵⁹ Robert Bagley 從仿銅陶鬻、爵談二里頭時期可能出現部分打製的嘗試。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Massachusetts: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the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1987), pp. 15-6.

¹⁶⁰ 李昆聲，《中國雲南與越南的青銅文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器(圖 43)風格有相通之處。但有盃的樣式使其在使用方式上跟四川的銅飾件完全不同，也不宜直接將兩者連結。彎形器器形的獨特性，顯示其為漢中盆地特殊器物。

多數彎形器的器身兩側有齒，齒原本應是固定、束縛的部位，暗示彎形器的原型是來自某種實用器，但已喪失原本功能。彎形器的雙邊刃部不銳利，盃淺，1981 年龍頭鎮彎形器有件盃內仍有范土，¹⁶¹應該非實用的器具。


甚者，以往稱為彎形器的器物應進一步分成兩類，兩類的功能很可能不同。依據大小、重量宜分成兩類，第一種長達五十多公分，另一種二十幾公分，大小差距相差一半，長者重約七百多克，短小者約一百多克。彎形器的功能通以李學勤作為舞樂時所執的羽之說廣為接受，¹⁶²但考慮兩組大小、重量的差異和出土情境的不同，暗示兩者使用方式有異。小型彎形器見於生活居址「燒烤坑」，而器群中范壩出土數量最少也都是小型，與其他共出的小飾件一致，因此小型彎形器可能是飾件，使用也不一定侷限於儀式場合。相反地，大型彎形器則比較能符合儀式手持器具的說法。大型彎形器皆出現在早期器群，且與大量容器伴出，龍頭器群還包含一組列器，暗示這些器群遺存可能與儀式高度相關，因此大彎形器也跟儀式較為相關，或許近似三星堆銅像持持牙璋的方式(圖 44)。

(表 4) 彎形器出土地點表

地點	年代	件數	器群出土器物
1980 城固龍頭鎮	殷墟早期	43，大彎形器	1 壘、2 尊、1 簋、1 卣、1 壺、4 觚、1 盤、4 鉞、7 矛、43 大彎形器
1981 城固龍頭鎮	殷墟早期	17，大、小	2 壘、1 鬲、1 壺、1 觚、1 爵、1 盤、2 戈、6 大彎形器、11 小彎形器

¹⁶¹ 趙叢蒼，《城洋青銅器》，頁 19。

¹⁶² 李學勤，〈論洋縣范壩銅牙璋等問題〉，《文博》2 期 1997)，頁 13、14。

		彎形器 皆有	
1975 城固五 郎廟潯水	殷墟早 期	16，小 彎形器	3 鼎、2 鬲、16 小彎形器
1979 洋縣范 壩	殷墟中 期	3，小 彎形器	2 鉞、8 戈、2 戚、2 刀、17 鏃、3 小彎形器、10 璋形器、4 夔鳥形式、2 魚形飾、1 器柄飾、1 鈴
城固寶山遺址 SH41	殷墟中 期	2，小 彎形器	2 小彎形器
城固寶山遺址 SH26	殷墟中 期	1，小 彎形器	1 小彎形器、1 鏃

二、璋形器

璋形器的尺寸近似於小型彎形器，皆 20 公分左右，出土數量較少，地點僅見於 2 處，其一是上述的洋縣范壩，10 件；另一處是 1964 年城固五郎廟 b 點，僅 3 件，兩器物群在本文的分期皆屬中期。璋形器出現的時間可能較晚，但由於其工藝性質與彎形器近似，所以也在早期的章節討論。

璋形器推測源自於玉璋¹⁶³，但漢中盆地卻罕出玉器，有發表的僅 3 件。¹⁶⁴在四川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卻出土大量的璋，而且兩地也都出有銅質的璋形器，推測漢中應受到四川盆地的影響。但是就功能來說，漢中璋形器與四川地區的玉質或銅質璋可能都不一樣。與玉璋比較，漢中璋形器卻太小，不適用於三星堆銅像描繪手握璋的使用情景；與三星堆和金沙的銅質璋比較，後兩者都是打製的薄飾件，尺寸僅 5 公分左右，有穿孔，尤其三星堆的銅質璋與青銅神樹共出情境下，推測更可能是銅樹的部件。反觀漢中璋形器無孔，尺寸較大，與四川盆地的使用方式可能也不同。

璋形器與彎形器風格來源與四川青銅文化有密切關係，但是三星堆青銅器

¹⁶³ 李學勤，〈論洋縣范壩銅牙璋等問題〉，頁 13-4。

¹⁶⁴ 苟保平，〈城固縣文化館藏三件玉器〉，《文博》5 期(1998)，頁 84。

的成分以銅錫鉛和銅鉛合金為主，¹⁶⁵漢中盆地成份的特性支持其為本土製品，反映兩者有各自的產地；功能方面，兩地也可能有所差異。因此漢中青銅文化受到四川青銅文化的影響，但又有創新之處。



三、 釜口斧

除了彎形器與璋形器，其他的器類也有出現砷銅等特殊合金成份，不過檢測樣本較為零星，較難確定是普遍的情況或是個案。另一種較為肯定的是釜口斧。1980年城固龍頭器群溜肩釜口斧和1988年城固五郎廟斜肩釜口斧經過檢測，多數含砷的合金成份反映這類斧應是當地製作，有些砷的含量或許沒超出2%合金的定義，但普遍銅含量高(表5)。五郎廟2件斧中1件是例外，為銅錫合金，但另一件為標準的砷銅，雖是同一批器物，但之間成份差異頗大。

合金成份判斷產地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擾，例如舊器融掉重製，都會影響合金成份。其實在彎形器、璋形器的成分中也有錫青銅，但比例極少，約10%，紅銅兼特殊合金才是普遍的成分。僅看單件的成份有風險，應該要更多的數據來看普遍趨勢。有釜斧，受測的樣本來自兩批不同的地點且有不同類型的有釜斧不同，樣本有代表意義。此外，風格分析也能證實有釜斧作為當地特色銅器的可信度較高。

(表5) 有釜斧成份

地點 1	器號	銅 (%)	砷 (%)	氧 (%)	其他 (%)	材質
1980年城固 龍頭溜肩釜口 斧	1980CHLTT:13	98	1.3	0.5	硫:0.3	Cu-(As)
	1980CHLTT:14	97.7	1.1	1.2		Cu-(As)
	1980CHLTT:11	98.6	0.7	0.7		Cu
地點 2		銅	砷	錫	其他	
1988年城固	1975CHWT:1	96.7	2.2	0.5	鎳:0.4	Cu-As

¹⁶⁵ 馬江波、金正耀、田建安、陳德安，〈三星堆銅器的合金成分與金相研究〉，《四川文物》2期(2012)，頁90-98。

五郎廟斜肩鋸 口斧	1975CHWT:2	90	--	7.5	鉛 1.4	Cu-Sn-(Pb)
--------------	------------	----	----	-----	-------	------------

從風格來看，漢中發現的有鋸鋌形制之多樣，足以證實其為當地最重要的斧鋌類型。相較於直內鋌可以清楚地將源頭追溯到商文化，有鋸鋌的來源更可能是來自西南本土。值得注意，此種器身與鋸口平行的形式應和管鋸區別來看，後者的鋸方向與器身垂直，顯示兩種類型安裝木秘方式不同，¹⁶⁶而管鋸形式的器物不見於漢中。殷墟常見有鋸斧制的身呈窄長，兩側較直，刃部弧度較平緩(圖 51)；而漢中的斧以圓弧刃，刃段內收形成「小肩」為特色。依據肩部的不同，可區分為折肩和溜肩，皆有砷銅的例子。兩種形式的分佈地域有差異，以下分開討論。

1. 溜肩有鋸斧(圖 48)

所謂溜肩即肩折角圓曲，沒有明顯將肩與弧刃區分，也有學者稱之無肩斧，¹⁶⁷但恐會與商式斧無折角、長身的形式

(圖 51)混淆，故稱溜肩。溜肩斧與其他有鋸斧有較大的差異：首先尺寸較大，長約 16 公分，其他的斧大多 7、8 公分，其二刃部不甚鋒利，¹⁶⁸其三成圓形鋸。漢中盆地僅有龍頭鎮器群出土一批，共 4 件，相較於折肩系鋸斧，數量不多。

相似的器物見於江西新贛大洋洲器物坑，稱之為「鏟」，¹⁶⁹其鋸孔也成橢圓形(圖 50)，器物坑年代為殷墟二期。¹⁷⁰新贛器物坑「鏟」共出土 12 件，溜肩型的佔 10 件，算是主要類型，器身連珠紋也是其他器類常見的裝飾，表現當地特

¹⁶⁶ 將兩者鋸口區分開來的分類方式也見於 Max Loehr 討論兵器。詳見：Max Loehr and Werner Jannings,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pp.

¹⁶⁷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頁 502。

¹⁶⁸ 趙叢蒼，《城洋青銅器》，頁 14。

¹⁶⁹ 考古報告中稱為「鏟」的 3 種類形，另兩類刃部呈板狀，微內凹，更像鏟可以挖、舀土壤，不同於本文討論的種類。

¹⁷⁰ 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縣博物館，《新贛商代大墓》(北京：文物，1997)，頁 121。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商代江南：江西新贛大洋洲出土文物輯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頁 296。

點。

四川、雲南一帶，溜肩銜斧發現的例子也不少，年代較漢中和新贛的晚，都在商末周初，比漢水上游地區晚。四川地區毗盧寺遺址¹⁷¹、金沙遺址¹⁷²皆有發現，年代應該是商晚至西周初。不過與漢中例子相比稍有變化，金沙例子銜形以趨向扁長方形且尺寸小(圖 47)，毗盧寺遺址銜頸較短。龍頭器群溜肩銜斧的紋飾也反映與四川青銅文化的關係，龍頭鎮斧的器身似心形的紋飾也見於三星堆和金沙。¹⁷³雲南西部最早的青銅時代遺址海門口也出土溜肩斧(圖 49)，¹⁷⁴形制與龍頭出土的類似，年代也大致是商末周初。¹⁷⁵

龍頭鎮器群的年代為殷墟初期，容器的風格與二里崗密切相關，而斧的年代應該也不會比容器晚。就斧自身的發展來看，圓銜的樣式是較早的樣式。龍頭鎮斧銜口兩側有環耳，放眼商代的斧制罕見雙環耳，至多一環耳，可見已具有自己的特點。新贛的溜肩斧與龍頭鎮的最為接近，但兩者分別都出現自己的特色，應該不是互相影響關係，而是平行發展，可能具有共同的來源。新贛的年代不晚於殷墟二期，因此龍頭鎮的年代應該也不晚於此，考慮容器的年代為殷墟一期，斧的年代為殷墟一期也不無可能。

2. 折肩有銜斧(圖 52)

漢中盆地共出 16 件折肩有銜斧，除了無記錄的徵集品，出土自 7 個不同地點。形制特點是多為長方形銜，刃有成半圓形和舌形，有些近銜口處有裝飾，人面紋頗有特點，部分簡化至僅有雙目。

目前最早的發現應是來自於川西漢源，斧成圓刀斜肩，銜為橢圓形(圖

¹⁷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等，〈四川廣漢、什邡商周遺址調查報告頁〉，《三星堆研究》，第一輯(成都：天地，2006)，頁 234-5。

¹⁷²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遺址“蘭苑”地點發掘簡報〉，《成都考古發現(2001)》(北京：科學，2003)，頁

¹⁷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新華書店，1999)，頁 118。

¹⁷⁴ 作銘，〈劍川海門口古文化遺址清理簡報〉，《考古通訊》06(1958)，圖板 4-3。

¹⁷⁵ 銅器自遺址第三期開始出現，定年約是 1150~550BCE，遺址也有出土斧范和陶範，可知是當地鑄造。閔銳，〈雲南劍川縣海門口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8(2009)，頁 22。

54)，素面無紋。¹⁷⁶漢源器物的年代根據共伴出土的長援直內戈以及器身帶大圓口直內鉞，兩者與早商鄭州或盤龍城的戈、鉞相似，推測漢源武器群的年代為商早期。漢源這批銅器是目前四川盆地中，唯一具商早期風格青銅的器群。器群中另兩件斧全身扁平，既沒銜口也無夾內，與石器樣子接近(圖 53)，顯得較為原始，證實器群的年代應該不會太晚。相似的斧在二里頭遺址也有發現，頂部有捶打痕，反映原始青銅技術階段。¹⁷⁷西周初年四川竹瓦街窖藏 3 件有肩銜斧是四川盆地稍晚的發現，型態已與漢源不同。刃部變長成舌狀，而銜口的紋飾具特色，不同於中原式的獸面(圖 55)，與春秋戰國巴蜀兵器風格更近似。從兩個例子來看，圓弧刃較舌狀刃類型較早出現。

從形制來看，漢中盆地的斧大概介於川西漢源和四川竹瓦街窖藏之間的階段，圓弧刃與舌狀刃兩種類型皆具備，紋飾又不像竹瓦街的紋飾那麼晚。圖 12-1 出自城固五郎廟 a 地點，其器群據上章討論年代大概是在殷墟二期，屬於中期的器群。安康白馬石也採集到兩件(圖 56)，與漢中的發現基本一致，圖 56 (右)紋飾恰為圖 52-2、3 的合體。安康盆地位於漢中西南方，與漢中盆地同屬漢水上游兩大盆地，兩地皆發現斧、豆、尖底罐等陶器，與寶山遺址有一定的相似度，基本上可視作同一個考古文化。¹⁷⁸城固洋縣位於漢中盆地的西邊末端，漢水出盆地經激流窄谷即進入安康盆地，兩者在地緣上也親近。不過安康基本沒發現商代青銅器，因此折肩有銜斧是重要的證據，說明兩地在商代，不只陶器，在青銅器也有關係密切。安康地區有發現年代為戰國的石棺墓¹⁷⁹和蜀式兵器，反映安康盆地在商代之後仍與四川保持密切相關。

有銜斧的分佈範圍是所有初期當地製品中最廣闊，並且將漢水上游青銅文

¹⁷⁶ 岳潤烈，〈四川漢源出土商周青銅器〉，《文物》11 期 1983)，頁 91；范勇，〈我國溪南地區的青銅斧鉞〉，《考古學報》，2 期(1989)，頁 163。

¹⁷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1959 年-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269。

¹⁷⁸ 安康地區與寶山遺址類似的考古遺址主要見於白馬石遺址、馬家營遺址和阮家壩遺址的「夏商時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陝南考古報告集〉。

¹⁷⁹ 陝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陝西紫陽白馬石巴蜀墓葬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5 期 1987)，頁 17-20。

化與四川和雲南聯繫在一起，應該將這類銜斧視作中國西南方的特色器類。四川盆地、雲南有銜斧盛行的年代始至商末周初，看似漢水上游影響到四川，但考慮漢源的發現反映四川可能在商代早期即有此類型。漢中盆地折肩有銜斧的年代參考一件出自城固五郎廟 a 地點的器群年代，大概是殷墟二期。就形制發展來看也合理，此件斧為圓弧刃，接近四川漢源斧的樣式，但銜口人面紋顯示有一定的變化，應晚於漢源斧。但同時漢中盆地也出土與商末周初四川類似的舌狀刃斧，反映整個商晚時期折肩有銜斧在漢中應是持續使用。漢中盆地折肩有銜斧的類型與年代變化與四川地區的斧發展似乎是一致的，反映兩者在這段期間關係密切。

品質分面，相較於璋形器與彎形器器小、薄且常常出現漏銅的現象，有肩銜斧雖然也不大，但銅質厚重且較少漏銅現象，質量更好。斧作為實用的工具或武器，其工藝質量更受到重視。斧與其他兩者的差異，反映當地對不同器物的重視度不同。

四、矛

1980 年龍頭器群的矛也具有特殊的微量元素。雖然從外貌來看，矛與戈與商文化同一器類基本一致，看不出區域的特徵。但 5 件矛的成份分析數據顯示其中 2 件都含有砷，分別為 0.8 和 1.1%，未達 2% 的合金標準，代表非有意添加而是礦源本身的特性。除龍頭器群外，城固蘇村小塚也出土 1 批。小塚矛的葉部呈等腰三角形，在形態上屬於較晚期(圖 58)。龍頭器群矛類似的柳葉形矛，至西周初年的陝西寶雞石鼓山 M3 仍有，¹⁸⁰所以柳葉形和三角形矛並非取代關係。不過蘇村小塚出土的銅器群年代主要落在殷墟二期，¹⁸¹也側面證實小塚矛晚於龍頭矛。小塚矛並沒有成份數據，但其身上多漏銅的現象，似乎和當地製造的彎形器一致，或許也是當地製造。整體來看，中國西南方以雙耳矛為

¹⁸⁰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文物旅遊局、上海博物館，《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2014，頁 186。

¹⁸¹ 小塚出土青銅器群 3 批，孫華將其中 2 批定為殷墟二期，1 批為商末周初。孫華，〈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埋藏問題〉，頁 170-202。

主要形制，到春秋戰國時期巴蜀的矛耳部進一步變化出「3」形狀(圖 59)。

雙耳矛最早的例證出自於盤龍城，在鄭州並沒有矛的出土，而無耳矛最早的例證則出於蒙古，故有學者推測雙耳起源於南方，相對於北方起源的無耳矛。¹⁸²但也有學者認為湖北盤龍城青銅器反映的是整個早商文化的青銅器，所謂的南方不應是長江流域盤龍城，而是對比於北方草原之整個中原南方。¹⁸³

雙耳矛是否為狹義的盤龍城南方起源？盤龍城共出 4 件矛，型態卻各有差異可歸為不同類型，其多樣性顯著，或許是雙耳矛在當地發展興盛且成熟的表現。但令人困惑，盤龍城作為早商唯一出土有耳矛的地方，到了晚商長江中游卻成為次要的類型。新贛大洋洲無耳矛與雙耳矛皆有，實際上無耳矛的樣式更多一些；而在長江中游，商時期全部都是無耳矛，無一例為有耳矛，有耳矛的例子年代都在春秋。¹⁸⁴反而，雙耳矛的使用在晚商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與漢水上游興盛，與中游的局面形成對比。

同時，在安陽殷墟也以有耳矛居多。但得注意由於西北崗 M1004 出土 731 件有耳矛，¹⁸⁵造成統計上有耳矛數量上絕對壓倒，實際上殷墟卻是不同型式矛的匯聚地。但從殷墟產生的一種新型態矛來看，矛呈葉底對稱穿孔矛，形體像似葉與雙耳連成一體(圖 60)。其銜較淺，是有耳矛的特徵，¹⁸⁶或許反映此矛是有耳矛影響下的新型態？就此來看，有耳矛才是主要的形制。將漢水上游和四川盆地有耳矛的來源限定為盤龍城的說法，目前還難以下此定論。

五、 當地製造與器群的關係：早期典型器群的武器

(圖表 12) 早期典型器群中非容器類一覽表

地點	總件數(件)	非容器類(件)
----	--------	---------

¹⁸² 沈融，〈商與西周青銅矛研究〉，《考古學報》4 期 1998），頁 447-64。

¹⁸³ 徐堅，《時惟禮崇：東周之前青銅兵器的物質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14，頁 45。

¹⁸⁴ 熊建華，《湖南商周青銅器研究》，頁 315-21。

¹⁸⁵ 李濟、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五本：1004 號大墓》（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頁 146。

¹⁸⁶ 無耳矛通常銜部較長，銜深入，推測是為了更能固定木秘，避免脫落。有耳矛有雙耳可以縛捆，較容易防止脫落。

城固龍頭 1980	65	4 有銎斧、7 矛、43 彎形器
城固龍頭 1981	26	2 戈、17 彎形器
城固涇水 1975b	21	16 彎形器

早期器群的代表分別有 1980、1981 年城固龍頭器群和 1975 年城固涇水器群，兩個器群除了容器，還有有彎形器、矛與戈(圖表 12)。除了上節討論過的有銎斧、彎形器可能是當地鑄造以外，1980 年龍頭器群的矛與戈也可能是當地鑄造。此點頗重要，因為從外貌來看，矛與戈與商文化同一器類基本一致，看不出區域的特徵。5 件矛的成份分析數據顯示其中 2 件都含有砷，分別為 0.8 和 1.1%，未達 2% 的合金標準，代表非有意添加而是礦源本身的特性。1980 年器群的成份分析顯示容器皆為銅錫鉛三元合金，而非容器類，包含彎形器、有銎斧和矛，多數都有砷的成份(3.4~0.1%)，可能都是當地製造。1981 年城固龍頭器群的戈雖然沒有成分分析的數據，但也可大膽推測戈有是當地製造。戈為直內長援戈，最早出現在四川漢源，年代為商早期，是目前四川地區唯一一批帶有商早期風格器物的發現，反映長援直內戈商早期就到四川盆地，漢中當地可能早在龍頭器群之前已熟知此類戈。

儘管戈與矛的風格與商式武器無區別，但在早期階段，武器已由當地鑄造產業供應。武器的風格反映與四川地區聯繫，即使有些武器與商中心一致，漢源的例子反映也有可能是透過四川盆地所習得。

六、以小件器物為主的當地製造

第一節結合考古遺址與成份分析的材料，試圖論證在漢中用銅文化出現之初，當地已具備一定的銅器製造。寶山遺址一期即發現紅銅小件器物，年代上限可早至二里崗晚期。主要的代表器物有彎形器、璋形器與有肩銎斧，成份以

紅銅為主，還包含砷銅、銻銅、鎳砷銅特殊合金。漢中盆地礦床具有包含這些微量元素，因此特殊合金成份顯示礦源來自漢中盆地當地，是當地製造的有利證據。

從製作技術來看，彎形器、璋形器與有肩銚斧都是鑄造，採用較單純的單範或雙範即可，與有空腔的容器所需的複雜合範技術有一段差距。陳坤龍認為皆是陶範鑄造，¹⁸⁷但其實不排除這類簡單的器物是用石範鑄造。雖然在當地並沒有發現任何使用陶範或石範的直接證據，但從同時期四川盆地、雲南高原、三峽地區，甚至是湖南地區¹⁸⁸普遍發現斧的石範來看，漢中簡單的器物也可能採用石範。此外，彎形器與璋形器多見漏銅現象，反映技術不純熟。整體來看，漢中青銅文化之初，當地鑄造的銅器顯示銅器製造處在相對原始的階段。

進一步分析彎形器、璋形器與有肩銚斧與其他區域銅器的關係，可發現當地特色的代表—彎形器—反而是分佈範圍最小，僅侷限在城固、洋縣兩地，但其往往與漢中器群裡含最多容器的器群共出，反而顯示使用彎形器的人群能掌握來自不同區域的青銅製品，呈現一種兩極的現象。璋形器反映的區域關係則稍廣，明顯可看出與四川盆地三星堆和稍晚金沙的共性，但在相同的基礎上，鑄造技術和使用方法也存在著差異，反映兩地的交流應該是有選擇性，而非全盤接收。有肩銚斧則反映最廣闊的分佈範圍，在商代已擴及大多西南地區，包含安康、漢中、四川和雲南，而到了周代仍持續在西南方使用，成為重要的斧類型之一。漢中的有肩銚斧年代在整個西南方都屬較早的那批，特別是溜肩銚斧應是目前最早的例子。整體來看，漢中當地特色器物與西南方有較緊密的關聯。

順帶一提，遠在長江中下游的新贛也有發現近似的溜肩銚斧，斧上常見的目紋在新贛銅器上也發現(圖 61)，儘管漢中與新贛的例子之間缺乏中間環節證

¹⁸⁷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83。

¹⁸⁸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坐果山與望子嶺：瀟湘上游商周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611-2。

據來連結，兩地之間卻存在很多相似性，在稍後討論的其他器類也可看到。



第三節：容器反映外來的影響

本節在上一節利用考古材料建立當地青銅工業發展初期的情境下，將過去城固、洋縣非科學發掘的青銅器群納入討論，試圖從當地脈絡來了解這批青銅器群的意義。本節所要討論的是在第一章被區分為早期階段的器群。

一、考古遺址的線索

漢中青銅器群並沒有早到二里崗時期的發現，但寶山遺址一期的部份陶器反映青銅容器可能已經出現在當地。第一類是飾有連珠紋的直頸陶壘，為青銅容器常見的紋飾。這種帶有連珠紋的陶壘直頸、折肩明顯，與另一種貫穿三期的陶壘相比，器形可能受到銅器影響，鄭州和偃師商城¹⁸⁹都出土類似的仿銅陶器(圖 62)。第二類是帶有足孔的簋(圖 63)，也是仿銅的證明。¹⁹⁰此類型的簋三期皆有，但是弦紋和足孔的作法卻在一期之後消失。

寶山遺址一期出現的二里崗文化陶器來自哪裡？到了二里崗晚期，二里崗文化影響到很廣的地域範圍。漢中周邊區域或多或少都有受到二里崗文化影響，包含影響很深的關中地區老牛坡遺址、與漢中同屬陝南的洛商地區東龍山遺址，¹⁹¹甚至是地方特性更強的三峽地區路家河遺址，從陶器文化分析中都會有一組「商文化因素」的陶器。帶足孔的簋與帶連珠紋的束頸壘面貌皆與二里崗文化面貌接近，應是來自商文化因素強烈的區域。¹⁹²但僅短暫出現於遺址的第一期，之後即快速消失或轉變，而且影響也無擴及到很深的層面，例如漢中仍以釜作烹煮用具，不同於商文化的鬲系統，這些現象反映這波影響短暫，並

¹⁸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商城》(北京：科學，2013，頁 382、3。

¹⁹⁰ 近似台西的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遺址》，頁。

¹⁹¹ 關中東部(老牛坡遺址)、陝南商洛地區，因為商文化因素強烈，基本上都被視為二里崗文化的方類型。鄒衡，《試論夏文化》(北京：文物，1980，頁 95-182。

¹⁹² 有認為是來自關中的看法，但本文認為直到寶山遺址三期，來自關中，特別是先周的影響，才轉趨明顯，詳見下一張。余冰玉，〈寶山遺址的初步研究及其與南北方向上古學文化的交流互動〉，(南京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12)，頁 60。

沒有深入當地的文化。

二、早期典型器群中容器反映的線索(1)—來自長江中游的影響

本文認為城固龍頭器群的銅器與盤龍城青銅器有著淵源關係，極可能是來自與盤龍城文化直接接觸的文化。龍頭器群與盤龍城青銅器的淵源關係已有學者提出，¹⁹³但也有學者反對，李伯謙認為漢中盆地早商風格的銅器不可能從盤龍城一路逆漢水而上到漢中盆地，迄今在漢水沿岸並無發現中介的遺存。¹⁹⁴本文意見與第一種說法類似，但認為並不是直接來自盤龍城，而是間接源自直接接觸盤龍城文化的地區。

龍頭器群多件器物顯示與盤龍城密切的關係是明顯的，但在論證城固青銅器群與盤龍城青銅器關係時，面臨一個認定問題：到底兩者之間的相似性是反映與盤龍城的聯繫，或者只是反映與整個早商青銅器的同質性？盤龍城與鄭州商城的差異不該輕易地解釋成青銅器的區域差異。由於鄭州商城到目前為止只有發現中、小型墓，而大多數的遺址都堆壓在現代都市底下，發現的青銅器缺少最高等級的器物。而盤龍城雖與早商文化中心鄭州相距甚遠，但其青銅容器與鄭州高度相似，墓葬習俗也與鄭州類似，故有學者傾向於認為盤龍城直接受到二里崗文化影響，其所發現的青銅器可反映二里崗文化青銅器面貌，尤其可以補足鄭州所缺少的高等級階層持有青銅器的樣貌。¹⁹⁵

本文以為龍頭鎮器群的早商文化因素是源自盤龍城而非鄭州，主要以 1 件簋為依據。對於簋是否源於盤龍城，過去學者也因上述兩種不同認定未有一致的定論。蘇榮譽將此簋視為第一件採用鉚頭後鑄雙耳的技法(圖 64)，論證此技

¹⁹³ (1)曹瑋認為商中期(即本文定年的早商晚期)銅器承襲至盤龍城。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頁 39。(2)四川考古研究所萬嬌於 2014 年 12 月 6-7 日「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發表《城洋青銅器源流分析》，認為城洋銅器的製作者可能來自盤龍城，由於會後並沒有出版會議論文，無法引用文章。

¹⁹⁴ 李伯謙認為是來自早商中心鄭州二里崗文化，李伯謙，〈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族屬問題的再討論〉，收入曹瑋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56。

¹⁹⁵ 註 197。

法源自盤龍城；¹⁹⁶但朱鳳瀚以鄭州有發現仿銅陶簋，推定盤龍城簋應該源自二里崗。¹⁹⁷

筆者以為簋應該在鄭州即存在，如同朱鳳瀚指出在鄭州發現不只一例的仿銅陶簋即是證明(圖 67)。但是盤龍城的簋是在鄭州銅簋的基礎下，產生的新變化。盤龍城共發現 2 件簋，其中 1 件與陶簋如出一轍，但另一件獸耳很有特點，環耳很大，從器沿橫跨到器中腹，¹⁹⁸相較於小耳的簋，大型環耳使簋能夠真正用提握。為了安裝較大的耳，此簋使用新的鑄造技法，在簋預留孔洞後套上陶範鑄接獸耳。環耳頭部變寬大，是因為要有足夠的截面積才能包住孔洞，而變大的獸首也得以出現較為繁複的裝飾(圖 66)。盤龍城這件簋採用新的鑄造技法，背後意味著不同的使用方法，正是因為這種功能轉變帶動器形的變化與技術的產生，讓本文認定此為盤龍城的創新。採用同樣接鑄技術的城固龍頭簋反映盤龍城的淵源，但其紋飾顯得年代稍晚(圖 64)。特別是其腹部主紋乍看與勾連雲雷紋類似，但兩者結構很不同(圖 65)，而與硬陶紋飾卻有點類似。漢中陶器並沒有發現硬陶，可能反映南方的起源，盤龍城出土硬陶上紋飾有類似的例子(圖 68)。

西周初年關中出土一件簋，可以窺見此類特殊耳的簋的發展(圖 69)。關中這件簋的器耳仍保持早期後鑄法的耳首寬厚的特徵，但是內壁無鑄頭，顯示其所使用渾鑄法。殷墟時期開始採用複合範技術，簋耳迅速採用與器身同鑄的方法，耳首寬大且內壁帶有鑄頭的簋耳也在殷墟絕跡。關中這件簋，可能是工匠基於早商簋的模仿，但採用後來的技術。

龍頭鎮出土的提梁卣器身呈長直頸、圓鼓腹，為早商典型的樣式，盤龍城即出土一件，但是龍頭鎮的器蓋紋飾卻呈現不常見的布局(圖 70)。常見的圓

¹⁹⁶ 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鉤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收入日本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日本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2015)，頁 352-86。

¹⁹⁷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上海：上海古籍，2009)，頁 933。

¹⁹⁸ 考古報告統計有 3 件簋，但其中一件無耳，應是不同器類，比較像陶器的盆或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上》，頁 467。

蓋，特別是提梁卣、小壺等面積小的器蓋，很少採紋飾切割分區的方式，而是採連續的環狀紋飾，因此連珠紋、斜角夔紋、斜角雲紋環狀飾帶是較為普遍的裝飾(圖 71)。殷墟時期稍大的器物蓋子才有類似的切割單元，但往往等大切割，每個單元中間以突起扉稜為間隔，而獸面以分隔扉稜為中軸兩兩相對，有分為四個單位，也有六個單位(圖 72)。龍頭鎮的蓋面區分成四塊，利用連珠紋作為扉稜般的作用，與商中心的連珠紋做法很不同(圖 70)。器蓋裝飾元素包含獸面和連珠紋都是早商青銅器上常見的，但是處理這些元素的方式卻很不同。






三足壺的蓋也反映非商文化的特徵。這件蓋可能是漢中工匠重新加上去的，壺蓋的紋飾線條粗細不一，時有斷裂的現象，與器身流暢、起尾都有收尖的線條不同，後者仍看出紋飾保留草稿時書法的線條彈性感，前者雕刻線條的掌握不純熟(圖 75)。儘管器蓋施作與器身有差異，但工匠應該有試圖復原原本的蓋子樣貌，紋飾可以看出與器身獸面類似之處，如：器蓋的獸面紋仍維持與器身一致的方目，而紋飾風格也屬於商早期的單層獸面。

原本蓋的紋飾布局透露非商中心製作的可能，與上述提梁卣的蓋子有相通之處。紋飾分成四個單位，其中兩塊面積較大，兩塊較小。此壺蓋不等大的切割很像方形器成屋頂狀的器蓋，兩塊相對較大，另兩塊相對較小，並且大對大、小對小(圖 75)。觀察商風格的器蓋，都很重視對稱、等分的布局，與器身文飾布局的特點雷同，如婦好墓圓甗蓋六塊大小相等，區塊紋飾一致(圖 72)。方蓋因為器形的關係，不同面大小不同，但圓蓋則無此問題，因此基本上都是對等的切割(圖 74)。三足壺器蓋的布局反映工匠並不注重等分的配置。

器蓋採用佈局並非早商的作法，透露非商中心製作的可能。裝飾紋飾來看，與二里崗時期青銅器密切相關，而無看到殷墟的影響，應是基於二里崗時期的青銅器所作的變化。類似的現象也見於新贛大洋洲器物，方鼎上的獸面單元被隨意的切割呈一半排列，形成「展體式」獸面帶圍繞在鼎四邊(圖 78)。龍頭鎮的器蓋不一定與新贛有關係，但兩者相較於商器的詭異處，說明龍頭器群可能來自與商文化有所差異的區域青銅文化製造工坊。

三足壺特殊的形制，Rawson 注意到和新贛卣相似之處，兩者蛋形器形應是承襲自二里崗的造型，再加上三足(圖表 13)。¹⁹⁹但龍頭壺足的形態呈“●”狀，足的內面為平坦，與常見實心柱足(圖表 13 之右 1、2)不同。類似的足部形卻多見湖南商、西周的鼎足(圖 76)，暗示龍頭壺足與長江中游很有淵源，而壺足上獸面紋的長形獸角是商早期的特徵(圖 77)，所以代表這類足部早期的形態。

(圖表 13) 三足壺/盃比較

				
<p>錐狀空心 江西新贛大洋洲 高 38.5 公分</p>	<p>錐狀足 北京平谷 劉家河 高 20 公分</p>	<p>扁實心足 陝西城固龍 頭 高 30.6 公分</p>	<p>柱狀實心足 河南小屯 M331 高 27.1 公分</p>	<p>柱狀實心足 河南小屯 M5 高 29.5 公分</p>

龍頭器群的青銅容器大體上反映早商二里崗風格，但上述的 2 器蓋與三足壺所顯現的變異之處，有可能是來自於與商中心緊密接觸但有具有自身特色的工坊。雙耳簋顯示其來源可能是盤龍城的商文化，而從三足壺的例子來看，工藝的特徵與商晚期湖南有類似之處。但湖南的例子已晚至商末周初，而三足壺較早的年代或許暗示湖南這種特殊的足形在長江中游有更早的源頭。

盤龍城在二里崗時期結束後，商人勢力撤出，但湖北的鑄銅工業仍持續存在，湖北黃陂附近仍有出土晚商的青銅器。湖北黃州一墓葬出土 16 件銅器，觚、爵、鬲等與二里崗晚期無二致，一件壘(截頭尊)紋飾顯得稍晚，但仍與二

¹⁹⁹ Jessica Rawson,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2-3), pp19.

里崗關係密切。²⁰⁰黃陂魯臺鎮的截頭尊，紋飾類似於黃州的例子，但帶扉稜，尤其是折肩上仿小鳥扉稜，與商晚期湖南具有特色的容器有共通之處(圖 79)。但相較於長江南岸的江西或湖南銅器具明顯的區域特色，湖北出土的器物顯然更貼近商文化的傳統

城固龍頭鎮所謂特殊器型的器物，與湖北商晚期器物的特質很類似，都是帶有些微變化，但仍與二里崗銅器傳統非常相似。湖北商晚期的鑄造產業可能接收到大量盤龍城流出的銅器，同時技術傳統也仍存在，因此在發展出自己的特色的同時，受到二里崗風格很深的影響，城固龍頭器群很可能來自這個區域。這些器物能夠出現在遠在漢水上游的漢中盆地，或許與整個商早期商人勢力從盤龍城撤出的歷史背景有關。

對比本章第一節所呈現的漢中早期青銅工藝，龍頭器群銅器所需的鑄造技術尚非當地能夠達成，而且其銅錫鉛三元合金也與紅銅為主當地製品不同。從礦料來源、合金知識和鑄造技術的差異來看，將此批器物視作進口或更為合理。因此，龍頭器群的重要意義不在於表現漢中青銅鑄造業發展，而是反映與長江中游的接觸。更重要的是，重視盛裝器以及「列尊」的組合初見於龍頭器群，反映漢中重視盛裝器的傳統可能是受到長江中游的影響。

三、早期器群中容器反映的線索(2)—來自關中的交流

漢中早期典型器群第二組是以鼎、鬲為主的組合，以 1975 年城固涇水、2004 年柳家寨器群(簡稱涇水器群)²⁰¹和 2002 年洋縣北環路兩組為代表。

城固涇水器群與洋縣北環路所發現的鼎、鬲，皆源自於二里崗晚期的鼎、鬲，然而相較於早商中心的發現，這些鼎、鬲發展出商中心所沒有的特徵：(1)帶扉稜的圓柱空足鼎、(2)紅銅容器。這些特徵罕見於商中心，卻在周邊區域形成較廣大的分佈範圍。

²⁰⁰ 吳曉松、董子儒，〈湖北省黃州市下窯嘴商墓發掘簡報〉，頁 56-61。

²⁰¹ 漢中青銅器經測試而屬於紅銅器的共 5 件，4 件出於城固涇水、1 件出於隔岸的柳家寨，都發現在河岸，有可能是同一批器。

洋縣北環路帶扉稜的圓柱空足鼎(圖 12)的原形可見於鄭州二里崗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的大圓鼎(圖 80)，²⁰²但不見帶扉稜的特徵。類似的鼎在殷墟三家莊²⁰³、江西新贛中稜水庫²⁰⁴、江蘇連雲港²⁰⁵、陝西朱馬嘴、陝西銅川三里²⁰⁶皆有發現。殷墟三家莊的發現為窖藏，顯示這類鼎更可能源自周邊區域，而非殷墟生產。周邊區域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渭河盆地南北兩大區域，儘管距離遙遠，器物卻非常相似，且鑄造也都常見氣泡等缺陷。

兩地的東西有否可能是同一來源？筆者認為兩區域應各自存在生產中心。長江中游地區江西吳城已發現冶鑄的遺址，泥範與石範皆有。容器主要採用泥範，不過吳城發現 35 件鼎腿的型芯，材質為清砂岩，證實存在以石範塊製作容器。²⁰⁷涇渭河盆地藍田懷珍坊遺址發現大量煉渣與銅錠，證實從事冶鑄生產；²⁰⁸關中商文化地方類型的老牛坡遺址也同時發現冶銅遺跡和陶範。²⁰⁹長江下游與渭河盆地出土的紅銅器都較商中心多，顯示兩地在製造技術方面存在共性。

從形式分析，很難區分出兩地產品的差異，但兩地的帶扉稜圓柱空足鼎的組合卻不同，暗示用器概念很不同。江西新贛中稜水庫和江蘇連雲港的銅器群是 4、5 件大小相次、紋飾基本一致的鼎為一組。同樣的現象也見於新贛大洋洲器物坑，出土的扁足鼎、圓鼎和方鼎各自都呈現大小有序的「列鼎」。²¹⁰這些材料反映在長江中下游一帶用鼎的組合特性。而在渭河盆地的發現則多是單 1 件，若有多件鼎，也多是樣式不同的鼎(表 6)。

²⁰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京：科學，1999)，頁 86。

²⁰³ 孟憲武，〈安陽三家莊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頁 1139-40。

²⁰⁴ 彭適凡、李玉林，〈江西新贛縣的西周墓葬〉，頁 93。

²⁰⁵ 尤振堯、陳克猷，〈江蘇新海連市大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勘察記〉，頁 321-3。

²⁰⁶ 盧建國，〈陝西銅川發現商周青銅器〉，頁 107+102+116。

²⁰⁷ 彭明瀚，〈贛江鄱陽湖地區商代青銅工具和鑄銅石範的發現與研究〉，《商代江南》(北京：科學，2010)，頁 155-65。

²⁰⁸ 西安半坡博物館、藍田縣文化館，〈陝西藍田懷珍坊商代遺址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3 期 1981)，頁 53。

²⁰⁹ 劉士義，《老牛坡：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田野發掘報告》，頁 161-5。

²¹⁰ 貝君儀，〈江西新淦大洋洲青銅禮容器研究〉，(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17-22。

(表 6) 扉稜圓柱空足鼎出土的組合整理表

地點	組合(名稱為帶扉稜圓柱空足鼎)
安陽三家莊	3 錐足鼎、1 柱足鼎、1 甗、1 罍、1 釶、1 戈
江西新贛中稜水庫	5 件大圓鼎(近似)、3 件小圓鼎和 1 件甗
江蘇雲港市	4 圓鼎(近似)、3 甗
陝西禮泉北牌朱馬嘴	1 大圓鼎、1 小圓鼎、1 甗、1 爵、1 觚、1 戈、1 鏃
陝西銅川三里	1 錐足鼎、1 大圓柱鼎、1 小圓鼎、1 簋、1 弓形器、1 戈

儘管陝西北部也有出現列鼎的組合，但年代更晚，而其來源與使用脈絡均不同於殷墟早期長江地區的「列鼎」。甘泉閻家溝共出 4 件鼎，其中 3 件是紋飾類似、大小遞減的列鼎(圖 81)，鼎頸部飾簡易獸面紋，與殷墟晚期明器化鼎類似。²¹¹此墓另出土 5 簋，大小、紋飾皆同，鼎與簋的組合近似西周列鼎列簋制。陝北甘泉的列鼎與陝西在商初期的鼎組合，如上述的禮泉朱馬嘴和銅川三里的發現，呈現不同的用鼎習慣。殷墟晚期出現較多的明器化銅器，在質量變差之際，似乎產生以量取勝的風氣。安陽郭莊北村殷墟晚段偏晚 M6 出土 4 件素面圓鼎和 2 件簡易獸面方鼎，每種鼎各件的形式大小都相同。²¹²甘泉閻家溝的鼎的風格與組合更接近殷墟晚期的用鼎風氣。整體來看，漢中涇水器群的鼎樣式多不統一，情況更接近晚商早期的渭河盆地。

從鬲來看，涇水兩件紅銅鬲腹飾雙 V 形紋，與西安田王村鬲近似，此種鬲的形式可溯源自二里崗時期(圖 5)，顯示渭水盆地與商中心的緊密的關係。相較之下，長江流域發現的鬲都滿腹裝飾，束頸更為明顯，裝飾性強，與商早期的原型差別大。從風格來看，漢中出土的鬲與渭水盆地更相近。

²¹¹ 王永剛、崔風光、李延麗，〈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考古與文物》3 期 2007)，頁 11-22。

²¹² 孟憲武、李貴昌，〈河南安陽郭莊村北發現一座殷墓〉，《考古》10 期 1991)，頁 902、3。



第四節：小結

本章討論的內容，大致上可用以下的表來歸結(表 7)。

(表 7)漢中銅器早期的銅器來源

年代	地方鑄造	進口
二里崗上層晚期	小型器類：小彎形器、 鏃、珠、針、柄形器	遺址仿銅容器暗示可能 出現容器的進口
殷墟早期：出現銅器群的埋藏活動	鋒刃器類增加： 溜肩有銜斧、圓弧刀折 肩有銜斧、矛、戈、大 彎形器	(1)龍頭鎮器群的容器可能來自長江中游 (2)滑水器群的鬲、鼎可能來自陝西中部

城洋青銅器群出現的年代並沒有早到二里崗上層晚期，但遺址的青銅器和陶器的現象反映二里崗上層晚期已具備初步的當地冶鑄工業，而銅容器也有可能當時就已傳入，因此不能排除城洋器群中有部分的容器可能更早流入。

殷墟早期，龍頭器群和滑水器群中都包含當地製和進口品兩種，容器應該都是進口，而武器、工具類則為當地製造，兩種並存的現象顯示掌握當地製造品的人群也有能力獲得外來品。

但漢水上游青銅文化初期顯示在商中心的製品進入當地之前，地方已存在初步的製銅產業。在二里崗上層晚期分佈範圍從彎形器來看，僅限於城洋地區，但到了殷墟一期出現了較多的鋒刃器，這些器物較二里崗晚期的製品稍大，且品質也更進步，器物所反映的分佈範圍區域也更為寬廣。製造實用性的工、兵器類反映當地製銅進入一個新階段。儘管殷墟一期開始，當地製造的器物與商風格器物並存，但當地製造的器物從風格與其分佈範圍來看，卻與四川更有關係，反映在早期階段漢中盆地的銅器製造與四川盆地關係更緊密。不過，從彎形器、璋形器的材質、製造方式及使用方式都與四川三星堆系的銅器

存在差異，也不宜將兩地視作同一個青銅文化。²¹³

四川青銅文化的開端，應早到二里頭晚期，在四川三星堆遺址倉包包祭祀坑發現了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發現的嵌綠松石銅牌飾非常相近，故被認為屬於同一個時期。²¹⁴相較之下，殷墟早期的三星堆 1、2 號器物坑所出土的青銅容器反映的商文化影響。可以說，四川盆地在受到晚商青銅文化影響之前，已存在青銅產業，而其與二里頭文化更有關聯。但是在二里頭時期和商晚期之間的情況卻尚不清楚，目前四川發現的年代相當於商早期的遺址尚未出土銅器。筆者大膽推定上文提及的四川漢源一批偶然發現的青銅武器，很有可能是這一空缺期的唯一發現，其中一件直內鉞，其器身有大圓孔，與盤龍城的例子非常相似。有鋝斧不見於商文化，而朱鳳瀚也認為此批青銅器的有鋝斧在類型上反映較早的型態。²¹⁵漢源出了長援直內戈與折肩有鋝鉞，見於漢水上游青銅文化在殷墟一期出現的當地製品。筆者認為這反映漢水上游青銅文化初期，當地興起的鋒刃器製造其實是受到四川的影響，既有中國西南方特有的有鋝斧，另一方面與四川皆具有商文化的直內戈。以往對於商代地方青銅文化興起，認為各地方是受到早商文化青銅器的刺激下，才產生地方製銅工業。但漢水上游青銅文化初期的製銅產業的興起，第一波影響其實是來自四川地區，而非商中心地區。反映商文化影響的容器類，或許受限於技術門檻，在此時對於當地的製銅產業並沒有影響。

²¹³ 李伯謙、孫華與羅泰都將漢中銅器視作三星堆文化銅器的一部分。李伯謙，〈對三星堆文化若干問題的認識〉，《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1998），頁 375；孫華，〈四川盆地文化初論〉，《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0），頁 37。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p. 445.

²¹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廣漢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收入三星堆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館編，《三星堆研究 第一輯》（成都：天地，1998），頁 254、5。

²¹⁵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頁 1147。

第四章 當地自主性的產生



第三章討論的階段為漢中銅器群的中期，年代為殷墟二期。中期共有 6 組典型器群，數量最多。在此期銅器製造與器物組合都出現新的發展。本章首先談當地鑄造的議題，後敘典型器群所反映的組合，以及與其他地區聯繫的議題。

第一節：青銅容器製造展開的可能

漢中盆地銅器製造業在此階段進入一個質的變化階段。在初期被認定為當地製造的器物主要是小型器物，而在本期開始出現容器的製造。容器的生產非一蹴可得，階段性的發展可以從補鑄技術一窺端倪，修補技術不必然是漢水上游青銅文化中期才產生，但作為導入容器製造產生的先聲放在此章節討論。

一、青銅器補鑄技術(patching technique)

城洋青銅器，特別是容器，多見修補現象，有些器物更多次進行修補，反映器物可能使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些修補所反映的技術與特徵應該視作當地青銅工藝表現之一。

器物修補的成份也證實特殊合金成份反映本土冶鑄的看法。以下試舉一個殘鼎足的成份分析結果為例(表 8)。鼎本身為銅錫鉛三元合金，銅的比例皆低於 80%，但修補材料的成份為銅錫二元合金，其中銅的比例更是高於 90%，而在第二個修補部位的樣本更測出微量砷、鎳成份(低於 2%)。²¹⁶修補的部位與彎形器、璋形器的合金成份具一致性，或許反映鼎是輸入當地，在使用一段時間後，因損壞在當地進行修補。

從公布的 11 件有修補痕跡器物的數據來看(附錄二)，並非所有的修補部位

²¹⁶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35。

成份皆反映特殊的成份，這或許是因為修補的材料也可能摻入燒熔的舊器，所以不一定能完全反映當地的冶鑄成份特性。甚至，有些修補部位與器物本體的材料組成與比例相當接近，反映修補是在原器剛鑄完的當下，針對缺陷所採取補救措施，所以跟器物原鑄造作坊有關，而跟使用地較無關係。



(表 8) 1964 城固五郎廟殘鼎(1964CHWbT:9)

	合金	銅 (%)	錫 (%)	鉛 (%)	其他(%)	
腹底，本體 1	Cu-Sn-Pb	78	8.6	6		
腿底，本體 2	Cu-Sn-Pb	68.6	6.8	22.2		
腿部補綴 1	Cu-Sn(Pb)	93.2	2.5	1.5		
腹部補綴 2	Cu-Sn(As, Ni)	92.8	3.4	0.9	砷：1；鎳： 1.2	

青銅器顯示修補樣式多元。2004 年陝西龍頭鎮鬲(2004CHLTT:1)是目前所見商代早期最大的一件鬲，高 57 公分，重達 17.78 公斤，材質厚重，成份為銅錫鉛三元合金(67.8/7/23.4%)，²¹⁷其器底、腹部及兩足等多處有修補的痕跡。器身的修補方式推測是在破損處的一側或兩側皆安置範件再澆鑄填補破洞，而足部則在原本足的外面再套一次範重新澆鑄，像在足外又套了一個襪子，本器其中一足共有兩層足套(圖 82)。類似的足套也見於 2004 年龍頭鎮出土的甗(圖 84)，儘管有學者懷疑此器年代應晚至春秋，但修補技術卻見於商代，陝北綏德一件商晚期爵也見到一樣的足套修補痕跡(圖 83)。²¹⁸從鬲所需的技術和合金特性來看，應非出自當地製造，但是多次修補反映當地是長期反覆使用此鬲和其他器物，並且也具備相應的修補技術。此外，有些修補相當講究，按照原本的紋飾修補(圖 85)。

²¹⁷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25。

²¹⁸

補鑄(patching)技術運用雖然相對簡單，卻是接鑄法(joining technique)的技術源頭。²¹⁹在破損部位放置陶範件進行澆注，也是塊範的基本運用。盤龍城與1980年龍頭鎮簋的耳採取後鑄法與器身接合的方法，其方法與補鑄本質是一樣。

1980年龍頭器群三足壺的器蓋，因紋飾與器身的紋飾不同，已有學者推測是後來才補上。²²⁰筆者在第二章論證此蓋佈局異於傳統商文化青銅器時，注意到儘管器蓋與器身紋飾的品質不同，但圖樣本身是相近的，因此推測是依據原蓋製作。這種對舊器的修理基本上已經算是鑄造一件小器物。雖然紋飾施作，線條不流暢，還有斷裂，粗細大小不同，但是採子母口的器蓋與器身嵌合良好，蓋的大小形狀掌握精確，顯示當地鑄造容器之能力。

二、容器鑄造

儘管明確證據顯示當地具備技術相對簡單的雙合範兵、工具和修補合範技術，但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大量青銅容器有無可能是當地製造？以下有少數的例證似乎暗示當地容器製造的可能。

被本文歸於當地製造的容器全部都是尊。本文從林巴奈夫討論地方型青銅器時，將尊、壘視為同類，以折肩為特徵與圓肩的甗區分開來，缺乏敞口的壘其實是尊的一種型態，稱為「截頭尊」。²²¹從漢中青銅器來看，這樣的分類頗有道理，地方製造的容器皆屬於尊。

以下將城洋出土的獸面紋敞口尊與截頭尊各自分類為兩種類別(表 9)，一是，與其他區域尊很類似，鑒於到目前為止討論的當地青銅製品反映的製造水準都相對原始，本文傾向於將這些與其他區域差異不大的例子視作進口。即便無法排除是當地仿製的結果，器物反映的工藝內涵也是其他區域的傳統。第二

²¹⁹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87, pp.42-4.

²²⁰ 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 in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 ed. 曹璋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pp. 352.

²²¹ 認為截頭尊是源自陶器的大口尊，而截頭尊加上口緣即是(敞口)有肩尊。林巴奈夫，〈殷西周時代の地方型青銅器〉。頁 18。

類，數量較少，但因其風格獨特性，可以有信心地視作當地製造。

(表 9) 帶獸面紋尊一覽表

器類		器號	地點	高度；重量	出土的器群(底線為 典型器群)
敞 口 尊	反映其他區 域的傳統	1963CH	城固蘇	高 46 公分；	<u>1 尊、15 獸面飾</u>
		BSTT:1	村塔塚	重 10313 克	
	當地特色	1964CH	城固五	殘(有數件，	<u>尊數件、鼎數件、 刀、戈、璋形器、 樹形器</u>
		WbT:4	郎廟 b	但僅一件可 見腹部紋飾)	
		1974CH	城固蘇	高 39.2 公	
BSTT:1	村塔塚	分；重 5871 克			
	1974CH	城固蘇	高 38.5 公	2 尊	
	BSTT:2	村塔塚	分；重 5425 克		
		1974CH	城固五	高 34.9 公	僅此一件
		WT:1	郎廟	分；重 4571 克	
截 頭 尊	反映其他區 域的傳統	1965CH	城固五	高 27.6 公	2 尊(1 不存)
		WT:1	郎廟	分；重 6796 克	
		1964CH	城固五	殘	<u>尊、鼎、刀、戈、 璋形器、樹形器</u>
	WbT : 3、6	郎廟 b			
	當地特色	1964CH	城固五	高 24 公分；	<u>1 尊、2 戈、3 鉞、</u>

		WaT:1	郎廟 a	重 3601 克	15 鏃、1 陶器
--	--	-------	------	----------	-----------

1. 敞口尊

3 件可視為當地特色，光從數量就很能夠加強當地製造一說的說服力。敞口尊的器形令人聯想到二里崗時期尊的樣式，頸部僅裝飾數道弦紋，不過紋飾卻透露較晚的年代，這種風格表現與長江中游發現的商代尊類似，但 3 件尊的獸面紋卻顯示漢中自身的特點。

首先，本文先討論商代南方獸面發展的序列，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尊如第一章所示，在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發現幾乎一樣的例子，因此可作為漢中熟知來自南方尊的例證。

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尊的獸面(圖 90)為主地紋區分的羅樾 style IV，與殷墟二期獸面紋很相似(圖 89)，但有自己的特點。此夔龍紋(獸面紋的一半)，眼睛上方的角變成向前方折的奇怪鉤子；而眼睛下方嘴兩側的手爪被縮小到看不太出來是爪子，身體的上方與下方比例明顯不均衡。相比殷墟二期的獸面紋，塔塚尊的工匠不太重視兩隻夔龍身軀的描繪。

殷墟二期獸面和此件塔塚尊的獸面明顯都是源自殷墟初期小屯 M232 這類 style III 獸面(圖 87)。事實上，比起殷墟二期的獸面，此件塔塚尊的獸面身軀結構更接近殷墟初期小屯 M232 這類 style III 的獸面。style III 的階段尚未出現「寫實」的獸面，身軀與重複性的羽狀紋(quill)紋飾並沒有很清楚地區分。²²²塔塚尊的獸面應是承襲 style III 這種沒有明確身軀表現的獸面，而與殷墟二期發展出明確身軀部位的獸面平行發展。三星堆 2 號坑尊與塔塚尊極為相似，其獸面提供銜接 style III 和塔塚 style IV 獸面之間缺環的線索。這件器物的獸面看似安陽 style V 的高浮雕，但其高浮雕更像是獸面直接由 style III 凸出，稱作

²²² Bagley 認為早初工匠並有一個既定的獸面紋概念，style IV 的出現才意味著明確的動物形象被發明了。筆者認同 style IV 在獸面紋表現方法是明確化的階段，但認為獸面的概念在很早即有。Robert W. Bagley, *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Style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t*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8), pp. 82-92.

「style III 高浮雕」，不同於殷墟在發展出 style IV 的雲雷地紋基礎上，主體紋飾才發展為高浮雕。Style III 高浮雕早在二里崗末期白家莊 M2 尊的獸面出現(圖 86)。也就是說三星堆 2 號坑尊獸面與地紋區分是直接由 style III 發展為「style III 高浮雕」，而塔塚尊的獸面則是在已有 style III 高浮雕獸面的基礎下，進一步受到殷墟 style IV 主地區分的獸面影響而產生。因此其序列發展如下所示：



在第一章第二節討論蘇村塔塚器群時，筆者已揭示與塔塚類似的尊在長江上、中、下游都有發現，是跨區域共享的青銅風格。而在三星堆或湖南，兩地三個階段的例子都具備，本身可以形成明確的序列。相反地在漢中是孤例，因此傾向於認定為受到其他區域的影響，甚至有可能是直接進口的。三星堆(圖 92)及湖南鮑魚山²²³也有發現與塔塚尊紋飾屬於同一個階段的例子，兩件器型雖特殊，但獸面紋的基本結構與塔塚尊的一致，惟配合器型的差異，獸面顯得更窄。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尊應該不是當地產，但可證實當地對於這些來自三星堆或湖南的產品非常熟悉。

從接下來的 3 件例子可以看出漢中是在學習這些產品的基礎下，進而產生自己的尊。這幾件尊普遍胎薄，且器表多有氣孔，製作不精。目前保存狀態也不太好，1974 年城固蘇村塔塚 2 件尊的紋飾幾乎難以辨認。但紋飾淹漫之下，其實反映當地製造特色的線索，以下以紋飾較為清晰的 1975 城固五郎廟尊為代表(圖 91)。

與上述的 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尊比較(圖 90)，1975 年五郎廟尊獸面缺乏

²²³ 岳陽市文物管理所，〈岳陽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湖南考古輯刊》2 期(1984)，頁。

折肩上特殊的獸首和鳥形扉稜，其獸首與二里崗原型更為接近，不過獸首下方都可看到支孔，反映與長江中游獸首同樣的製作方式。²²⁴紋飾方面，同樣以一道矮短扉稜為中心，兩邊飾二目，但是餘處則以粗細無變化的雲雷紋填充(圖 91)。此表現方式看似商早期的 style III 沒有地紋的獸面紋，但其實是依據塔塚尊 style IV 這類完整獸面紋所作的粗造簡化，例如：眼睛上方還可以看到向內折的角，具有特色的嘴部特徵也一致(圖 91)，如橫放“{”型。值得注意的是，採取以雲雷紋取代細緻的獸面描繪，這種紋飾的施作方式卻更接近在關中先周銅器的簡化獸面紋(圖 95)，不同傳統的交融暗示這 3 件尊極可能是漢中當地製作，反映當地自主選擇。

2. 截頭尊

漢中出土的截頭尊，僅有 1 件本文認定為當地製造。儘管是單一例子，其特徵卻與上述當地特色敞口尊有共通之處，因此也有相當的肯定度。

1964 年五郎廟 a 地點截頭尊在第一章討論典型器群年代時已討論過，從當中我們知道此器形是源自於商早期，而二里崗時期結束後，在殷墟雖然仍有少數的發現，如 1965 年此甗發現地點的附近再度發現一件器型類似的甗，紋飾為標準的商晚期樣式，可視作反映商中心樣貌的例證(圖 96)。但其實此器型在長江流域發展更充分，從長江下游新贛大洋洲、江蘇江寧，到中游湖北黃陂、湖南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出濃厚的地方特色，例如 1964 年五郎廟 b 地點另出一件截頭尊，更可能是直接來自湖南(圖表 6)。

相較之下，1965 年五郎廟 a 地點截頭尊更可能是漢中製造，其紋飾如同上面 3 件當地製作的敞口尊，皆是以雲雷紋構成。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都是以雲雷紋構成主要的紋飾單元(圖 97)，但此件甗的紋飾來源卻更早。肩上紋飾帶的結構類似於商早期的紋飾帶，除了眼睛一往往具有突起的瞳孔—其餘的身軀部位沒有明確的描繪出來，近似洋縣馬暢安甗的 style III 例子(圖 98)。而器腹的

²²⁴ 內田純子討論過「華中型」銅器獸首的技術特徵，詳見：內田純子(難波純子)，〈華中型青銅彝器的發達〉，《南方文化》3 期(2000)，頁 41。

紋，不同於常見的勾連雲雷紋(圖 65)或雲雷乳丁紋，與 1980 年龍頭鎮器群的簋腹紋飾結構類似(圖 64)，惟缺少乳丁紋。截頭尊很可能是學習此種紋飾，但轉以更簡單的方式呈現。龍頭鎮簋的耳採用鉚釘結構，是源自早商盤龍城簋耳的技術，²²⁵腹上部的斜角雲目紋年代可能稍晚，但整體應不晚於殷墟一期。儘管這件截頭尊與上述 3 件敞口尊紋飾類似，都是將模仿其他的紋飾轉成以雲雷紋構成基本單元，只是此截頭尊紋飾的模仿來源相較於 3 件敞口尊紋飾，透露出較早的年代訊息。由於這些當地製造尊的原型在漢中銅器都可找到類似的樣本，推測當地的工匠以入手的外來銅器為樣本來製作青銅器。

整體來看容器的原始樣式應是來自長江中游，但紋飾的施作卻更接近關中先周銅器簡化獸面紋。不同傳統的交融暗示這 4 件尊極可能是漢中當地製作，反映當地自主選擇。

此外，當地製造的容器與器群的關係也值得注意。出土較多容器的大器群基本上都是進口，中期的城固五郎廟 b 點器群和洋縣馬暢安塚銅器群，兩個器群一次都出土較多的容器，容器多是進口，前者是出土數件與湖南地區發現相似的截頭尊和敞口尊，後者則是出土來自安陽的列甗、壘；相較之下，本地產品多見零散出土或是一、兩件與小銅器共出的組合。一、兩件銅器搭配小銅器的組合是中期才出現的組合，但數量最多，出土地點也最多，表示此種埋藏活動更為普遍，舉行的頻率也較高，不像多件進口盛裝器的組合集中在特定的人群手中可能被更廣泛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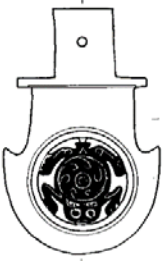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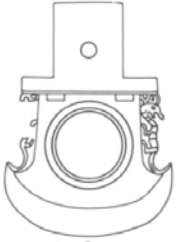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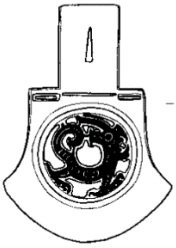

三、直內鉞

城洋銅器群中出土兩件特殊的直內鉞，其特點在於器身上有大圓孔，且圓孔有裝飾。兩者都沒有成份分析的數據，但從風格分析來看，可以證實其具有地方特色。

²²⁵ 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頁 352-86。

直內鉞中有 2 件都是圓刃且器身上有大圓孔的造型，但特別要注意的是孔的周圍凸起(圖 103)，這種形制的斧鉞應該與孔周邊與器厚薄一致的斧鉞區分開來(圖 104)。以往學者在區分夾內斧鉞的形制時，這種帶有周圍凸起圓孔的斧鉞往往依據鋒的形狀等其他特徵被分散在各種不同的類別，²²⁶沒有被視作特定的一類來討論。

(圖表 14)孔邊緣凸起的斧鉞

商早期	商晚期	西周早期
 1 盤龍城楊家灣 M11	 3 洋縣范壩	 5 洛陽北窯 M278
 2 盤龍城楊家灣 H6	 4 城固五郎廟	 6 洛陽北窯 M5

帶大孔的斧鉞能夠追溯到早商文化，孔周圍沒有凸起的斧鉞較常見，二里崗與盤龍城都有出土，但是孔周圍凸起的斧鉞僅見於盤龍城(圖表 14-1、2)，斧鉞呈圓刃、刃角上捲，肩部出欄。洋縣范壩的蛙紋斧鉞同盤龍城刃角上捲的特徵，蛙紋相當罕見，但與白家莊 M2 截頭上的龜紋類似，身上都有渦紋。但另一件五郎廟斧鉞的刃角卻無上捲(圖表 14-4)，在商早期此型態的斧鉞不見邊緣凸起的孔洞(圖 104)，應是學習前者而產生的新樣式(圖表 14-4)。五郎廟斧鉞上

²²⁶ 郭妍利，《商代青銅兵器研究》，頁 59-69；劉靜，〈先秦時期青銅鉞的再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 期 2007)，頁 52-79。

的虎紋在二里頭到西周早期之間，多次見於漢中鄰近的區域，四川三星堆(圖 102)、關中老牛坡和金沙皆出土類似的虎紋銅飾。虎紋銅鉞可能是漢中在盤龍城孔邊緣凸起的斧鉞的基礎下，嘗試利用無上捲刃角斧鉞再融入當地熟悉的紋飾而成的新樣式。五郎廟器群和洋縣范壩器群都缺乏典型商式容器判斷年代，從兩件兵器來看，兩者都是源自於商早期盤龍城的傳統，但不受殷墟的影響，考慮五郎廟還有出土一曲內戈年代可早至商早期(圖 105)，因此整體年代應不會晚於二里崗時期太久，故推測兩件器的年代是殷墟早期。

西周時期可以看到更進一步的發展。洛陽北窯西周早期的周人墓發現的斧鉞肩部出欄，刃角上捲，顯然是延續盤龍城—洋縣范壩一脈的發展，但側身出現立體的裝飾(圖表 14-5、6)。²²⁷北窯 M278 身側飾透雕虎紋，明顯承襲南方青銅紋飾特色，以立雕虎紋作為扉稜的做法也見於湖南多件罇上(圖 112)。²²⁸從商早期到西周初年的發展來看，漢中這 2 件孔緣凸起的斧鉞作為重要的中介例子證明商代長江流域對西周青銅斧鉞制風格的貢獻，而漢中可能是中間重要的傳播路徑。

西周初年寶雞竹園溝 M13 有罇斧鉞(圖 106)²²⁹加強此看法的信度，竹園溝的有罇斧鉞身側也飾有類似於北窯斧鉞的虎紋，但採用北方裝柄方式的管罇。西周初張家坡 M199 尚有一件類似洛陽北窯的例子(圖 107)²³⁰，裝飾更繁複，孔凸緣變成一隻盤繞的龍身，且龍頭還立體化地翹出斧鉞身，這種表現也見於商末陝北甘泉直內斧鉞(圖 108)²³¹，顯然也融入北方草原特色。西周初年虎紋同時出現在直內斧和有罇斧，顯示器物的形式發展並非單純的線性取代關係，而是並存且互相影響。寶雞強國與漢中的承繼關係，已有學者從「蜀式兵器」來論

²²⁷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北京：文物，1999)，頁 116。

²²⁸ 熊建華，〈湖南邵東出土一件西周四虎罇〉，《考古與文物》3 期(1991)，頁 111。

²²⁹ 盧連城、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北京：文物，1988)，頁 73。

²³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頁 169。

²³¹ 王剛、崔風光、李延麗，〈陝西甘泉縣出土商晚青銅器〉，《考古與文物》，3 期(2007)，頁 11-22。

證，²³²此件有銜斧再次反映南方虎紋傳統是透過漢中谷地向北到達關中西緣的寶雞，並可能隨著周人擴張向東到達豐鎬與雒邑。然而關中並非對南方傳統不加改造的吸收，而是進一步融入北方青銅器的特色。相較於西周初的發現，漢中的例子純屬南方的產物(相較於草原北方)，而無出現管銜等北方斧鉞的影響。²³³

甚者，孔緣凸起斧鉞的源頭可能是來自玉石器的傳統。石玉器的孔緣凸起是基於鑽、磨工藝的痕跡，打孔表現出玉石器最高的技術，以玉琮最常見這種表現(圖 109)。陶範鑄造成型的青銅器可輕易做出平滑的孔，因此這種孔周圍凸起的樣式可能是刻意保存石、玉器的傳統。功能的角度也加強這樣的推論，這類青銅斧鉞顯然並非立意於砍伐之實用，姑且不說器身帶邊緣凸起的大孔有礙於殺傷力，隨著時間往後這類斧鉞的裝飾越趨繁複，展示性加強，至西周早年的例子身側帶有立體的裝飾顯然已完全無法用於砍伐。從這個脈絡來看，這類斧鉞應是延續玉石禮器的傳統，在出現之初即帶有強烈的禮儀意涵。漢中這兩件直內鉞，大孔中飾有蛙紋或虎紋，較商早期的例子更強調裝飾性，有更強的展示性。以往討論漢中兵器常強調漢中的兵器銅質厚重，有學者認為此種斧鉞的圓刃造型殺傷力強大，應是用於實戰之器。²³⁴本文認為漢中青銅兵器品質優良，不只是因為作為保命的武器，也不可忽略其象徵意涵，尤其這兩件孔緣凸起斧鉞更可能是禮器。

第二節：青銅產品消費地的特質

儘管漢中盆地中期可能出現鑄造容器，但從其目前的分佈範圍及數量來看，影響也不大，尚不足以將漢中盆地視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鑄造中心。但是這

²³² 盧連城、胡智生，〈虢國墓地出土兵器的研究，兼論蜀式兵器的淵源與發展〉，《寶雞虢國墓地》，頁 431-46。

²³³ 南北斧鉞制的差異與地域分布，參考：陳芳妹，〈商後期青銅斧鉞制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1997)，頁 983-1051。

²³⁴ 郭妍利，〈城洋青銅兵器研究〉，收入《城洋青銅器》，頁 262-3。

裡可能是一個青銅產品消費地，並且也呈現了當地的獨特性。

一、組合

首先，漢水上游在器物組合上有其獨特之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期典型的組合，是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小型銅器為主。組合中器物不只是進口容器，也有當地製造的容器，尤其後者僅出現在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小型銅器為主的組合，特別值得注意。

城洋青銅器群所呈現的器物組合，與商中心不同是相當明顯，但與長江中游一帶，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有類似之處，不過還是有所差異。兩者共同之處在於常出土單件的器物。長江中游出土單件器物的情況很常見，這種只發現單件的情況，不宜全部歸因於缺乏足夠的考古發掘，也要考慮當地埋藏活動本身的特性。同理，城洋地區零散單件的器物也相當可能出自於漢水上游特定的埋藏活動。

漢水上游地區與長江中游地區都有類似的單件出土現象，不過城洋器群另一種典型的組合卻罕見於長江中游地區。城洋器群典型的一、兩件容器搭配小型銅器組合在湖南僅有一例，湖南寧鄉出土一甌內有 224 件銅斧。²³⁵而且伴出的斧並沒有使用的痕跡，故有學者基於此推測其為「斧幣」。²³⁶姑且不論此推論是否合理，城洋地區發現的組合伴出的小件器物，以斧、戈等實用鋒刃器為主，與湖南的組合有所不同。

事實上，在長江中游更多的例子是與玉器伴出。²³⁷與之相反，漢水上游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商代的玉器，當地似乎罕見玉器的使用。這點不只與長江中游不同，也異於上游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後兩者的玉器興盛程度一點也不亞

²³⁵ 湖北也有出 1 鼎內有 56 件斧，但年代晚至東周，見：王善才、費世華，〈湖北陽新發現一處青銅器窖藏〉，《文物》8 期(1993)，頁 75-9。甌的紀錄，但不包含斧的樣子：高至喜，〈湖南寧鄉黃材發現商代銅器和遺址〉，《考古》12 期(1963)，圖版 4-3；斧的紀錄見：傅聚良，〈商代銅斧的功能〉，收入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銅器》（湖南：岳麓書社，2007），頁 446。

²³⁶ 傅聚良，〈商代銅斧的功能〉，頁 443-8。

²³⁷ 喻燕姣統計湖南有 7 處，喻燕姣，〈略論湖南出土的商代玉器〉，《中原文物》5 期(2002)，頁 43。

於銅器，且玉器在祭祀當中占重要的角色。漢水上游自早期起，與四川盆地青銅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但用玉方面卻呈現極大的反差，或許反映兩者在宗教思想和祭祀禮儀的不同。



二、修補與二次加工

反覆修補的現象也與使用者更密切相關，而非生產者，在第一節已陳述。本小節進一步要討論二次加工。二次加工也是基於漢水上游作為一個青銅產品消費地所發展出來的青銅技術特質。

人面飾、獸面飾、尖頂銅泡、透頂銅泡以往被視為漢水上游地區的特色品，但成份分析數據好像無法支持此說法。這些銅飾品以銅錫二元和銅錫鉛三元合金為主，錫含量都高於 10%，成份的特性與漢中本土的彎形器或璋形器差異頗大。²³⁸富錫的現象直接體現在許多銅面飾器表呈現銀色。而關中也有出土這些銅飾，並且還出土陶範。陝西中部老牛坡商代鑄銅遺址出土獸面飾和圓形銅泡的陶範，同時在遺址的墓葬內也出土了獸面飾、人面飾和尖頂銅泡；²³⁹岐山賀家村²⁴⁰、陝北淳化²⁴¹各自有出獸面飾和尖頂銅泡，不排除關中生產的可能。陳坤龍與羅泰以為關中出土的數量雖沒有漢中多，但出土地點其實更多，更可能是原生地。²⁴²

這批銅器雖無法排除是來自關中的鑄坊，但除了考慮生產地的問題，這些銅器上的一些現象反映漢中作為消費地對銅製品事後進行加工。透頂銅泡、尖頂銅泡和少數獸面飾的器緣處的小孔並非鑄造成形，而是事後打磨而成，可看見孔的兩側有延長的凹槽(圖 101)。²⁴³孔極小，似乎僅能穿線附著於其他物體。而且每件泡的小孔數量不一、位置也不規則，反映這些孔洞並不是鑄造完後，

²³⁸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蘇村出土銅器的技術特徵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3 期(2015)，頁 128-8。

²³⁹ 劉士義，《老牛坡：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田野發掘報告》，頁 296-300。

²⁴⁰ 戴應新，〈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 期(1976)，頁 31-38。

²⁴¹ 姚生民，〈陝西淳化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5 期(1986)，頁 12-22。

²⁴²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p. 267-8.

²⁴³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蘇村出土銅器的技術特徵及其相關問題〉，頁 126。

一次性全部進行鑽孔的作業，而更可能是隨實際需求在每個泡不同的地方打鑽出不同數量的孔洞。相較之下，周原岐山賀家村 M1 出土人面飾(圖 120)就沒辦法這麼靈活。人面飾表現牙齒時採鏤空顯示在風格上與蘇村塔塚人面飾有共通之處，但賀家村的人面飾背後有一橫鈕，是與器物一體成形，無法因應後來使用的情境而變動。相較之下，蘇村塔塚採用的這種事後才打磨孔洞顯是以銅飾遷就裝飾的主體，顯得更為靈活。

中期的青銅容器鑄造，主要展現對外來影響的模仿，但當中或有地方特點，如：容器是模仿來自長江的器物，但在紋飾施作上卻是使用先周銅器常見簡化獸面紋。同樣地，二次加工的特點，也使我們能看到，當地為因應實際使用需求所做的主動調整。上述兩種主動性，反映漢水上游作為一個主體(agent)，其青銅產業對於外在刺激的一種回應，而這種主動性正是反映區域青銅特色成立的要點。

第三節：相互交流的興起

到目前為止，本文所討論的都是針對漢水上游青銅文化受到何種外來因素的影響。但到了中期，我們可以看到漢水上游青銅文化的因素出現在其他的區域，而這些區域集中在北邊的渭水盆地。在漢水上游青銅文化早期，就有來自漢水上游的青銅器，但到了中期帶有漢水上游文化因素的器物則出現在渭水盆地，顯示兩者的雙向交流。

一、陶器所反映的線索

漢水上游與北方渭河盆地之間的聯繫，率先被注意到的是與商末周初之際的寶雞獮國的聯繫。寶雞獮國墓地部分陶器、兵器與漢水上游地區的特色器物非常相近，包含尖底陶罐、尖底鉢、三角援戈、有銜斧等。²⁴⁴但實際上，早在

²⁴⁴ 盧連成，〈獮國墓地出土兵器的研究，兼論蜀式兵器的淵源與發展〉，收入盧連成、胡智生編，《寶雞獮國墓地》(北京：新華，1988)，頁 436-46。

殷墟初期，城洋器群中就有來自關中的青銅器，顯示在更早兩地就存在聯繫(第二章)。

但到了中期，從寶山遺址的生活用陶器也開始體現北方渭水盆地對漢水上游的影響。寶山遺址第二期，約是殷墟二期，當地炊具出現新的類型—折襠鬲(圖 111)，並在之後的時期持續使用。發掘者指出鬲根據器型與製作方式，與關中平原西部扶風壹家堡的鬲相似(圖 110)，²⁴⁵反映受關中京當型商文化的影響。²⁴⁶兩者製法都採三足聯合模製，後加接頸部與足跟的方式，²⁴⁷但寶山遺址的鬲腹部紋飾與當地陶斧特徵一致(圖 113)，可見當地對外來物的轉化，已融入當地的特徵。引入新的炊煮器可能意味飲食層次的變化，相較於早期短暫出現的商式仿銅陶壘、簋因素，影響層面顯得更深刻。但圜底陶釜作為最主要炊煮器的情況仍維持不變，顯示主體文化仍未改變。

二、渭河盆地出現來自漢中盆地影響

進一步，在北方的渭河盆地也出現漢水上游的陶器和銅器。在周原岐山王家嘴遺址發現的高足陶杯應是受到漢中盆地的影響，陶器的年代可能是殷墟二期(圖 119)。²⁴⁸高足杯在周原罕見，但寶山遺址三期皆有，而且可能非一般的生活用具，具有特殊的意義。

高足杯(圖 115)移除高足後，器身與遺址的尖底杯類似，可能是尖底杯加上高圈足的變化(圖 114)。尖底杯與高足杯兩者杯身隨時間的器形演變一致，可以證實這個說法。此類尖底杯在寶山遺址應該不是日常用具，土質較細膩，其中不少胎體厚度僅 1、2 毫米，不太可能是日常用器。²⁴⁹推測小杯是與高柄器座搭

²⁴⁵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67；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陝西扶風縣壹家堡遺址 1986 年度發掘報告〉，《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360。

²⁴⁶ 張天恩，〈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收入李永迪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28。

²⁴⁷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43。

²⁴⁸ 張天恩說此陶杯是與相當於殷墟二期的簡化饗饗紋鼎共出。張天恩，《關中商代文化研究》(北京：文物，2004)，圖 15。

²⁴⁹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03。

配使用(圖 116)，²⁵⁰遺址出土不少的高柄器座，完整的高可達五十多公分，²⁵¹高柄器座的上部侈口似杯，但透空無底，其上部的演變也與小尖底杯器身一致，越晚越陡斜、器型越誇張。小尖底杯在三峽地區也發現很多，但是作為鹽業生產工具，器表多粗糙，且發現時多為碎片。²⁵²相較之下，寶山遺址的小尖底杯、高圈足杯和高柄器座都非日常生活用具，強調高度的器形，可能用於展示或祭祀。相較於陶高足杯在漢中所具有的密集度與特殊意義，陶高足杯在渭水盆地目前僅發現一件，似乎也非出自一般的居址，²⁵³或許不該將其視為兩地之間持續的相互影響，而是特例，例如特定的交流、特定的事件。

在渭河盆地的關中除了發現陶杯，也發現一件「銅質」高足杯(圖 117)，²⁵⁴器形目前尚未見到類似的銅器例子，很可能也是模仿寶山的陶高足杯。銅杯紋飾接近商早期銅器風格，以連珠紋為欄，而獸面是先周青銅器常見的簡化獸面紋。上一節討論的漢中盆地當地製造的幾件尊也是採用類似的獸面(圖 94)。就此來看，扶風美陽銅高足杯，以漢水上游當地特色的器型，施以關中簡化獸面紋，與當地製作的尊類似，都融合了不同地方的特色。

張天恩以為這代表兩個文化中具共通的文化因素，反映漢水上游青銅文化與商文化京當型的相互影響。²⁵⁵然而，高圈足杯在漢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但在周原卻看不到承襲同樣的概念。筆者更傾向於認為此件銅器背後的贊助者可能是與漢水上游青銅文化直接相關的人，而非京當型受到漢水上游的影響而自主生產。關於此件器物的生產地，筆者認為有兩個可能：一是此件器有可能是在

²⁵⁰ 感謝遺址發掘主持人趙叢蒼老師告知此可能性，實際上小尖底杯也是放得進去高底器座。

²⁵¹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25。

²⁵² 孫華、曾憲龍，〈尖底陶杯與花邊陶釜—兼說峽江地區先秦時期的魚鹽業〉，收入李水城、羅泰編，《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北京：科學，2006)，頁 286-315。

²⁵³ 同註 32。

²⁵⁴ 現在紀錄都說出於扶風美陽，但張天恩查詢到另一種說法：《寶雞市文物大事記》載文物是美陽村民在周原修水庫發現，實出中原，參照陶器的發現極有可能。羅西章，〈扶風美陽發現商周銅器〉，《文物》，10 期(1978)，頁 91-2；張天恩，〈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頁 228，註 73。

²⁵⁵ 張天恩，〈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頁 228-9。

漢中生產，在偶然的因素流到周原。尊與高足杯可能都具備宗教或祭祀等意涵，而兩者在製作上也有共性，都維持其原型的基礎上，採用以雲雷紋為基礎單位的簡化獸面紋，有無法排除漢中當地生產的可能性。第二種可能是，在周原作坊生產但其贊助者是來自於漢水上游青銅文化的人。此種假設涉及周原作坊有否可能以在供應內需之餘，也生產「外銷」為導向的產品？雖屬大膽的假設，但以下的材料也透露可能性。

三、漢中器群所反映的關中影響

1976年城固蘇村小塚具有直接的證據證實關中和漢水上游密切的關係。小塚器群出土414件銅器，2件方壘為典型殷墟風格，其中1件還有銘文，可能是自傷文化區域進口。渭水盆地在晚商經過一段商文化勢力衰退的過程，在西安為界以西的範圍在殷墟二期仍以商文化主導，屬於商文化的地方類型—京當型。²⁵⁶關中發現許多典型晚商文化的器物，因此漢水上游出現的典型商文化銅器很可能是經由渭水盆地，穿越河谷而來。

器群內另外出有直內三角援戈、有胡直內三角援戈、人面飾、獸面飾、尖頂銅泡和透頂銅泡，共412件，數量之多以往一直被視作漢水上游青銅文化的特色。但老牛坡發現一致的人面飾、獸面飾、尖頂銅泡，以及小塚器群的成份分析結果似乎更傾向於說明小塚的器物是自關中進口，而非當地的產品。老牛坡遺址不只在墓葬中有發現一樣的器物，還在鑄銅作坊還出土獸面飾和透頂銅泡的陶範，證實老牛坡遺址生產這類器物。²⁵⁷而城固蘇村小塚這些器物的成份僅見錫銅和錫鉛銅，且錫含量普遍偏高的成份特徵也不符合彎形器和璋形器等地方特色器物的合金特色。儘管老牛坡並沒有出土類似的長胡和無胡三角援戈，成份特徵與上述的飾件與銅泡一致，連帶著也被認為更可能是關中的產品。²⁵⁸

²⁵⁶ 雷興山，〈對關中地區商文化的幾點認識〉，《考古與文物》2期(2000)，頁28-34。

²⁵⁷ 劉士莪，《老牛坡：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田野發掘報告》，頁269-7+296-300。

²⁵⁸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蘇村出土銅器的技術特徵及其相關問題〉，頁122-8。

不過，城固的人面飾、獸面飾、尖頂銅泡、透頂銅泡，較老牛坡的發現有更多漏銅的鑄造缺陷(圖 118)，這點特徵又與彎形器、璋形器的鑄造品質類似。其實成份不含紅銅或砷、銻、鎳等特殊合金，也不代表就非當地生產。彎形器與璋形器也有錫銅合金。但的確無法排除是老牛坡生產後才進口到漢水上游的可能。

羅泰就此推測可能是關中將次等品給這些秦嶺以南消費者。²⁵⁹羅泰的說法，實際上也反映作者考慮到生產地與消費地的問題，只是誰是消費主體(或羅泰所謂的原生地)卻可再議。老牛坡出土的例子皆集中在老牛坡遺址最大的墓葬 M41。²⁶⁰儘管 M41 被盜，僅餘小飾品，如金虎形飾、小鏤空牌飾、魚形飾、鳥形飾，這些器物與南邊的漢中及更南方的四川盆地青銅文化的器物類似。其中金薄片多出土於三星堆和金沙，卻罕見於商文化，又類似的虎形飾在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皆有出土，是強而有力的證據說明與四川盆地青銅文化的聯繫。M41 帶有腰坑是典型商文化的傳統，這些小器物呈現非典型商文化，反映這些元素是屬於外來因素。獸面飾、人面飾也應與這些小形飾件看做一組，視作南方來的因素。老牛坡作坊出土陶範，有可能反映當地是為南方客人所生產。這種較發達的青銅生產地為周遭技術較落後的區域製造所需銅器，雙方進行貿易，在東周時期有這樣的例子，秦為北方草原民族生產所需的銅器。²⁶¹美陽高足杯和老牛坡獸面飾、人面飾、圓泡的現象來看，渭水盆地的青銅作坊或也可能為來自南方漢水上游消費者提供產品。

²⁵⁹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p. 267-8.

²⁶⁰ 劉士莪，《老牛坡：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田野發掘報告》，頁 296-300。

²⁶¹ 東周秦與北方的貿易，詳看：Emma C. Bunker, "Luxury Exports from China to the North," in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ed. Jenny F. So and Emma C. Bunker (Seattl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p. 53-66.



第四節：比較

漢中盆地用銅文化中期受到兩個區域的影響最深，一是來自長江中游的青銅文化影響，二是來自北邊渭河盆地的影響。

從進口器物來看，漢水上游地區可以發現許多與長江中、上游相似的器物，主要是敞口尊與截頭尊。與渭水盆地的關係，也反映在陶器和銅面飾、銅泡等，而且兩地之間的交流是雙向。同時，小塚器群中與婦好墓類似的方壘和眾多人、獸面飾和尖頂、透頂泡共出，反映商文化的產品應是經由關中而來。

儘管有與渭水盆地密切的交流，但在用銅習慣上，漢水上游卻與以鼎、簋為重的關中作出區別。漢水上游地區與長江流域在偏重器類與組合的相似性，反映這些地方內在的用銅文化是比較相近的，也因此當漢水上游地區開始發展自己的容器製造，主要模仿來自南方的尊。但在紋飾施作上卻是採用類似於關中簡化獸面的方式，從這點來看，在製作技術方面，漢水上游地區與關中是比較相近的。甚至，從銅高足杯、人面飾、獸面飾、尖頂泡和透頂泡來看，關中的作坊也生產這類器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反映兩地之間在銅器製造方面是比較密切。

比較漢水上游與長江中游和渭水盆地的關係，漢水上游與長江中游的關係中，漢水上游是主要的收受方，主要看到的是長江中游流域單向對當地的影響，卻基本上沒有看到漢水流域如何影響到長江中游區域，此可能反映長江中游對於漢水上游的影響可能是間接，而沒有直接接觸。從長江流域、四川盆地、漢水上游三者容器普遍具有共性來看，漢水上游可能經由四川或三峽地區受到長江中游的影響，第一章提及蘇村塔塚的高圈足敞口尊，其分佈範圍於長江下、中、上游皆有。其中上游的三峽地區王家灣出土的例子暗示長江中游的影響從三峽地區河谷向北到漢水上游的可能，特別是三峽地區曾有發現過典

型早商風格的銅器(圖 121)，²⁶²但在四川盆地卻沒有。三峽地區的考古工程因應三峽大壩的修築進行大規模的搶救發掘，使得該區域的考古材料驟增，但至今大多尚在整理，因此也沒有太多的資料去探索更細緻的交流與互動。不過，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包含王家灣遺址在內的大凌河流域，發現大量的「夏商周」遺址，反映這條通道可能是商時期長江流域與漢水上游之間重要通道。²⁶³

相反的，漢中與渭河盆地的交流是雙向的，但用銅文化的差異使得漢水上游沒有接受渭河盆地的銅器使用方式，但在青銅器紋飾施作和工藝方面卻與渭水盆地有更密切的關連。當地製作的尊最能體現漢水上游與長江中游和渭水盆地的關係：器物的原型與使用方式皆與長江中游類似，但紋飾的視作卻是同於渭水盆地。

本章所呈現的漢中盆地用銅文化中期的面貌，大致上可用以下的圖表來歸結(表 10)。

(表 10) 漢中銅器晚期銅器的來源

年代	地方鑄造	進口
殷墟二期	出現容器的鑄造： 敞口尊、截頭尊、高足杯* 新類型的武器出現： 直內圓弧鉞、三角援戈*	(1)1964 年城固五郎廟 b 地點器群的容器可能是來自長江中游(經過三峽地區) (2)1990 洋縣馬暢安塚列甗、壘可能是來自殷墟(經過渭河盆地)

*代表可能是當地製作，或者當地委託渭水盆地製造，但反映當地文化的需求

²⁶² 黎澤高、趙平，〈枝城市博物館藏青銅器〉，《考古》9 期 1989)，頁 755-6。

²⁶³ 三峽地區「文物分布示意圖」顯示大量的商周遺址密集分佈在大凌河流域，但關於這些遺址具體的內涵，目前尚不清楚。鄒後曦、王風竹，〈三峽考古佐證長江文明〉，頁 66-7。

第五章 結論



本文基於新出土的考古遺址材料和舊材料的統整出版所釋放的器群訊息，對漢中盆地用銅文化的器物進行分期，並細緻化建立每一期的變化，討論的變化面向包含器群的特色、當地製作銅器的器類變化、進口物品的來源變化。金一步透過這些層面建構漢中盆地用銅文化的鑄銅產業成形和與周遭用銅文化之間的關係。

第一章分析器物的組合變化、分布特性，嘗試從「儀式」的角度來討論漢中銅器群的性質。地點、組合具高度的規律性，代表社會形成一套相當規範化、正式的活動，反映「儀式」特性。進一步，組合的變化反應儀式從早期是掌握在特定的群體中，到中期舉行次數變得更密集，或者有更多的群體能夠參與。儘管過去學界對漢中銅器群的性質已提出祭祀之說，但本文從儀式的角度更進一步分析銅器群背後反映儀式參與人群和儀式舉行頻率變化，試圖描繪出更具體一些漢中「用」銅文化。

第二、三章主要從銅器的形制來討論漢中銅器群和其他區域的關係，過往學者研究重「形」和較忽略「制」的層面，故本文結合成分分析數據，以及對於修補、打洞等鑄造技術的觀察，從鑄造技術的角度來討論漢中當地鑄造的可能，以解決漢中銅器群的來源問題。目前漢中地區尚未發現冶礦、鑄造遺址，討論當地鑄造的可能性尚缺乏直接證據，在過去對外形風格分析的成果之上，鑄造技術的分析角度或能不同的思考角度。甚者，以往學者甚少提及的修補、打洞這些二次加工的現象，事實上反映漢中銅器群作為銅器消費地的性質，是當地用銅文化重要的面向之一。

整體而言，本文嘗試從儀式和鑄造兩個以往較少討論的分析角度來討論漢中銅器，藉此揭開漢中用銅文化的一部分面貌。過去已有學者以儀式的分析角度來討論長江中游的器物群和三星堆器物坑，但漢中銅器群並沒有納入討論

中。²⁶⁴基於本文對漢中銅器的分析，未來或可從儀式的角度進一步分析三地之間關係。而鑄造技術的研究近年來也極為興盛，²⁶⁵但商時期不同青銅區域之間是否存在技術差異問題卻尚未明朗，漢中銅器的技術特徵所反映的區域問題，尚待更多的資料。本文僅提出一種可能性，隨新資料的累積，未來也可能需要修正。

以下嘗試從整個商代區域用銅文化興起的角度，來看漢中盆地用銅文化的意義。商代區域用銅文化興起的論述中，商中心擴張說一直是主流。1977年 Bagley 《盤龍城》²⁶⁶一文，將商文化擴張的時間拉到了二里崗時期，並認為至少到殷墟初期各地銅器已出現鮮明的地方特點。其說法為後來很多學者同意，只是各研究者對區域青銅特色興起原因的解釋不同。Bagley 認為地方特性的興起是因為商的衰退，時間發生約是在商人放棄鄭州到安陽的時候。他在往後的著作更清楚地闡述擴張原因是源於二里崗驟然的政治軍事力量擴張，因為只有在快速擴張的清況下，才可能各地突然出現與二里崗一致的銅器。²⁶⁷李伯謙的看法基本與 Bagley 一致，他將此擴張模式稱為「急進的暴風雨式的傳播模式」。²⁶⁸張光直則沒有那麼明確地說是各地區域性的興起起因是商文化的撤退，而僅說長江南方區域風格的興起反映南方的各群體之間「互動的增加」(increasing or increased interaction with cultures with regionally varied substrata in the south)。²⁶⁹而淺野達郎在討論蜀式兵器源流時，引述張光直的說法，但實際上他對於各地銅器的地方特色興起的解釋與 Bagley 更一致，只是對於擴張背後

²⁶⁴ Rowan K Flad, "Ritual Topographies: Sacrifice and Division", *Ancient Central China: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09-85.

²⁶⁵ 黃銘崇稱青銅鑄造技術研究邁入「極盛相」。參見：黃銘崇，〈邁向重器時代：銅器技術的輸入與中國青銅技術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5本4分(2014)，頁576。

²⁶⁶ Robert W.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39, no. 3/4 (1977), p.210.

²⁶⁷ 同上註，但作者在更晚的著述有清楚的闡述：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8-80.

²⁶⁸ 李伯謙，〈從對三星堆青銅器年代的不同認識談論到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文化滯後"理論〉，《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1998)，頁303。

²⁶⁹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21.

的原因並沒有深究。²⁷⁰

不過，漢中盆地出現製銅的時間並不晚於二里崗風格銅器進入當地的時間(表 11)。漢中盆地出現含二里崗風格容器的銅器群的時間約在殷墟早期，但是開始製造一些小型銅器類的年代，至少可以回溯至二里崗上層晚期，未來也可能發現更早的青銅製造例證，但至少可以確定二里崗上層晚期漢中盆地的青銅鑄造仍處在相對原始的階段。

漢中盆地此時期的當地製品以紅銅的小件器物為主。與鄰近區域中的三峽地區銅器產業大致處在同樣的發展階段，三峽地區也魚鈎、鏃、刀等簡單小件器物，其中魚鈎更是反映當地漁獵經濟型態的生產工具。²⁷¹寶山遺址出土的銅珠、針這類的製品目前尚未見統整性研究，難以討論區域差異的問題，但彎形器卻表現明確的區域特性，迄今尚無在其他地區發現任何近似的例子。儘管尚不清楚初步的製銅產業到底如何展開，至少可以確定在二里崗文化影響抵達之際，當地已經具備初步的製銅產業，而非二里崗文化影響下才出現。

殷墟一期是城洋青銅器群中最早一批容器群出現的時間，進口容器的來源可能不是直接來自二里崗文化中心地，更可能間接來自受二里崗文化影響的區域，從龍頭器群和涇水器群來看可能分別來自湖北和渭河盆地。不過殷墟一期進口容器的出現，並無刺激當地興起容器的製造。殷墟一期出現的新銅器類型是有銜斧、雙耳矛和長援直內戈鋒刃器這類鋒刃器，功能是工具或武器不能肯定，但皆是實用器，延續二里崗晚期以工具等小器物為主的傳統但更為進步。這些鋒刃器反映的區域聯繫是與四川盆地地區，而非商中心。儘管四川地區並沒有發現商早期風格的容器，但四川漢源一批武器則反映商早期風格銅器在四川是存在的。有肩銜斧罕見於商中心，卻是中國西南方盛行的斧制。除此之外，與早商文化的武器類型，包含直內長援戈和雙耳矛，也可能同有銜斧一併受到四川影響。因此，儘管殷墟一期的時候漢中盆地已經出現二里崗風格的銅

²⁷⁰ 淺原達郎，〈蜀兵探原—二里崗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頁 32-8。

²⁷¹ 長江水利委員會，《宜昌路家河：長江三峽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2002，頁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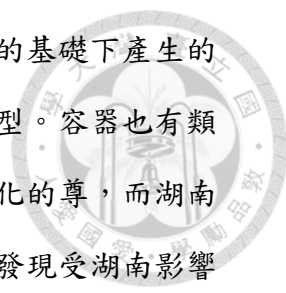
器，但當地的鑄銅產業所新產生的鋒刃器並非受到二里崗文化的影響，而是反映與四川用銅文化的聯繫。不過也不宜逕將四川與漢中視為同一個用銅文化圈，兩者在成分、製作技法和使用方式上似乎存在一定的差異。

殷墟一期之時當地製造產品與進口品之間的關係為何？當地製造的產品大部分都是實用器，唯大彎形器似乎具有特殊的用途，此器物往往與具有大量進口容器的銅器群共出，反映掌握地方製品的人群同時也掌握進口品。可以說，當地青銅製品在漢中盆地早期是掌握在同一群人手裡。

(表 11) 漢中銅器的來源

	當地製造	進口
二里崗文化晚期	以紅銅小器物為主：珠、針、柄形器、鏃、小彎形器	仿銅陶容器暗示可能存在商式容器的進口
殷墟一期	出現新種類的鋒刃器：大彎形器、溜肩有銜斧、圓弧刃折肩有銜斧、雙耳矛、長援直內戈	(1)龍頭鎮器群的容器可能來自長江中游 (2)涇水器群的鬲、鼎可能來自陝西中部
殷墟二期	出現容器的鑄造： 敞口尊、截頭尊、高足杯 出現新類型的武器： 直內圓弧鏃、三角援戈	(1)1964 年城固五郎廟 b 地點器群的容器可能是來自長江中游(經過三峽地區) (2)1990 洋縣馬暢安塚列甗、壘可能是來自殷墟(經過渭河盆地)

到了殷墟二期，當地用銅文化進入興盛期，從當地製造的數量與種類兩方面都可應證。當地製造方面除了出現新的武器類型，極可能還有容器製造的出現。武器的類型不同於早期有肩銜斧明顯異於商文化傳統，直內圓弧鏃與三角援戈都與商式武器明顯有淵源關係。而這類青銅器更符合以往 Bagley 或淺野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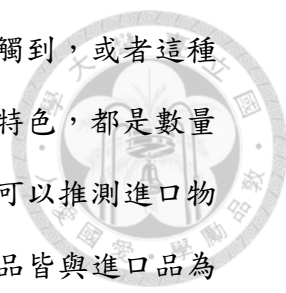


郎所定義的區域特色青銅器，即，區域特色銅器是以商式銅器的基礎下產生的變化，而且原型並非來自殷墟，而是以二里崗文化的銅器為原型。容器也有類似的現象，尊的原型明顯是來自長江中游湖南一代區域用銅文化的尊，而湖南青銅器是承接二里崗的傳統而與殷墟平行發展，所以漢中盆地發現受湖南影響的尊，最初的源頭也是商早期的尊。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中盆地的尊並非直接模仿湖南商晚期的尊樣式，而是以此為原型，進一步融合渭水盆地較為興盛的簡化獸面紋的紋飾施作方法。這種不同文化傳統融於一器，正是容器為當地製作的較信實的證據。

不過，渭水盆地與長江中游影響層面的差異，意味著兩地的關係對於漢中盆地來說是不同的。漢中盆地偏愛容器的用銅習慣與長江中游類似，所以其對銅容器的需求也近似，因此在當地開始生產容器時，選擇生產尊類的容器同時尊的原型與長江中游更有關聯。但其鑄造技術和銅器的生產方面與渭河盆地關係可能更密切，因此其施作紋飾採用的是渭河盆地常見的簡化獸面紋。甚者，漢中盆地的獸面飾等器物在渭河盆地老牛坡遺址直接出現陶範，可能意味著渭河盆地為漢中盆地生產所需青銅器。

在殷墟二期，進口銅器至少有三個來源，一是殷墟，二是長江中游的湖南，三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系青銅文化。長江中游與四川盆地的聯繫在二里崗晚期或殷墟一期已經存在，但漢中與殷墟的聯繫直到殷墟二期才明確出現，而且可能並非直接接觸，而是透過渭水盆地接收到殷墟的進口品。1976年城固蘇村塔塚出土2壘與婦好墓的方壘近似，其中1壘有銘文「亞伐」，反映容器本身可能是商中心生產，而與壘一同出土的獸面飾、人面飾、尖頂泡和透頂泡卻在渭水盆地老牛坡遺址發現生產遺址與陶範，很可能是渭水盆地的產品，兩者共同出土可能反映殷墟的器物是由北方的渭水盆地帶入。

組合方面，殷墟二期當地也產生一種新的組合方式，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小件銅器，還有大量的單件出土現象。這些組合的銅容器有進口也有當地製作，但當地製造的容器都屬於這種埋藏方式。這種組合方式的出土地點較多，



數量也較多，反映當地器物相較於進口物，有更多的人可以接觸到，或者這種組合方式的埋藏活動更常舉行。進口器，沿襲殷墟一期的器群特色，都是數量較多的器群，反映進口產品都是較為集中，一次大量性擁有，可以推測進口物品仍掌握在特定少數人手中，而彎形器與璋形器這兩種當地產品皆與進口品為主的大器群共出，與初期大彎形器的情況類似，因此可能是性質類似的一群人，其埋藏活動可能與一、兩件容器搭配兵、工具的組合不太一樣。

透過對漢中銅器的分析，最後可以反思商代青銅文化的互動問題。以往對於中原以外的青銅系統往往區分成兩種成分，中原傳入和中原影響下的地方特色。但隨著對非中原系統青銅器理解的增加，包含晉陝青銅器、湖南湖北青銅器、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青銅器、江西中部吳城類型青銅器，²⁷²要考慮所謂影響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區域。而過去簡單歸類於中原影響的器物，有可能是「間接」的中原影響，即模仿到其他區域受到中原影響的青銅器。商中心挾其強勢文化與技術向外擴張是不可否認，但單純的「中心—地方」模式或許應該修正成更複雜的互動網絡。在漢中盆地鑄銅產業成形的過程中，來自長江中游和渭水盆地的「間接」影響，可能比中原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²⁷² 參考李伯謙對於商晚期的青銅分區系統，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

附錄



附錄一：器群整理表

漢中銅器群			
早期	城固龍頭 1980	65	1 罍、2 尊、1 簋、1 卣、1 壺、4 觚、1 盤、4 鉞、7 矛、43 彎形器
	城固龍頭 1981	26 距 1980 發現 1m	2 罍、1 鬲、1 壺、1 觚、1 爵、1 盤、2 戈、17 彎形器
	城固滑水 1975b 殷墟一期	21 距河岸 300m	3 鼎、2 鬲、16 彎形器
	洋縣北環路 2002	2	1 鼎、1 戈
中期	城固五郎廟村 1964a	21 底表下 1.5m	1 甗、3 鉞、2 戈、15 鏃
	洋縣范壩 1979	52 地表 1.5m，也出 15 齒形飾石器	2 鉞、8 戈、2 戚、2 刀、17 鏃、3 彎形器、10 璋形器、4 夔鳥形式、2 魚形飾、1 器柄飾、1 鈴
	城固蘇村塚塔 1963	16 滑水河岸	1 尊(與三星堆類似)、15 獸面飾
	城固蘇村小塚 1976	414	2 罍、21 人面具、11

		地表下 3m，分兩層地層，不規則圓坑，底距表 3.5m，尖頂泡在壘內，其他散落一旁，壘倒置	獸面飾、97 戈、193 尖頂泡、90 透頂泡
	城固五郎廟村 1964b	24 距 a 約 100m，地表下 1.5m	4 殘壘、3 尊、9 殘鼎、1 戈、1 刀、3 璋形器、1 樹形器、2 殘圈足
	洋縣馬暢安塚 1990	6 村北	1 壘、5 甌
晚期	洋縣張村 1981	4 漢江南岸	1 壘、1 鼎、1 斝、1 觥
	城固五郎廟 1988	2	1 甌、1 戈

附錄二：修補器物成份分析數據

					Cu	Sn	Pb	As	others	材質
1	2004 CHLT TT:1	鬲	城固 龍頭	鬲口沿	67.8	7	23.4			Cu-Sn- Pb
				鬲腹內補 綴	84.3	5.7	8.7			Cu-Sn- Pb
2	2004 CHLT T:3	甗	城固 龍頭	甗口沿	82.3	7.7	8.4			Cu-Sn
				甗腹部補 綴	85.7	13.5	0			
3	1980 CHLT T:23	彎 形 器	城固 龍頭	彎形器	96.1	--	--	3.2		Cu-As
				補綴處	95.1	0.7	--	3.5		Cu-As
4	1964 CHW bT:9	鼎	城固 五郎 廟	鼎腿部本 體	78	8.6	6			Cu-Sn- Pb
				鼎腹部本 體	68.6	6.8	22.2			Cu-Sn- Pb
				鼎腿部補 綴	93.2	2.5	1.5			Cu-Sn

				鼎腹部補綴	92.8	3.4	0.9	1	Ni:1.2	Cu-Sn
5	1964 CHW bT:11	鼎	城固 五郎 廟	鼎足本體	85.9	1.2	12.3			Cu-Pb
				補綴材料	85	1.4	12.6			Cu-Pb
6	1974 CHW T:1	尊	城固 五郎 廟	尊頸	76.6	3.7	18.1			Cu-Pb- Sn
				尊口沿	78.88	3.7	16.8			Cu-Pb- Sn
				圈足補綴	88.8	7.2	4.1			Cu-Pb- Sn
				圈足補綴	87.6	6.4	5.2			Cu-Pb- Sn
7	1970 CHW XT:1	鼎	城固 滑水	鼎腹	77.4	14.6	2.3			Cu-Pb- Sn
				腿補綴處	86	0.8				Cu
8	1975 CHW XaT:1	鼎	城固 滑水	鬲腹部本體	99.6					Cu
				腹底補綴處	94.6	4.1				Cu-Sn

9	1975 CHW XbT:5	城固 涇水	鼎腿本體	96.4					Cu
			器身補綴	99.4					Cu
1 0	2004 CHB LT:1	城固 徵集 柳家 寨	鼎腿部本 體	99.3					Cu
			腹底補綴 處	99.3					Cu
1 1	CHLZ T	城固 徵集	鼎腹本體	86	8.4	4.9			Cu-Sn- Pb
			器身補綴	96.7	--	2.3			Cu-Pb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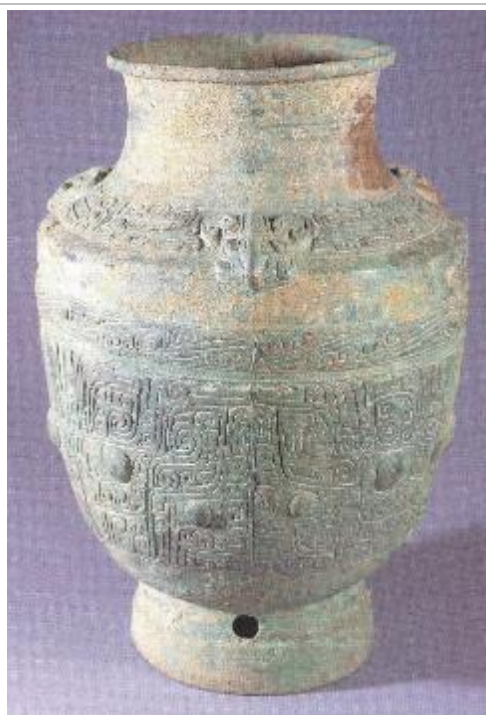
(未附出處者之圖與內文註腳出處一致)



(圖 1) 漢中盆地相對位置圖



(圖 2) 提梁甬 湖北黃陂盤龍城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1：夏、商》(北京市：文物，1993)，圖 137。



(圖 3) 商早期壘器形 河南鄭州向陽食品廠 《中國青銅器全集 1：夏、商》，圖 123。



(圖 4) 商晚期的提樑形式 河南安陽武官北地 M1022 《中國青銅器全集 3：商 3》

(北京市：文物，1993)，圖 116。



(圖 5) 商早期典型的鬲 盤龍城 M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下》，圖版 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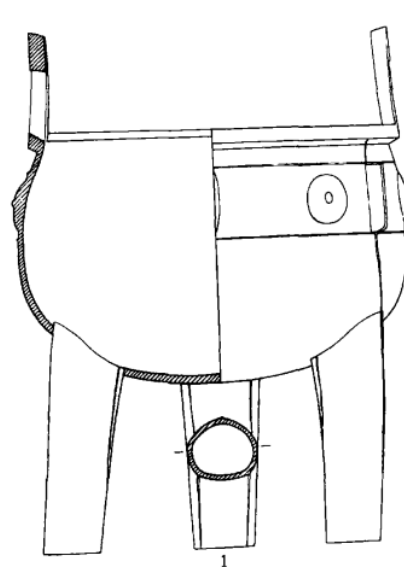
(圖 6) 柳葉形矛
張家坡 M87 西
周時期



(圖 7) 盤龍城楊家灣 H6
商早期



(圖 8) 甗 河南安陽小屯 232 號墓 殷墟
一期 《中國青銅器全集 3：商》，圖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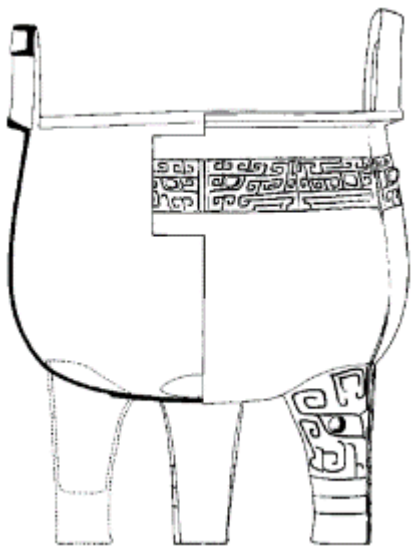
(圖 9) 郭家莊 M26 殷墟二期



(圖 10) 涇水出土彎形器 外弧長 24.5 公分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
頁 14



(圖 11) 洋縣北環路鼎與紋飾局部 殘高 33.8 公分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
頁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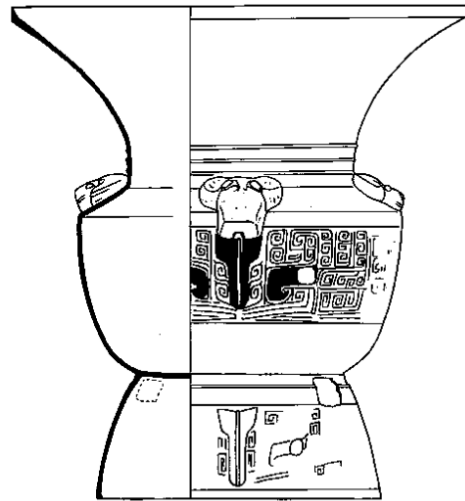


(圖 12) 2004 年龍頭鎮鼎 高 42.3 公分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17、18。

(圖 13) 墊片脫落孔洞與
補修痕跡 甑局部 筆者
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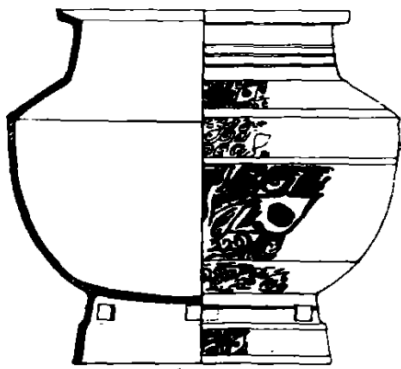
(圖 14) 截頭尊 高 44 公分；15.5 公斤 瑞典遠東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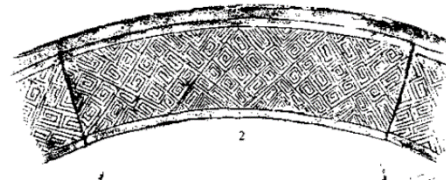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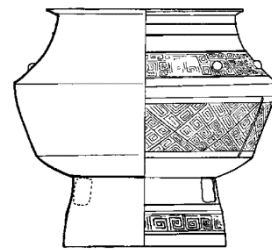
(圖 15) 1974 城固五郎廟 高 28.7 公分；重 7.5 公斤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圖 16) 1963 年蘇村塔塚尊的獸面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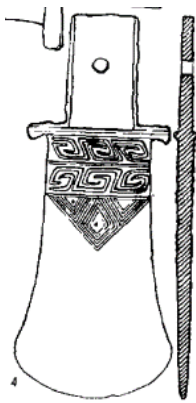
(圖 17) 湖北黃州下窯嘴 高 23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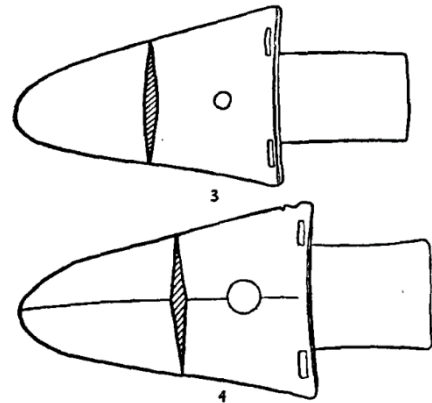
(圖 18) 紋飾拓片 1964 年城固
五郎廟村 高 24 公分



(圖 19)子漁尊 M18
 殷墟二期 高 36.7 公分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
 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3：
 商》，圖 97。



(圖 20) 戚形鉞 河南靈寶 長 19.4 公分 殷
 墟二期



(圖 21) 殷墟西區 三角援戈



(圖 22) 三星堆玉璋 長 26.5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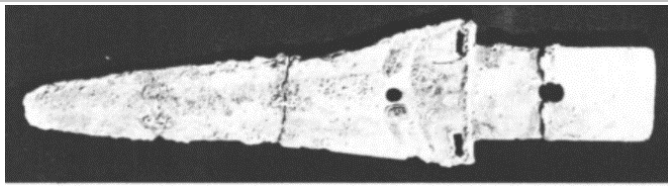
(圖 23) 銅質璋形器 長 6.1 公分 三星堆 2 號坑



(圖 24) 持璋人像 三星堆 2 號坑 殘高 4.7 公分



(圖 25) 1988 年城固五郎廟器群 上：《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144；下：《城洋青銅器》，圖版 202。



(圖 26) 長條援直內戈 寶雞竹園溝 M7 西周早期《寶雞燕國墓地》，2 冊，圖版 50-3。



(圖 27) 方柱斚和口沿局部 殘高 56.2 公分 1959 城固蘇村小塚 西周早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圖 28) 豐尊口沿局部 陝西莊白窖藏 西周中期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4：西周》（北京市：文物，1996），圖 160。





(圖 29) 鳳柱學 陝西岐山賀家村
商晚期 高 41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4：商》（北京市：文物，1998），圖 59。



(圖 30) 龍紋盤 陝西漢中城固縣文化館
徵集 高 15.5 公分 西周中期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14



(圖 31) 史牆盤 陝西省扶風縣莊白 高
16.2 公分 西周中期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4：西周》，圖 198。



(圖 32) 陝西寶雞門雞台 M3 西周
初 高 23.6 公分 《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圖版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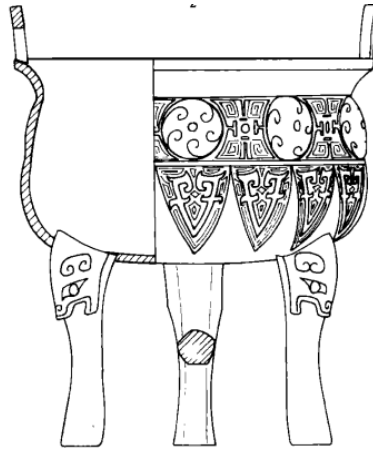
(圖 33) 洋縣張堡鼎 高 20.3 公分 商末周
初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圖 34) 盆式簋 陝西城固呂村 高 17.6 公分 商晚期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圖 35) 鼎 城固寶山 高 36.8 公分 殷墟晚期 《城洋青銅器》，圖版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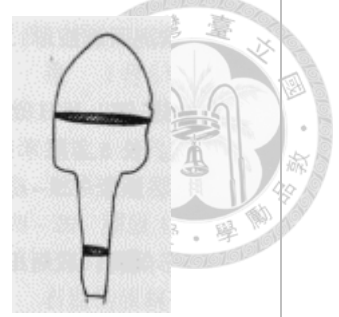
(圖 36) 長江中游地方特色鼎 湖南高砂 脊 M1 商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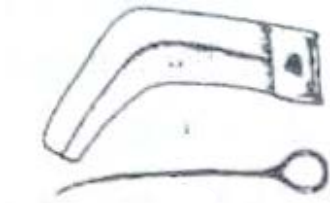
右(圖 37)尊 1964 陝西洋縣張村 殘高 20.5 公分、重 1346 克 《漢中出土商代銅器》，1 卷，頁 62。左 (圖 38) 素面尊 洋縣採集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



(圖 39) 寶山出土鏃，左到右：城固寶山遺址 SH26、20、51 作者自攝



(圖 40) 扁平鏃鏃
河南偃師二里頭
第 4 期 《偃師二里頭：1959 年~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269。



(圖 41) 銅鏃 越南櫚丘文化(Gò Mun) 《中國雲南與越南的青銅文明》，頁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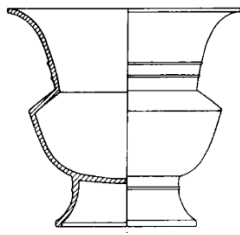
(圖 42) 眼形器長 14.6 公分 洋縣范壩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卷，頁 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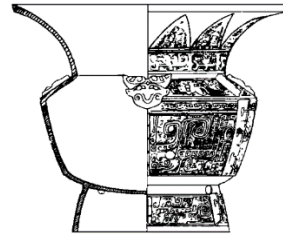
(圖 43) 齒狀彎形器 外弧長 41.9 公分 1980 城固龍頭鎮出土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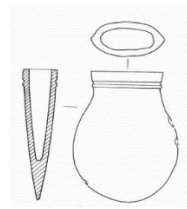
(圖 44) 持璋人像 殘高 4.7 公分 三星堆 2 號坑 《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紀錄》，青銅器冊，頁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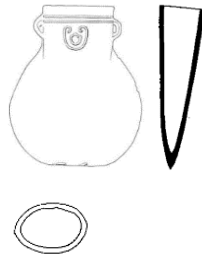
(圖 45) 湖南高砂脊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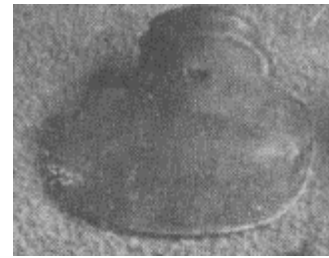
(圖 46) 殷墟小屯 M18



(圖 47)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長 6.3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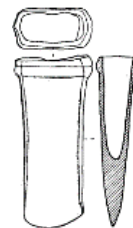
(圖 48) 溜肩有銜斧
龍頭鎮 長 15.6 公
分 《城洋青銅器》，頁
14。



(圖 49) 溜肩有銜斧 雲
南劍川海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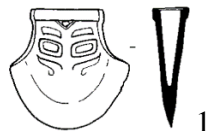


(圖 50) 江西新贛大洋洲器物坑
長 13.5 公分 《商代江南：江西新幹
大洋洲出土文物輯粹》，頁 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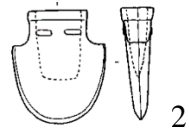
(圖 51) 銜口斧 殷墟西區 M391
長 11 公分

(圖 52) 漢中盆地出土折肩有銜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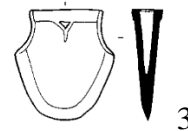
五郎廟 a 長 8.8 公
分；重 310 克

《城洋青銅器》，頁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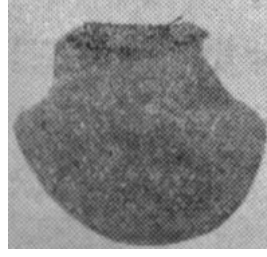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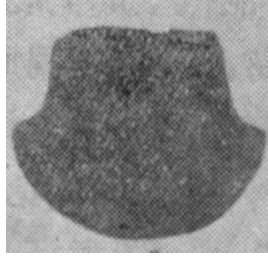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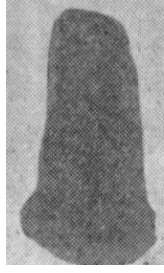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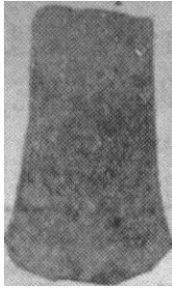
城固徵集 長 9.1 公
分；350 克

《城洋青銅器》，頁 157。



五郎廟 a 長 8.4 公分；重 245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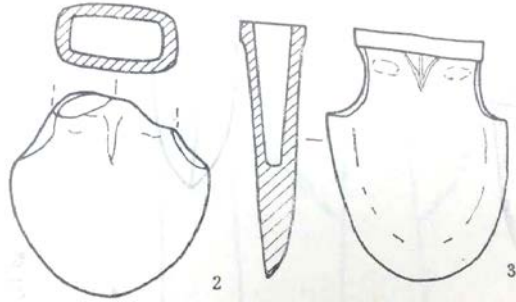
《城洋青銅器》，頁 50。



(圖 53) 扁平斧 長 9.5(左)和 (圖 54) 折肩有銜斧 四川雅安漢源
9(右) 四川雅安漢源



(圖 55) 折肩銜斧 四川成都竹瓦街窖藏 西周早期
《中國青銅器全集 14：巴蜀》，圖 153。




(圖 56) 折肩銜斧 陝西安康紫陽白馬石
〈陝西紫陽白馬石巴蜀墓葬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5 期，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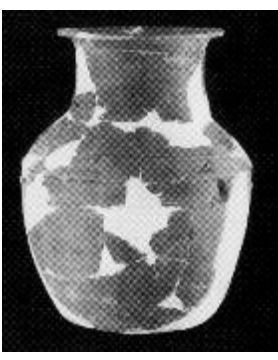

(圖 57) 柳葉形矛 1980 陝西城固龍頭鎮 左：長 23.1 公分；
右：長 21.8 公分曹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3 卷，頁 400-1。





(圖 58) 三角形葉矛 1955 陝西城固寶山鎮蘇村小塚 左：長 19.1；右：長 19.5。曹偉，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3 卷，頁 378、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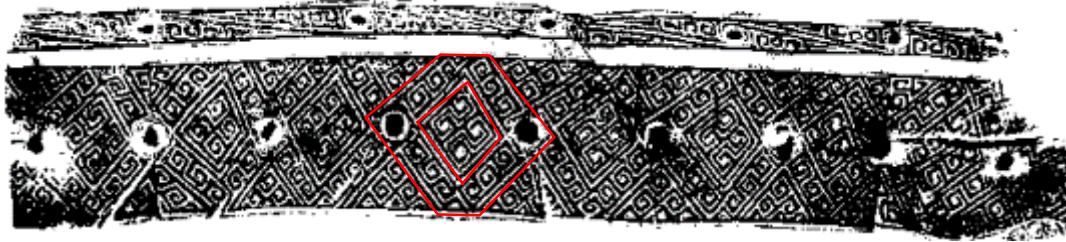
	<p>(圖 59) 牛鼠紋矛 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戰國《中國青銅器全集 14：巴蜀》，圖 152。</p>		
<p>(圖 60) 矛 殷墟西區 M917</p>		<p>(圖 61) 鏟 新贛大洋洲《商代江南：江西新幹大洋洲出土文物輯粹》，頁 120。</p>	

(圖 62) 陶壘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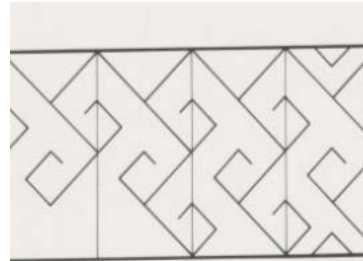
		
<p>偃師商城 M21 仿銅陶壘 《偃師商城》，下冊，彩版 10-2。</p>	<p>寶山遺址一期束頸陶壘《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圖版 34-2。</p>	<p>寶山遺址三期均見的陶壘《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圖版 34-4。</p>

(圖 63) 陶簋比較圖

<p>右：河北台西遺址 《藁成台西商代遺址》，圖板 72-3。</p> <p>左：寶山遺址帶足孔的陶簋 《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圖版 37-1。</p>		
--	--	---



(圖 64) 1980 年城固龍頭簋腹部紋飾拓片與腹內壁上的鉚頭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4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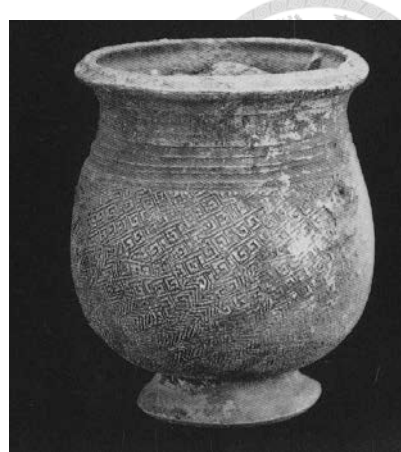
(圖 65) 勾連雲雷紋 Sackler Museum 第 53 號甗器腹紋飾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320-1.



(圖 66) 盤龍城雙耳簋 《中國青銅器全集 1：夏、商》，圖 165。



(圖 67) 仿銅陶簋 鄭州市杳見王村 河南博物院藏



(圖 68) 印陶紋 盤龍城 PYWH6

(圖 69) 簋 陝西禮西紡織廠 西安市博物館筆者自攝



(圖 70) 1981 年龍頭鎮提梁卣蓋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69



(圖 71) 盤龍城卣和器蓋拓片



(圖 72) 婦好圓甗的器蓋 《中國青銅器全集 3：夏、商》，圖 76。



(圖 73) 亞伐方罍的器蓋 陝西省漢中洋縣



(圖 74) 梁卣器蓋拓片 殷墟西北崗 M2046 殷墟晚期



(圖 75)陝西城固龍頭 三足壺與細部 高 30.6 公分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72、74。



(圖 76) 湖南高砂脊 M1 殷墟晚期

(圖 77) 方鼎足部獸面 山西平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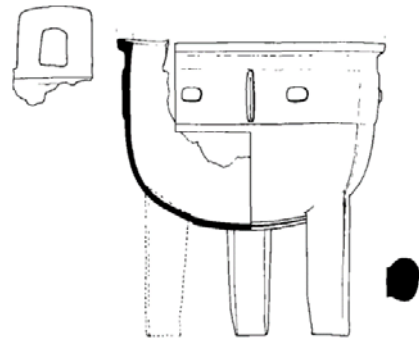
(圖 78) 虎耳銅方鼎的腹部紋飾 江西新贛大洋洲器物坑 《商代江南：江西新幹大洋洲出土文物輯粹》，頁 32、33。



(圖 79) 截頭尊 湖北黃陂魯台鎮 殷墟初 《中國青銅器全 4：商》，圖 95。



(圖 80) 鄭州向陽回族食品窖藏 H1 圓鼎 高 77.3 公分；重 33 公斤



(圖 81) 陝西甘泉閻家溝 簡易獸面紋鼎 殷墟晚期



(圖 82) 鬲足修補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28



(圖 83) 爵足部修補 陝北綏德 陝西省歷史博物館 筆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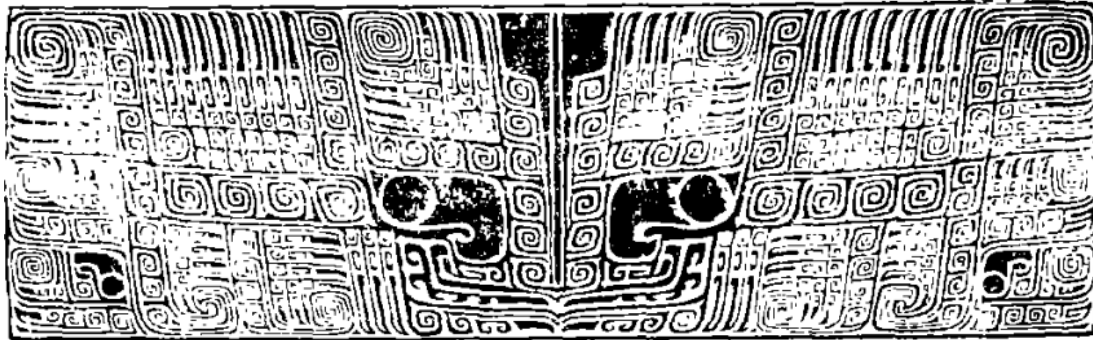
(圖 84) 甗 殘高 28.2 公分；
重 1858 公克 2004 城固龍
頭鎮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1 卷，頁 38。



(圖 85) 1964 城固五郎廟 截頭尊頸部局部



(圖 86) 截頭尊 早商晚期 1955 河
南鄭州白家莊 M2 高 25 公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夏、商》，圖
128。



(圖 87) 小屯 M232 甗 殷墟一期偏早



(圖 88) 三星堆 2 號坑尊 《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紀錄》，青銅器冊，頁 128。



(圖 89) 小屯 M331 尊 殷墟二期



(圖 90) 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尊 殷墟二期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 卷，頁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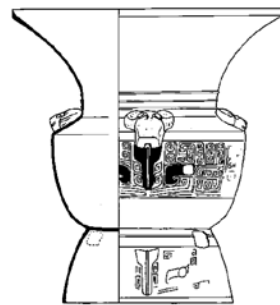
(圖 91) 1975 年五郎廟獸面



(圖 92) 尊 三星堆 2 號坑 高 35.2 公分《中國青銅器全集 13：巴蜀》，圖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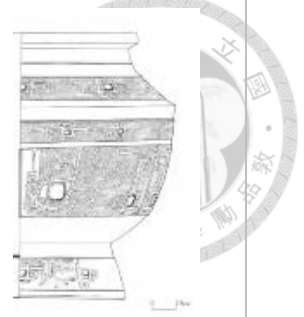
(圖 93) 1975 城固五郎廟尊和腹部獸面 高 34.9 公分；重 4571 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2 卷，頁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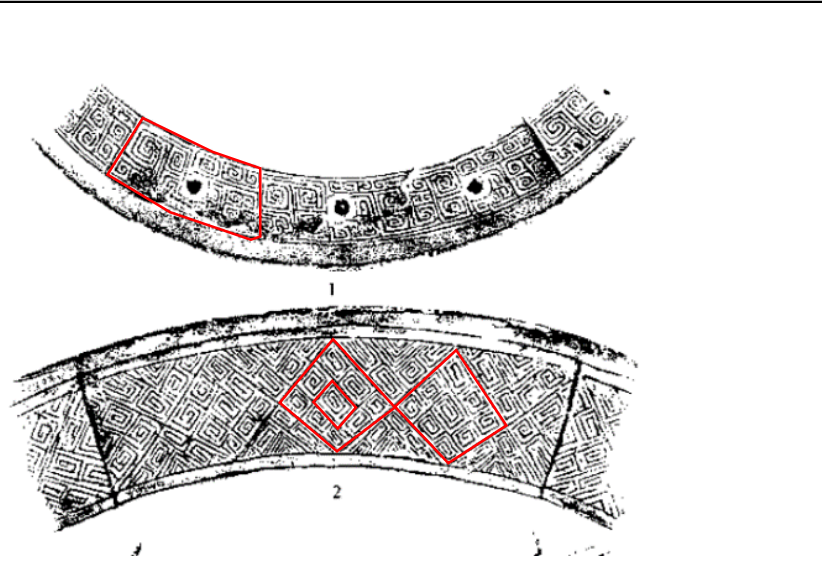
(圖 94) 1974 城固蘇村塔塚 高 39.2 公分；重 5871 克



(圖 95) 饗饗紋鼎 陝西 殷墟晚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1984),頁 20,圖版四



(圖 96)1965 年五郎廟截頭尊 高 27.6 公分;重 6796 克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2 卷,頁 150、151。



(圖 97) 甑的拓片 1965 年城固五郎廟 a 地點



(圖 98)甑肩上的紋飾帶 洋縣馬暢安塚



(圖 99) 尊 1964 陝西洋縣張村
殘高 20.5 公分、重 1346 克《城
洋青銅器》，圖版 33。



(圖 100) 弦紋尊 高 24.5 公分 重 3037 克
《城洋青銅器》，圖版 34。



(圖 101) 尖頂泡鑽孔的正面與背面 洋縣
文化局 筆者自攝



(圖 102) 虎形牌飾 長 43.4 公分 三星堆



(圖 103) 虎紋鉞與蛙紋鉞的突起孔緣
邊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3 卷，頁
232、234。



(圖 104) 無凸孔直內鉞 長 41.4 公分
盤龍城李家嘴 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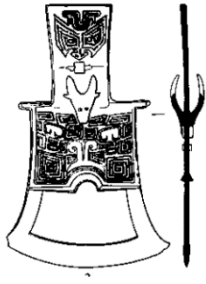
(圖 105) 曲內戈 長
29.8 公分 1964 城固五
郎廟 a 地點 《漢中出
土商代青銅器》，3 卷，頁
342。



(圖 106) 人頭盃內斧鉞 長 7.8 公分 陝西寶雞竹園溝
M13 西周早期 《中國青銅器全集 6：西周》(1997)，圖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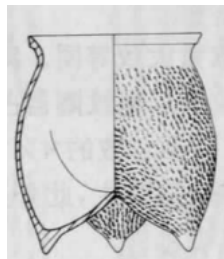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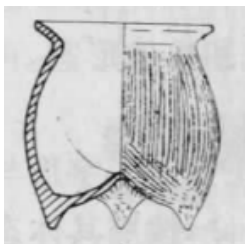
(圖 107) 直內鉞 陝
西西安張家坡 M199



(圖 108) 羊首鉞 陝西甘泉 長 21.5
殷墟三期



(圖 109) 玉瑗 四川三星堆 2 號坑 殷墟
二期《三星堆：中國 5000 年的謎・驚異的假
面王國》，頁 143。



H33:2 T23(5):37
(圖 110) 折襠鬲 陝西扶風壹家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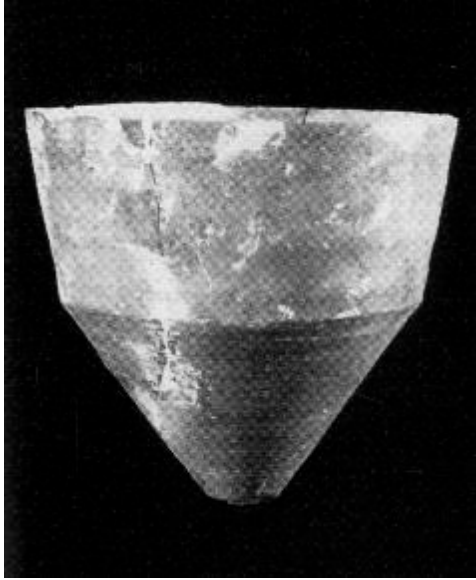
(圖 111) 折襠鬲 城固寶山 SH27 陝
西西北大學博物館 筆者自攝



(圖 112) 罍 湖南民南召東



(圖 113) 陶釜 寶山遺址 陝西西北
大學博物館 筆者自攝



(圖 114) 小尖底杯 陝西城固寶山
燒烤坑 SH9 高 12 公分《城固寶山：
1988 年發掘報告》，圖版 25-6。



(圖 115) 高圈足杯 陝西城固寶山 燒烤
坑 SH8 高 17.8 公分《城固寶山：1988 年
發掘報告》，圖版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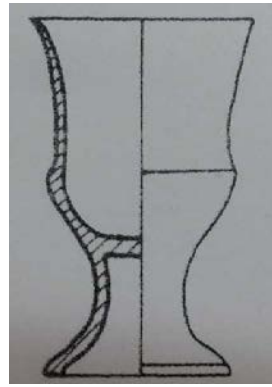
(圖 116) 小尖底杯與高柄座的使用
方法 筆者自攝 陝西西北大學博物
館



(圖 117) 獸面紋高足杯 陝西美陽出土
高 21.2 公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夏、
商》，圖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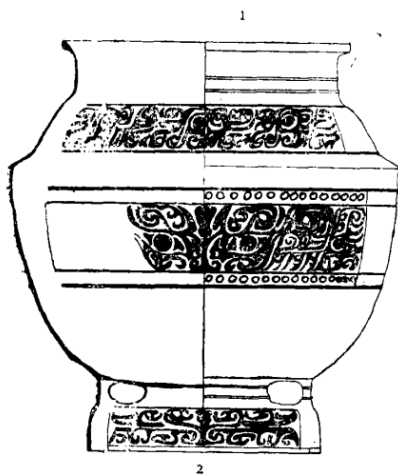
(圖 118) 漏銅現象的獸面飾 長 20 公分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3 卷，頁 572



(圖 119) 高足陶杯 陝西王家嘴



(圖 120) 人形飾正面與背面 直徑
10.8 公分 陝西省賀家莊 M1



(圖 121) 截頭尊(壘) 高 26.4 1979 年
清江口王家渡

參考書目



Bagley, Robert W.

1977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39, no. 3/4: 165-219.

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 C. Massachusetts: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the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1999 "Shang Archae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4-231.

2008 *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 Style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t*.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Bunker, Emma C.

1995 "Luxury Exports from China to the North." Chap. 4 In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edited by Jenny F. So and Emma C. Bunker. Seattl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53-66.

Chang, Kwang-chih.

1980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en, Fang-mei and Siggstedt, Mette.

2009 "The Collection of Shang Period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ates: A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 47-74.

Flad, Rowan K. and Chen, Pochan.

2013 *Ancient Central China: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Karlgren, Bernhard.

1954 "Note on Four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5: 369-74.

Loehr, Max, and Jannings, Werner.

1956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awson, Jessica.

1992-3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24.

2010 "Ornament and Territory." In 曹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頁341-61.

Tambiah, Stanley J.

1996 "A Performative Approach to Ritual." In *Readings in Ritual Studies*, edited by Ronald L. Grimes, 495-510. NJ: Prentice Hall.

von Falkenhausen, Lothar.

2010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曹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頁 378-516.

1998 〈對三星堆文化若干問題的認識〉,《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頁 268-290。

2010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族屬問題的再討論〉,收入曹璋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頁 52-9。

二陳

1989 〈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5期,頁 1-20+97-10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13 《偃師商城》,上、下冊,北京:科學。

1999 《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工作隊

1998 〈河南安陽市郭家莊東南 26 號墓〉,《考古》10期,頁 36-47。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1993 《中國青銅器全集》,1~4+14冊,北京:文物。

中國國家博物館、江西省文化廳

2006 《商代江南:江西新幹大洋洲出土文物輯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內田純子(難波純子)

2000 〈華中型青銅彝器的發達〉,《南方文化》3期,頁 26-44。

2003 〈地方型甗的發達與三星堆出土的早期銅器〉,收入宋鎮豪、尚先進編,《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頁 148-57。

尤振堯、陳克猷

1961 〈江蘇新海連市大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勘察記〉,《考古》6期,頁 321-3。

方萍、楊軍昌、馬琳燕

2001 〈城固縣青銅罍的修復〉,《文博》,1期,頁 75-8。

王永剛、崔風光、李延麗

2007 〈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考古與文物》3期,頁 11-22。

王從禮

1993 〈記江陵岑河廟興八姑台出土商代銅尊〉,《文物》8期,頁 67-8。

王善才、費世華

1993 〈湖北陽新發現一處青銅器窖藏〉,《文物》8期,頁 75-9。

王壽芝

1988 〈陝西省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6期,頁 3-9。

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



- 1994 〈陝西扶風縣壹家堡遺址 1986 年度發掘報告〉，《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43-90。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廣漢市文物管理所
- 1998 〈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收入三星堆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館編，《三星堆研究 第一輯》，成都：天地，252-66。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研究院
- 2009 《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紀錄》，成都：天地。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1999 《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新華書店。
- 石璋如
- 1980 〈第一本·丙編 殷墟墓葬之五·丙區墓葬·下〉，收入李濟、董作賓編，《小屯：河南安陽殷虛遺址之一》，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1984 〈第一本·丙編 三·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收入李濟、董作賓編，《小屯：河南安陽殷虛遺址之一》，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向桃初
- 2001 〈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掘〉，《考古》4 期，頁 27-44。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04 〈成都金沙遺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考古》4 期，頁 4-65。
- 朱鳳瀚
- 2009 《中國青銅器綜論(上)、(中)》，上海：上海古籍，2009。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贛縣博物館
- 1997 《江西新贛大墓》，北京：文物。
-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
- 1991 〈江西新贛大洋洲商墓發掘簡報〉，《文物》，10 期，頁 1-24。
-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
- 2003 《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
- 西安半坡博物館、藍田縣文化館
- 1981 〈陝西藍田懷珍坊商代遺址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3 期，頁 48-53。
- 余冰玉
- 2012 〈寶山遺址的初步研究及其與南北方向上考古學文化的交流互動〉，南京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
- 作銘
- 1958 〈劍川海門口古文化遺址清理簡報〉，《考古通訊》6 期，頁 6-12。
- 吳曉松、董子儒
- 1993 〈湖北省黃州市下寨嘴商墓發掘簡報〉，《文物》6 期，頁 56-61。
- 李水城、水濤
- 2000 〈四壩文化銅器研究〉，《文物》3 期，頁 36-44。
- 李伯謙



- 1983 〈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2期，頁66-70。
- 1998 〈從對三星堆青銅器年代的不同認識談論到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文化滯後"理論〉，《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頁300-5。
- 1998 〈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頁1-13。
- 李昆聲
- 2013 《中國雲南與越南的青銅文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勇、顧巖
- 2000 〈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大型商代銅尊〉，《文物》12期，頁62-8。
- 李朝遠
- 2000 〈江西新贛中稜水庫的再認識〉，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市：科學出版社。
- 李學勤
- 1997 〈論洋縣范壩銅牙璋等問題〉，《文博》2期，頁13-4。
- 李燁、張歷文
- 1996 〈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6期，頁73-75。
- 李濟、梁思永、高去尋
- 1962 《侯家莊第五本：1004號大墓》，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杜安、周雙林
- 2004 〈幾件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修復〉，《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期，頁46-51。
- 沈融
- 1998 〈商與西周青銅矛研究〉，《考古學報》4期，頁447-64。
- 尚璘、楊軍昌、韓汝玢
- 2004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金屬器的實驗分析與研究〉，《文物》4期，頁78-89。
- 貝君儀
- 1996 〈江西新淦大洋洲青銅禮容器研究〉，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孟憲武
- 1985 〈安陽三家莊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考古》12期，頁1139-40。
- 1991 〈殷墟戚家莊東269號墓〉，《考古學報》3期，頁325-52。
- 孟憲武、李貴昌
- 1991 〈河南安陽郭莊村北發現一座殷墓〉，《考古》10期，頁902-09+64-65。
- 岳陽市文物管理所
- 1984 〈岳陽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湖南考古輯刊》2期，頁。
- 岳潤烈
- 1983 〈四川漢源出土商周青銅器〉，《文物》11期，頁91。
- 林巳奈夫
- 1981 〈殷西周時代の地方型青銅器〉，收入樋口隆康編，《考古学メモワール1980》，東京：學生社，頁17-58。



- 1984 《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 1985 《藁城台西商代遺址》，北京市：文物。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
- 1955 〈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0期，頁24-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1999 《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京：科學。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鄭州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南開大學歷史系博物館學專業
- 1996 〈1995年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3期，頁1-23。
河南省博物館
- 1979 〈河南靈寶出土一批商代銅器〉，《考古》1期，頁20-2。
金正耀
- 2000 〈二里頭青銅器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夏文明探索〉，《文物》1期，頁56-65。
長江水利委員會
- 2002 《宜昌路家河：長江三峽考古發掘報告》，北京市：科學。
姚生民
- 1986 〈陝西淳化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5期。
施勁松
- 2002 〈對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銅器的再認識〉，《考古》12期，頁58-63。
苟保平
- 1998 〈城固縣文化館藏三件玉器〉，《文博》5期，頁84。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
- 1980 〈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期，頁211-8。
唐際根
- 1999 〈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學報》4期，頁393-420。
孫華
- 2002 〈四川盆地文化初論〉，《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科學，頁2-46。
2002 〈彭縣竹瓦街銅器再分析—埋藏性質、年代、原因及其文化背景〉，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科學。
2010 〈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埋藏問題〉，收入曹瑋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
2011 〈試論城洋銅器存在的歷史背景〉，《四川文物》3期，頁33-45。
孫華、曾憲龍
- 2006 〈尖底陶杯與花邊陶釜—兼說峽江地區先秦時期的漁鹽業〉，收入李水城、羅泰編，《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北京：科學。
- 徐堅
- 2014 《時惟禮崇：東周之前青銅兵器的物質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



陝西周原考古隊

1978 〈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3期，頁1-18+98-104。

陝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

1987 〈陝西紫陽白馬石巴蜀墓葬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5期，頁17-20。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文物旅遊局、上海博物館

2014 《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上海：上海書畫。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

1994 《陝南考古報告集》，西安：三秦。

馬江波、金正耀、田建安、陳德安

2012 〈三星堆銅器的合金成分與金相研究〉，《四川文物》2期，頁90-98。

高至喜

1963 〈湖南寧鄉黃材發現商代銅器和遺址〉，《考古》12期，頁646-9。

張天恩

2004 《關中商代文化研究》，北京：文物。

2015 〈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收入李永迪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213-238。

張昌平

2002 〈商代銅甌概論〉，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市：科學出版社，頁。

曹璋

2005 《周原出土青銅器》，1冊成都：巴蜀書社。

2006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4冊，成都：巴蜀書社。

梁星彭

2005 〈試論陝南城固、洋縣地區商時期文化遺址〉，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科學，頁。

梅建軍

2015 〈中國的早期銅器及其區域特徵〉，收入黃銘崇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頁61-109。

梅建軍、劉國瑞、常喜恩

2002 〈新疆東部地區出土早期銅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卷02，頁1-10。

淺原達郎

1985 〈蜀兵探原—二里崗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古史春秋》2期，頁23-52。

許宏

2006 〈都邑變遷與商代考古學的階段劃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慶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華誕學術文集》，北京：文物，頁479-87。



郭妍利

- 2006 〈城洋青銅兵器研究〉，收入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頁 260-80。
2014 《商代青銅兵器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陳坤龍

- 2009 《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博士論文。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

- 2012 〈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文物》卷 7 期 2012，頁 85-92。
2014 〈論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紅銅容器〉，《中國國家博物館刊》卷 4 期 2014，頁 132-8。
2015 〈城固蘇村出土銅器的技術特徵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3 期，頁 122-8。

陳芳妹

- 1987 〈從考古資料論青銅爵風格發展的主要趨勢—並論殷墟風格的歷史地位〉，《故宮學術季刊》4 卷 4 期，頁 45-101。
1997 〈商後期青銅斧鉞制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四，台北：中央研究院，頁 983-1051。
1999 〈商代青銅藝術「區域風格」之探索—研究課題與方法之省思〉，《故宮學術季刊》，15 卷 4 期，頁 109-59。
2009 〈「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2 期，頁 21-82。

陳昭容

- 2015 《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晟編輯

- 2014 〈城固老人土堆旁撿到商代酒器，上交文物獲 3000 元獎金〉，《華商網》11 月 11 日。(瀏覽日期 2016 年 3 月 27 日，網址：<http://news.hsw.cn/system/2014/11/11/177618.shtml>)

陳德安、陳顯丹

- 1987 〈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0 期，頁 2-15。

傅聚良

- 2007 〈商代銅斧的功能〉，收入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銅器》，湖南：岳麓書社，頁 443-8。

喻燕姣

- 2002 〈略論湖南出土的商代玉器〉，《中原文物》5 期，頁 43-50。

彭明瀚

- 2010 〈贛江鄱陽湖地區商代青銅工具和鑄銅石範的發現與研究〉，《商代江南》，北京：科學，頁 155-65。

彭適凡、李玉林

- 1983 〈江西新贛縣的西周墓葬〉，《文物》6 期，頁 93。



- 曾中懋
1994 〈三星堆出土銅器的鑄造技術〉，《四川文物》6期，頁68-9+77。
朝日新聞社編
1998 《三星堆：中国5000年の謎・驚異の仮面王国》，東京都：朝日新聞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 《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 上》，北京：文物。
2010 《坐果山與望子嶺：瀟湘上游商周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閔銳
2009 〈雲南劍川縣海門口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8期，頁3-22。
黃銘崇
2014 〈邁向重器時代：銅器技術的輸入與中國青銅技術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5本4分，頁575-678。
楊錫璋
1983 〈安陽殷墟三家莊東的發掘〉，《考古》2期，頁126-36。
鄒後曦、王風竹
2003 〈三峽考古佐證長江文明〉，《中國國家地理》26卷6期，頁65-75。
鄒衡
1980 《試論夏文化》，北京：文物。
1980 〈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科學，頁297-355。
雷興山
2000 〈對關中地區商文化的幾點認識〉，《考古與文物》2期，頁28-34。
熊建華
1991 〈湖南邵東出土一件西周四虎鏃〉，《考古與文物》3期，頁111。
2013 《湖南商周青銅器研究》，長沙市：岳麓書社。
趙叢蒼
1996 〈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4期，頁3-26。
2006 《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
2006 〈從考古新發現看早期巴文化—附論巴蜀文化討論中的相關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5卷4期，頁95-9。
劉士莪
2002 《老牛坡》，西安市：陝西人民。
劉靜
2007 〈先秦時期青銅鉞的再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頁52-79。
黎澤高、趙平
1989 〈枝城市博物館藏青銅器〉，《考古》9期，頁775、6。
盧建國
1982 〈陝西銅川發現商周青銅器〉，《考古》1期，頁107+02+16。
盧連成

1988 〈燕國墓地出土兵器的研究，兼論蜀式兵器的淵源與發展〉，收入盧連成、胡智生編，《寶雞燕國墓地》，北京：新華，頁 431-46。

戴應新

1976 〈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 期，頁 31-8。

羅西章

1978 〈扶風美陽發現商周銅器〉，《文物》10 期，頁 91-2。

蘇榮譽

2003 〈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鑄造工藝的初步考察〉，收入孫華、蘇榮譽編，《神秘的王國：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成都市：巴蜀書社。

2015 〈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收入日本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日本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頁 352-86。

